



## 《记忆》八十三期目录

### 【专稿】

顾 土 “三七开”与文革——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之十

### 【争鸣】

迟泽厚 一封没有照登的《来函照登》

### 【述往】

杜钧福 文革屠杀事件注记二则

### 【读书】

范世涛 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

潘祛病 “劣败”的“驯服工具”——《青史难隐：最后一次交代》读后

### 【怀人】

戴 煌 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子——哀李炳泉

### 【访谈】

文 静 荒诞人生——方昕口述（一）

### 【检讨书】

李慎之 我的交代和检查（1966年9月23日）

**【资料室】**

江 青 致许世友、赵紫阳信

任冬林整理 武汉市小学教师 1954 年的工作笔记——关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

**【来信选登】**

- 1、何建平谈沈迈克的提问
- 2、关天昊谈设立问答栏及中国人的面子
- 3、黄光光来信谈对卞仲耘案的感想
- 4、金秋再致《记忆》

## 【专稿】

## “三七开”与文革 ——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之十

顾 土



近百年来，我们常常被一些伪观点、伪命题所左右，比如反对“全盘西化”，比如“世上没有绝对的……”，再比如对某人某事应该“三七开”等等。这些伪观点、伪命题长期影响了思想的进程，甚至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历史走向。

今天，恐怕已经没有人再激烈反对“全盘西化”了，作为一个曾经被认定为反动论调的“全盘西化”，也很长时间不再成为受批判的靶子。这种对“全盘西化”的懈怠，并不是因为如今主张“全盘西化”的队伍壮大了，更不是由于“全盘西化”已经被正名了，而是多数人基本都认定这是压根儿不可能的。不用说全盘，恐怕连“半盘”也无指望。相反，外来的事物被本土化、被同化，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扭曲、变味、低质，似乎是所有外来文化、思想、制度，直至物质产品的最终下场。连可口可乐都可以加入生姜熬着喝，说是治感冒，更别说那些抽象的主义了。“什么东西，怎么一进来就变了味儿？”这是多少人发出的感叹。中国这样一个始终独立的国家不可能被“全盘西化”，那些曾经受到长期殖民统治的国家或民族，例如印度、菲律宾、越南，也同样没有被“全盘西化”，而“西化”用力最大的日本依然没有被“全盘西化”，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保存和发扬甚至还超过了中国。可见，一个拥有自己的历史、文化、生活特征的民族，无论主动还是被动，要想“全盘西化”，还真是“比登天还难”。既然“全盘西化”是一种情绪化的虚幻说辞，那么，那些因反对“全盘西化”而进行的论战、批判，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意识形态也就显得毫无意义了，基本属于空对空。

世上没有绝对的民主、没有绝对的自由、没有绝对的平等，这些说辞是几十年来批判民主、自由、平等的有效武器。我在中学读书时就在课堂政治学习和课下马列主义自学小组学习中不断接受这样的观点，因为从逻辑从事实中都找不出

任何破绽。但是，这种说辞又几乎可以为世上所有丑恶、肮脏、罪行、弊端辩护，你说防止水污染，他可以说：世上没有绝对干净的水；你说食品安全，他也可以说：世上没有绝对安全的食品；你说消除腐败，他依然可以说：世上没有绝对的清廉。事实是，既然世上没有绝对的，那么，人们所说的一切自然都是以相对为前提，作为不存在的绝对，说出来也就毫无意义了，只是一种废话。废话虽然只在诡辩和构陷时才能派上用场，但却是几十年来中国意识形态的一大特色，只要翻翻那些奉为圭臬的语录、文件、指示、著述，认真琢磨其中的逻辑和意义，就不难发现连篇的废话。废话常常因为外界的强力灌输、日复一日的心口重复和思想单一的大环境而被提拔为颠扑不破的真理。

“三七开”，这一对人对事的评价语言，因为领袖的多次使用而盛行于上个世纪下半叶，更是文革中的常用辞。直至今日，对领袖、对重要人物、对历史事件而言，“三七开”依然被认定是一种形象、客观、一分为二、富有表现力的形容词。

具体数字模糊，算术只讲大概，是中国政治、军事的传统，古今战争中的参战人数、阵亡人数、遇难人数，都只有一个笼而统之的数字，以号称为主，万以下基本省略，或从来不记。1949年以后，连抗美援朝、三年大饥荒、文革这样举世震惊的大事件，常年都没有一个权威的确切死亡数字，有的事件的不同统计数字的差距竟然在千万以上。而这六十多年来，既无战乱，又非权力真空，管理网络是有史以来最严密的，管控的力量也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户籍管理的严格及其控制力度起码在1980年代以前是空前的，每个死者按理说都应该有名有姓有记录，可惜，具体的统计始终是一片空白或是有意无意地被忽视。

在我们的现代历史中，无论被祭奠的遇难者，还是被追悼的烈士，常常都是在一块巨大的墓碑下大而化之，除了极少数人外，最缺少的就是具体详细的姓名、行状、生卒年月，忽视了那些组成活生生历史的普通生命。有的历史事件，距离时间越近，越无所谓，死难者的查找、统计越不上心；而当发生的时间已经远去，查询、统计都已经不再那么容易时，一切却变得无比认真起来，结果，实际计算的具体结果与以往匡算的大致整数相距甚远，以至真相永无大白之日，还引起了原本不该出现的诘问与怀疑。

在这样一种对历史记忆缺乏尊重、对具体生命不大上心的社会环境中，却有



一个显得非常具体的“几几开”，作为评价词汇畅行于世，确实有点匪夷所思。其实，“几几开”比抽象还要抽象，比笼统更加笼统，是一种虚无式的形容，这种貌似具体实则虚无的评判，带有极强的欺骗性和诡辩性，既可以诱人上当，也容易躲避实证的检验。

### 对特定人物的专用辩护辞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除去婴儿，任何人物或重大事件，恐怕都有其正负两面。一生正确或一辈子不正确的肯定都不是人，十全十美或相反的事情也肯定非人所能为。所以，任何人，包括专业的历史学家，从来都没必要也不会将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依照所有是非、对错、正负，真正细分出百分之多少，或十分之几，然后再下个完美精确的结论。因为这对非专业的大众来说，根本不可能，对历史学家来说，也不属于历史学，又有哪位历史学家曾经对历史人物或事件使用过“几几开”式的评判呢？事实上，非但历史研究中不会使用“几几开”的说法，即便是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大众对周围的多数人或多数事也没有这种习惯，更喜好就事论事。一件事情失败了，大家承认其失败；一件事情造成了损失，其责任不能不受到追究；一个人犯罪了，自然应该接受审判；一个人有过失了，当然就要受到处分；一个人犯错误了，遭到批评和自我反省也是免不了的。

所谓“几几开”，使用最多的是“三七开”，三指的是错误、七当然是成就。而“一九开”则无人说起，“二八开”、“四六开”也用得很少。无论是哪种“开”，指的都是成绩为主，错误为次，至于颠倒过来的“开”，几乎不被使用。不管是“三七开”的持论者，还是附和者或是信奉者，几乎没有人真正做过数学功课来证实这种观点，而反对者也好像不从“三七开”的细化、具体化、实证化角度去反驳。显然，人们将这一貌似具体的说辞，更多地当作笼而统之的说法，是所谓“成就是主要的”另一种形象化的表述而已。

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看问题要一分为二；这些都是近几十年里，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前，面对严重的指责、面对强烈的批评、面对巨大损失时的通行辩护辞，“三七开”则是其中最简略最形象的说法。选择“三七开”的用意在于，如果是“四六开”，其负面比例接近正面，总体形象依然欠佳，既不值得充分肯定，更不能证明其主要是正确的；而“二八开”，其“错误”那一面的

严重性又无法得以体现，这严重性还是任谁都遮蔽不去的。为了赋予正面评价以一种合理性，又难以避开众所周知的重大问题，于是，只有一个“三七开”可以一种貌似公平的面目出现，显示了瑕不掩瑜、功远大于过的本意。“三七开”还特别富有形象感，便于在观众的内心刻下鲜明的烙印，无论是画一个圆还是一条线，以三和七的比例关系出现，那种主、次感觉十分生动清晰。

可是，那些经常被冠以“三七开”的人或事，从来也没有人用数字将是非、对错、功罪细细排列，算一算，比例究竟是多少，哪些更多，哪些更大。既然如此，那“三七开”的结论又是从何而来呢？凭什么硬说是“三七开”，而不是其他开，或者是相反的开？说白了，在现代中国社会中，“三七开”只是一种特定的评价，“七分成就三分错误”专门针对的是某些历史人物或某些历史事件，是为了开脱，更为的是掩盖，无所谓科学，更不能实验，也无须当作一个实数来对待。

从文革前到文革中，甚至文革后，能够被冠以“三七开”的人物，只有斯大林和毛泽东，并且都在死后。而“三分错误七分成就”，又是毛泽东的惯用的说辞，说斯大林，说大跃进，说自己，说文革，无不以此来说明成绩是主要的。实际上，说“三七开”还是毛泽东比较谦虚的自我说法，他更喜欢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来表明态度，反驳批评，但他从来也没有详细阐述过这样的比例关系的理由和依据，只是用如此说辞作为一种结论。不过，对待其他想要打倒的人，任何一种开都不曾用过，也无人敢于使用，全盘否定是常态。毛泽东治下以及以后的一段时代里，对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吴佩孚、蒋介石等人，常年在历史评价中都是一棍子打死。“彭德怀反党集团”从1959年庐山会议开始层层加码，直至文革灭顶，他们的所有一切都被全盘否定；而文革中产生的刘少奇、林彪、陈伯达以及大大小小的所谓反党、反革命集团或分子，包括“四人帮”，在他们身上也没有用过“几几开”，只要一被打倒，一生都是罪名和丑恶，连过去被认可的功劳也一概遭到否定和批判，成为“反共老手”、“一贯反党反对毛主席”、“隐蔽很深”、“蓄谋已久”。对斯大林就是“三七开”，可赫鲁晓夫等人则是一团糟、一片黑，从来也没想过要用“三七开”去做任何客观的分析。

在毛泽东生前，也没人胆敢说对他应该“三七开”，更不敢说对文革要用“三七开”。无论毛泽东还是文革，只能赞誉伟大、英明、正确，只允许高唱“就是

好、就是好、就是好”。说毛泽东、说文革“三七开”，无疑于死路一条，现行反革命、“恶攻”、“罪大恶极”等等一大串罪名正等在那里，结局是逮捕、关押、坐牢直至枪决。“三七开”实际是后世替前人的辩解词，能够有幸被辩解为“三七开”的人物和事件，往往都属于生前绝对正确的那类，后人为了维护这种正确，又不能不面对死后或事后暴露出来的重大问题甚至罪行，只得以“三七开”这样貌似具体实则空泛的词汇延续其正确的合理性。

### 对政治领导而言并无意义

对无权无势的人而言，其社会伤害力极其有限，当普通人因错因罪受到周围人指责或者难以宽宥的时候，用“三七开”替死去的人说情、让生者继续抬头做人，倒也不失为一种有说服力的用辞；然而，对那些权力在手，尤其那些可以左右一个组织、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命运的人来说，“三七开”恰恰是一个根本不应该使用的社会判断。

在专制帝王的时代，除了西汉昌邑王刘贺等极少数人因羽翼未成或年幼无权而被废黜外，中国帝王基本一做就是一生，不会由于昏庸、失察、无能、罪过招致下台，王朝替换只能采取武力推翻或者宫廷政变的方式。但是，在中国专制王朝历史中，面对统治的危机、百姓的灾难，却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罪己诏”。

“罪己诏”这样的形式，尽管仅仅是书面的自谴、引咎，但以“真命天子”的身份向臣民认错、致歉，并有所担当，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长期以来，我们有一种观念深入人心，就是对表面的、形式的东西基本否定，认为议会民主是假民主，于是，干脆来个赤裸裸的独裁；认为礼仪是伪善、虚假，于是，粗俗、直白、无礼畅行于世。时至今日，在公共场合，多数人不知如何与陌生人打交道，全世界通行的“对不起”一直难产。其实，人类生活中，表面的礼节占有很重的分量，可以影响自己的心情，更可以左右与他人的关系。作为“一国之主”，能够向全国认错甚至认罪，不用说中世纪，即便当今，也会深深感染大众。即使这种“罪己”带有欺骗性，但起码比那种死不认错、自以为是，心中只有颜面和权力的强百倍。

在中国历史上，下过“罪己诏”的皇帝有90来位，即使二十世纪的“洪宪

皇帝”袁世凯都没有忘记“罪己”。他们不但将人祸的责任归为自己，连天灾也都认为是老天对自己的惩罚。汉明帝罪己时说：群僚所言，皆朕之过。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轻用人力，缮修宫宇，出入无节，喜怒过差。汉安帝罪己时则称：朕以幼冲，奉承洪业，不能宣流风化，而感逆阴阳，至令百姓饥荒，更相啖食。唐太宗贞观二年，旱、蝗灾害频仍，罪己诏曰：“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义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

专制时代以后，在民主法治的环境下，无论总统、总理，还是首相，或是地方政府领导，都不是终身的，而且，不管他们从前有多大的贡献，也不管是“几几开”，只要治下发生有碍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出现大量的非正常死亡，暴露了严重的政治丑闻，政权无法维护应有的社会秩序，国家不能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即使与他们并无直接关系，也不能不承担全部责任，不但要公开向国民道歉，还要引咎辞职，直至接受法律的制裁，有人可能干脆自我了断。或许历史学家可以在历史研究中对他们的功过是非加以分析、客观表述，但在当时，他们在大众和舆论的眼中都会成为严厉批判的对象。这是现代社会政治领导必须担当的责任，因为他们不是普通民众，也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思想家、理论家，所作所为关系到千百万直至上亿人的生活和生命，也关系到社会的盛衰和进退，任何失误、失察、罪过都举足轻重，都有可能直接导致直接或间接的严重社会恶果。

上个世纪的下半叶，中国的土地上发生了一次又一次震惊世界的事件，多次造成了百万、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在1966年以后的数年间，那些年老体衰、无任何反抗能力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弱势群体遭到侮辱迫害直至虐杀；一次次政治运动致使冤假错案遍布全国上下，随意逮捕、肆意关押、大量人死于非命在很长的时间里是社会常态；由于文革而形成的暴力冲突还使得许多无辜百姓伤亡，由于造反运动而产生的刑讯逼供、任意抄家、私设公堂牢房，留下了中国人权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至于经济上的瞎指挥、违背经济规律的错误政策招致的后果，更让人民生活长期困苦不堪。所有这些灾难，其深重都不亚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但几十年里，执政者只在三年大饥荒后的“七千人大会”上有过一次内部范围的检讨，从未向全民、向普天下公开认错，而且还硬把人祸说成是天灾。

事实上，所有这些灾难还都发生在二十世纪，二十世纪以来的世界早已经走出相信君主“罪己”、认错的时代了，凡是人民真正拥有话语权、选举权的国家

和地区，领导人只要有一次重大失误或一回违法，等待他们的都是弹劾、罢免和审判，根本不会用什么“三七开”去开脱。一个人犯罪犯错，必须追究，一个社会的领导犯错犯罪更是责无旁贷。

专制君主时代可以“罪己”，资本主义时代必须下台，而作为被“三七开”的人物，却既不“罪己”，也不辞职，连错也不认，不但为所欲为，还可以任意将持不同意见的人清洗、下狱。用“三七开”的说辞为他们辩护，本身就已经表明了他们所处社会的实际性质。如果放在尼克松、田中角荣直至卢武铉、陈水扁等人身上，尽管有一万个理由可以用“三七开”为他们辩解，但结局却完全不同。

在当代社会，不但执政者不应该被“三七开”，事件、组织、运动，尤其以国家机器操纵的那些重大行为，都不应该以“三七开”作为辩护辞。无论其动机、初始如何，只要导致大规模的施暴，都应该遭到否定，不然，连希特勒与纳粹、波尔布特与红色高棉也会被“几几开”了。

被“三七开”的人物，其七分成就的那一部分常常还是一种艺术化的形容，既经不起推敲，也无法落实。“站起来”的说法就非常典型，因为什么是站起来根本没有任何标准。

在所谓站起来的时代，大约有30多年，中国大陆人不允许进入宾馆、友谊商店；在肮脏混乱的火车站里，只有外国人、华侨和港澳同胞可以拥有干净舒适的专用候车室、售票处；能进来的外国人都被“尾随围观”，而有幸出去的中国人又不能不自惭形秽，滞留不归者更是多如牛毛；这样一个缺少像样的饮食、住房、衣着，已经丧失了基本美感和自尊的群体，很难说是站起来了。今天有些国家，对西方对美国敢于处处叫板，但是只要看看他们困窘不堪的生活，连我们这些刚刚富起来的中国人都瞧不起，又怎么能说他们已经站起来了？而台湾、香港这些曾经被称为帝国主义附庸、被叫做殖民地的地区，其居民的地位与我们相比，在世界的心目中其实并不低，更没有人认为他们没有站起来，不然，当年怎么会有那么多大陆人宁肯放弃站起来，而选择舍生忘死地偷渡？

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有思想、有语言，不允许独立思想和不能言论自由的人缺少作为人的完整属性，所以，存在思想罪、言论罪的地方，人就不会拥有独立的精神和完全的人格，连说话和思考的权利都没有，人的所谓站起来又体现在哪里呢？二十世纪站起来的人群，已经将株连、文字狱、家天下、终身制、文

化禁锢、迫害异己、极端个人迷信当作专制的历史加以抛弃，而一个将这些都发展到有史以来的极致、并集世界之大成的时代，人民站起来的结论又从何而来？

在崇尚民主、法治、文明的社会，客观公正地分析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属于史学研究的范围，而在社会舆论中，政治权力人物所作所为和社会事件，只要出现践踏民主、违背法治、对抗文明的事态，都会被坚决制止，被立即谴责，被迅速赶下台，不会有什么“几几开”的辩护，也不会因“几几开”而可以逃避责任和制裁。在人治、专制、终身制的时代，只有臣民心态的人才以“三七开”作为政治领袖的辩护词，以便延续其统治，或者肯定其统治的正确性。“三七开”，实际上，就是为了愚民，为了欺骗，为了躲避问责和治罪！



## 【争鸣】

## 一封没有照登的《来函照登》

迟泽厚

2010年9月，广东《秋光》杂志第334期刊登了一篇认为难得的重头文章《许世友在广州》（以下简称《许》文）。作者是一位曾任许世友秘书的军队退休干部。由于广州军区机关部分离休老干部得到这份杂志的赠阅，故有许多人看到此文。众人看后大哗，认为文中讲到的几件事情严重失实，不仅是为尊者讳，有些还是是非颠倒；倘若讲得都是个人生活琐事，也就罢了，而有的是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岂能信口开河，误导读者！于是，有的人便找到杂志社去，要求在刊物上更正、澄清。我是其中之一。我直接找了《许》文的责任编辑。这是位年青人。他说他对许世友并不了解，但他收到《许》文后，曾很认真地问过该文作者，对方向他表示绝对真实，他才决定选用的。我表示将写一篇对《许》文的意见，请杂志刊登。他没有拒绝。10月7日，我写了一篇《来函照登》，指出了《许》文的主要谬误，并亲自送往杂志社。函的全文如下：

编辑同志：

《秋光》第334期刊登的署名孙洪宪所作《许世友在广州》一文严重失实。孙洪宪同志称他在许世友身边工作的3年间，我恰在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孙是办公室下辖的秘书科秘书）任副主任，与许世友常有接触，故也可算是一个知情人；再讲远些，我早在1953年就认识许世友，因而还了解许世友的一些历史情况。

孙文讲了许世友在生活方面的许多故事，虽然多属荒诞不经，但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对这方面的问题我姑且不作评述。这里只讲讲文中提到的两个重要情节：

其一，孙文称，八大司令对调时，军令如山，要求“上任不准带秘书等工作人员”，“人走家搬”。许世友自然模范地遵守了这些要求。而其实，许世友哪条也没遵守，他把在南京的全套人马都带到了广州，其中包括1名秘书、两名保卫干事以及司机、管理员、女医生、女服务员等一共8人；许的妻子

田普也没和他一起来广州。

其二，孙文称，许到广州后，江青曾试图拉拢他，但许不为所动。“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时，江青曾派几名特使给许送来一封亲笔信，称她和许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在祖国的南方和北方为共同的目标而斗争”。有的军区领导建议军区党委组织学习江青来信，并把学习情况向江青报告，而许世友则冷冷地说：“往前靠什么！信是写给我的，我不回信，军区党委也不用写什么报告。”孙文的这些陈述更是不着边际。第一，江青的信并非如孙文所说只写给许世友一人，而是写给许和当时在广东省委班子中排名第四的赵紫阳两人的。第二，许世友对江青来信是极为重视的，他事先得到消息，特指定军区三大机关主要领导去机场迎接送信的特使（共3人，其中2人是临时借调到北京的广州军区一般干部，另一人是地方作家），许世友和赵紫阳则在特使们下榻的东山宾馆迎候，并于当晚宴请。许、赵议定：将江青写给他们的信立即铅印下发，广东大陆部队发到团，地方发到县；海南岛驻军发到连，地方发到公社。我与司令部办公室主任何硕丰受命连夜组织铅印和进行校对，即使错了一个标点符号，也要追究政治责任。我们两人战战兢兢，弄了一个通宵，按要求将信印出。军区党委常委则连夜进行学习，并以电报向江青报告了学习情况，感谢江青对军区的关怀。第二天上午，又在军区礼堂召开大会，宣讲江青来信。这些情况，都是《许世友在广州》一文作者所亲身经历过的，何以健忘若此？第三，孙文的两处江青来信引文，均与原信不符。现随信寄上我保存的江青来信铅印件一份，以证余言之不谬。（此信请见本期资料室）

顺便指出，孙文曾于2005年9月在《羊城晚报》发表过，事过5年，再次投稿，也属不妥。

为了维护贵刊的声望，也为了防止误导读者，盼能将此信全文刊出。

此祝

撰安

广州军区司令部离休干部

迟泽厚

2010年10月7日



许世友与江青的三名送信特使合影。左一是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吴纯仁，左二为许世友，左三为浩然。右一为蒋豪济，右二为张永枚。（1974年2月，摄于海南，迟泽厚先生提供）

这位编辑看后，神情凝重，他表示滋事体大，他作不了主，需请示杂志社领导，而领导现在出差了。我建议他，待领导返回后，尽快汇报请示，必要时我可登门与领导沟通。果然，不久我从电话上得知，领导回来后看了我的《来函照登》深感为难。此后某日，当我得知这位领导正在杂志社上班，便又赶往那里，并拉上那位编辑一起与杂志社领导交换意见，商讨解决方案。这位领导对我很热情。他承认刊登《许》文确实不够慎重，他们已经做了一些调查，证明我的意见言之有据。但是他不赞成我用来函照登的形式批评《许》文。他主要怕影响杂志的声望。他建议我可以另写几篇东西，在他们杂志上发表，从正面阐述《许》文中几个问题的真相。我则不赞同他这种打迂回战的办法，我既无此精力，而且效果也未必好，我写封信，直截了当，一目了然。我还说，他们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和军区的“揭批查”运动，不了解这段历史，编稿选材不当，读者能够理解，也可以谅解。他们刊登我的信，非但对杂志声誉无损，而且表现了他们尊重历史和

对读者负责的精神。其实最难的应该是我，因为作者是我早年的部下。但是，不管我如何解释，谈了一个下午，我们始终未能达成共识。但我并未失去信心，这种事情需要耐心。在交谈中这位领导谈到他与军区的名作家、诗人西中扬很熟，也很敬仰，而中扬同志是我交往五十多年的挚友，我产生了请他帮我说服这位杂志社负责人的想法。

虽然大家都很客气，但在告辞时，我还是讲了我的“底线”：倘若我的信不能在他们的杂志上刊登，那我将送到其他报刊或者“上网”。

我随即去找西中扬同志。他去了外地女儿家，直至春节才回广州。听了我的陈述，他答应帮我疏通。很快得到他的回音：杂志社领导基本打消顾虑，原则接受我的意见，但希望我将信作些修改。中扬同志也劝我把信中的一些“楞角”磨掉，问题点到即可。这期间，《许》文的责任编辑也与我两次接触，商讨有关此事的一些具体问题。投桃报李，我也要认真听取别人意见。3月18日，我将原函作了重大修改，尽量语气平和。全文如下：

编辑同志：

《秋光》第334期刊登的《许世友在广州》一文不少情节失实。仅举一例，如该文称，许世友到广州后，江青试图拉拢他，但许不为所动。“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时，江青曾派3名特使给许送来一封亲笔信，称她和许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在祖国的南方和北方为共同的目标而斗争”。有的军区领导建议军区党委组织学习江青来信，并把学习情况向江青报告，而许世友则冷冷地说：“往前靠什么！信是写给我的，我不回信，军区党委也不用写什么报告。”而事实情况是：第一，江青的信并非如该文所说只写给许世友一人，而是写给许和当时在广东省委班子中排名第四的赵紫阳两人的。第二，许世友得知江青派人送信的消息后，即指定军区三大部主要领导去机场迎接送信的3名特使（其中2人是临时借调到北京的广州军区一般干部，另一人是地方作家）；许世友和赵紫阳则在特使们下榻的东山宾馆迎候，并于当晚宴请。许、赵议定：将江青写给他们两人的信立即铅印下发，广东大陆部队发到团，地方发到县；海南岛驻军发到连，地方发到公社。当时我任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受命连夜将信印出。军区党委常委则连夜进行学习，并

以电报向江青报告了学习情况，感谢江青对军区的关怀。第二天上午，又在军区礼堂召开大会，宣讲江青来信。第三，该文的两处江青来信引文，均与原信不符。现随信寄上我保存的江青来信铅印件一份，以供比对。

贵刊素以严肃严谨著称，为了恢复历史真相，防止误导读者，盼能将此信全文刊出。

广州军区司令部离休干部

迟泽厚

2010年12月30日

两信比较，第一，后信完全未提《许》文作者；第二，后信只讲了许世友与江青的关系问题，私生活方面的问题一概删除。第三，前信写了965字，后信只剩下550字。此外，为了不使读者认为杂志社处理此事缓慢，我还将写信时间改为2010年12月30日。我作了很大让步。中扬同志看了修改稿后也说：“够意思了。杂志社大概也不会有意见了。”我又去杂志社将信亲自交给那位责任编辑，并嘱咐他：盼能提前将处理结果告我，如有重大修改，须征得我的同意。

却不料，十天半月过去了，此事竟再无消息。进入4月，我不得不打电话询问那位责任编辑，答称，他们研究了修改稿，觉得语气还是重了，希望再作修改。第二天，我又去杂志社，请他们说个明白。谈话间，同屋的一位女士递过一纸他们代我拟就的修改稿。全文如下：

编辑同志：

贵刊334期刊载《许世友在广州》一文，根据我的亲身经历，部分细节有失实之处。

如该文记述江青来信拉拢许世友一节，我所看到和了解到的情况是：第一，江青来信并非只给许世友一人，还包括当时省委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第二，该文两处江青来信引文，原信中均未见。第三，当时许世友得知江青来信后，即派军区三大部领导去机场迎接，并议定将江青来信铅印下发。广东大陆部队发到团，地方发到县；海南岛部队发到连，地方发到公社。当时我任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受命将信连夜印出。军区党委常委则连夜进行学习，

第二天上午则在军区礼堂召开大会，宣讲江青来信。

广州军区司令部离休干部

迟泽厚

这个修改稿同我的原稿（不论是第一稿还是第二稿）简直是南辕北辙！我当即质问这位编辑：明明我（还有许多老干部）原来讲的是《许》文“严重失实”，怎么现在竟然遮遮掩掩、轻描淡写地成了只是“部分细节有失实之处”？江青的信原是写给许世友和赵紫阳二人的，我何曾讲过“还包括当时省委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为什么要拉与此根本不相干的省委其他领导人来垫背，跟着挨板子？是谁“议定”将江青来信立即下发的？为什么要删去许、赵的名字？-----这位编辑无言以对，似有难言之隐。我数了数，这个修改稿只剩下了255字，倘若刊登时再作点技术处理，一些粗心的读者可能根本不会发现。这真是绝妙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慨叹，大家都承认要讲真话，为什么做起来却这么难！看来我想在刊登过《许》文的这份杂志上评论该文，只能是缘木求鱼了。同杂志社负责人以及责任编辑的7次会晤，十几次电话交谈，还有多名老干部登门反映意见，到最后一刻竟全然无用，一概付之流水！这实在令人心寒，但我又心有不甘。不过我已有言在先，既然我已尽了最大努力，现在只好按“底线”来办了。

2011年5月26日于广州



## 【述往】

## 文革屠杀事件注记二则

杜钧福

《记忆》82期发表了几篇关于1967年湖南道县地区（实应为零陵地区）的大规模屠杀事件的文章，令人回忆起那血雨腥风的年代，不胜感慨。但实际上，在1967至1968年期间，针对“四类分子”和对立派群众的大规模屠杀遍及全国各地，只是因为这些“贱民”命如草芥，他们的悲惨命运几乎完全被史家忽略，直到现在，真相仍然模糊不清，只见到一些零星透露。

## 一、北京1966年“红八月”死难人数不止1772人

《炎黄春秋》今年第二期有孙言诚文章《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对发生在1966年8月的北京郊区大兴事件贡献了一些新材料。首先是关于昌平县的屠杀。以前我们只知道大兴的屠杀，不知道昌平的屠杀。其实昌平屠杀的惨烈程度也不在大兴屠杀之下。从1966年8月27日开始的十几天里，“全县24个公社中就有14个出现打死人的事件，总共打死327人。”披露昌平县事件是非常重要的。以前人们只知道大兴的屠杀事件，总以为大兴这个地方出了什么问题。现在，既然昌平也发生同样事件，而且几乎同时，说明它们可能有同一起源。

其次，关于打死人数目。上面说了，在昌平县，十几天打死327人。大兴呢？大兴县杀人也是从8月27日开始的。“到8月29日为止，黄村、芦城、天堂河公社共有14个大队打死人。”打死多少人呢？没有给出数目。

29日以后的数目倒是有：“从29日到31日，大兴共杀死324人（男232，女92）。”

那么大兴县杀人总数是多少？不知道，但是可以估计至少是五六百人。

这里就牵涉北京市在这一时期的杀人总数问题。有一项广被引用的数据，说是从8月底到9月初，北京市共打死1772人。那么这1772人里，是否包括昌平县的327人和大兴县的五六百人。不少人认为包括，例如卜伟华的文革史《砸烂旧世界》就是这样认为的。

我认为不包括。因为有人统计，在这1772人中，西城区占首位，为333

人，其次是崇文区和海淀区。显然，如果把昌平、大兴这些远郊区也算上，大兴应该占首位，昌平应为第二或三名。而且，如果将这些县算上，总数肯定不止1772人。所以我认为，1772这个数字仅是市区和近郊区（西城、东城、崇文、宣武、海淀、朝阳、丰台）的统计结果。

之所以如此，我猜测，是因为这个统计结果来自北京市火葬场。而远郊县的死人未必送这个火葬场。而且，杀人者未必将其火化。

请看当事人张连和的叙述。他是大兴县干部，曾到杀人最厉害的公社阻止罪行。据他说，杀人者是“随提随审，随杀随埋”，“据说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sup>1</sup>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1772名死难者仅限于北京市区和近郊区，不包括远郊区县。如果包括远郊，则死难者数目远在这一数目之上。人血不是水，这个数目不能含糊。

再者，孙言城的这篇文章还对屠杀事件的起源作了些有益的探讨。他认为，杀人风潮仍起源于8月25日的崇文区榄杆市事件，为被抄家的“小业主”李文波的“行凶”而产生的复仇行动。孙言诚总结道：“复仇的气氛迅速从城里扩散到郊县，终于引起了大兴‘八·三一’事件。”昌平、大兴两事件都开始于8月27日。这样说是道理的。这就证明整个事件是有组织的，不是自发的。

除去昌平、大兴，北京市其它远郊区如何？没见到报道，但不能说没有。

文革前我在顺义县一个村子里四清。文革开始后，他们村的人把原籍本村现居住在城里安定门内的一个杨姓地主揪回去打死。应该说，这件事与我们四清工作队长期对社员进行的阶级教育，即复仇教育有关，但严重违反文革前的政策，<sup>2</sup>他们敢于这样干，说明那个时候确实有这个风潮。

## 二、1968年陕西安康地区的“打尖子”屠杀事件

最近我翻近年来新编的陕西省地方志，发现1968年在安康地区也发生过集体屠杀“四类分子”的事件。例如《安康地区志》说：“1968年5月以后，紫阳县的‘二六派’先后在县城和其所控制的地区，大肆搜捕、杀虐未逃的持不同观点的群众、对方武斗人员家属以及地、富、反、坏分子。其中被野蛮残杀的约

<sup>1</sup> 张连和《五进马村劝停杀》，《那个年代中的我们》，者永平主编，远方出版社，1998版。

<sup>2</sup> 当时政策比法律管用。

400 余人。”

《紫阳县志》也记载在 1968 年 5 月“15 日，‘西线指挥部’对本县汉王城集镇实施突袭，打死对方武斗人员和无辜群众 11 人。此后，‘二·六派’即在县城和本派控制区各地大肆逮捕未逃的不同观点群众，对方武斗人员家属和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并对部分人员施以‘坐土飞机’（背负\*炸药包）、<sup>1</sup>‘下饺子’（推入江河中）、‘鹅卵石掺汤’（乱石砸）等酷刑处死，总计 400 余人（其中四类分子 211 人），杀人事件共为 75 起。”

但是屠杀事件起源于安康，请见《白河县志》的记载：“1968 年 5 月以后，白河两派对安康两派分别依附很紧。都想把安康同观点的‘造反组织’作为自己的靠山。安康两派也分头向同派联系，拉同派势力。5 月底，安康一派出现了杀害对立派群众和‘四类分子’的做法，并在与各县同派联系会议上作了‘经验介绍’。白河一派头目从安康回县后，便召集全县各区、各机关同观点的负责人会议，介绍了安康做法，并发挥说四川、紫阳等地把四类分子杀光了，连子女也杀了，斩草除根。又说：‘我们不能再右了，太右了，要吃亏，就要掉脑袋。’‘现在公、检、法（机关）瘫痪了，我们不管谁管，对‘尖子货’要发动群众搬它几个。’会上有人建议把‘尖子货’送到县上来统一处理，讨论结果是‘矛盾不能上交，就地处理，杀鸡给猴看’。

6 月 14 日，大双公社一干部回去传达了县上派性‘打尖子’会议后，决定召开群众专政大会。6 月 17 日，会上将富农分子赵某先用木棒打死。接着群众之中有人借机泄平日小事纠纷中的私愤：有婚姻不成打死对方的，有知道某人隐私的，还有父母为保护儿女不受污辱被打死的。群众大会上，派头头表扬了凶手，要‘向他们学习’，各生产大队要‘普遍开花’。7 月 5 日~8 月 28 日，大双公社先后以木棒、石头打死、石灰包呛死‘四类分子’3 人，一般群众 3 人。地主分子李某被打死后，一凶手逼一杀猪匠与李之子将尸分为六段，令李之子拖回家中。

6 月 14 日，一派‘司令部’派出 70 余人的武斗队前往茅坪、西营、冷水区帮助‘打尖子’。茅坪区当地派性武斗队到各公社去，走一处，打一处。县武斗队到西营区后，让各公社把‘尖子’带到区上，挂牌子照像后再打。有的用木

<sup>1</sup> \*原文如此，疑有误。

棒打头致死，有的用石头将头砸裂，有的将女性小腹踢打出血致死。7月10日县生产办公室召开‘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一派头头决定将全县杀人的照片放大，在会展出，并听了外地煽动武斗的录音报告。会后，全县又一次形成了杀人的高潮。同时县、区、社武斗队散发了‘群众专政好’、‘打尖子好得很’等标题的传单和油印小报。

从1968年6月17日到9月初，全县5个区30个公社中，有26个公社，以‘打尖子’为名，打死82人。其中地主分子19人，富农分子14人，反革命分子28人，一般群众21人。后经‘路线教育学习班’查明，县、区、社参与策划者16人，直接凶手170多人。事后，除对主要报复杀人的凶手判刑外，其余都以检讨、批评教育结案。”

再看《岚皋县志》所载：“1968年5~8月，‘总部’（‘岚皋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和安康‘红三司’一派）发出所谓‘打尖子，刹住资本主义复辟的歪风’、‘大刹资本主义黑风，狠抓阶级斗争，对尖子货要狠狠打击’、‘打击四类分子中最突出的人，以示威风，吓唬对方’等派性指示。6月，副政委、副司令带武斗队员11人在麦溪公社‘打尖子、刹黑风’中，枪毙地主分子郑大明，令农民何明斋陪杀场。28日，‘永红区司令部’头头带人到榨溪公社‘打尖子、刹黑风’，将马鞍大队中农廖代贵当靶子批斗，毒打致死。7月18日，红星公社枪毙甘在得。同一时期，东风、民主、城关区打死36人。在‘打尖子、刹黑风’中，全县发生抓、打、杀事件41起，搞抓、打、杀主要凶手63人；造成致伤14人，致残6人，枪杀7人，致死38人，逼死3人。”

以上是地方志记载的紫阳、白河、岚皋三县在1968年5月以“打尖子”为名的屠杀事件。安康地区共辖10个县，其余7个县的县志上都没有类似记载。这7个县也应有代表出席安康布置杀人的会，也极可能有类似事件发生。所以上述记载很可能是冰山一角。

上述《白河县志》中谈到，在四川、紫阳等地把“四类分子”都杀光了，可见这种事情发生有个蔓延过程。这种情况在湘南大屠杀中也见到。

在这种杀人风潮中，作为贱民的“四类分子”处在什么地位呢？我们看看来自临近安康地区的汉中地区的宁强县的一则记载：“1968年6月27日，时联指已赶走总指，独家占领宁强县城，但在指挥部的造反人员，闲暇耍得无聊，这

天就有人提议搞几个‘五类分子’来审一审解闷。后来一女学生叫来地主分子胡中衡审问，胡拒不承认自己是所谓‘五一军’这凭空杜撰出来的反革命组织成员，联指的审问者就动手拷打，女学生也不甘示弱。胡中衡大喊冤枉，引来了联指四五十人，群起而殴。住在粮站的联指武斗一班闻风赶来，用枪托、枪筒乱捅乱打，刹那间胡中衡就一命呜呼。事后为了欺骗社会舆论，次日还召开了公判会，宣布胡中衡罪状。”<sup>1</sup>一个人的性命被当作解闷的材料。

在此期间，安康地区总共集体屠杀了多少人（武斗死亡的不算）？从地方志记载来看，应在千人左右或千人以上，和大兴事件相当。但是实际情况可能远在此数目以上。请看一位老者的记述：

“1968年4月，在安康武斗急剧升级的影响下，我们镇子里也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杀人狂潮。先是一批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纷纷被杀，后来掌权的造反派又杀了一批他们的敌人（不同观点的造反派）。一时间小镇乌云遮蔽，腥风血雨，人人自危，茶饭不思，慌不择路。

同年6月底。在距小镇二十余里外的一个叫水田坝的地方，要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公开处决大会。说他别开生面是因为今天在这里要产生一个杀人冠军：一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三十七、八岁的叶姓战斗英雄、老党员宣称他能用双手拿刀，一刀一个地砍脖子，做到手起刀落，人头落地并像滚西瓜一样的滚到十几米的坑里。今天他将要给革命群众现场表演。后面的情景我也不描述了，总之这个叶姓的英雄用自己杰出的行动证明了自己。那一天他一个人就砍了六个人头，杀人冠军自然非他莫属。

1968年的7月，小镇的五类分子已经杀得差不多了（有的看势头不妙就自杀了），全区（区公所）十个公社的五类分子也杀得差不多了。”<sup>2</sup>

“五类分子已经杀得差不多了”可能真实反映了安康地区在1968年5至7月的实际情况。由于该地区地处陕南偏僻山区，人口稀疏，被害者的相对比例和造成的社会震动应不在湘南大屠杀之下。

以上二则显示，不管在首都北京，还是陕南一隅，以及全国各地，文革期间残暴的反人类罪行远远未被充分揭露。

<sup>1</sup>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宁强》，宁强党史网。

<sup>2</sup> 秦岭安康《文革记事：小镇掀起了杀人狂潮》，新浪博客，2011。

## 【读书】

读《毛泽东最后的革命》<sup>1</sup>

范世涛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一书简体中译本 2009 年由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出版<sup>2</sup>。通读之后，深感其细节丰富，叙述生动，考订精细，评论富于洞察力，总体上值得信赖倚重。可以预计，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该书将是文革史研究者案头的基本参考书。本文作者从该书得到很多教益，我还是打算将书评的（作者像）重点放在陈述不同意见上。因为作者坚信，批评比赞扬更有建设性，也更有利于相关研究的深入展开。以下书评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指出全书是“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这个基本立论的展开，但偶尔没有把基本立论贯彻下去；第二部分探究全书结构不平衡的原因，对背后隐含的费正清假说提出了质疑；第三部分例举若干细节，指出书中存在一些事实方面的错误需要订正；第四部分对该书关于征引材料的精彩说明以及注释、索引进行了扼要介绍；第五部分简评中文本翻译质量。

## （一）关于毛泽东对文革的独特作用

正如书名如示，两位作者将文革在总体上看作“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这里隐含了毛泽东 1976 年的自我评价：

“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

<sup>1</sup> 本文原为 2010 年 6 月 26 日在北京召开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研讨会会议论文，此次发表时做了进一步修改。感谢吴迪老师邀请我出席会议，感谢沈迈克、阎长贵、何蜀、卜伟华、启之（吴迪）、唐少杰等老师对本文的指正和评论，文中的错误和不当之处应由本文作者负责。

<sup>2</sup>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沈迈克《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关心译，唐少杰校，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10 年。下文凡引用该书，只注《最后的革命》，不另注作者、译者、出版社和出版时间。



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sup>1</sup>

当然,这不只是毛泽东自己的意见。林彪早在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大家看得很清楚,这个运动(指文革)从头到尾是主席发动的,主席领导的。”<sup>2</sup>1967年经修改后公开发表的“五·一六通知”也称文革为“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sup>3</sup>。

粉碎“四人帮”后,文革期间形成的命题大都被重估,但“文革是毛泽东领导和发动的”这一命题却继承下来了。如《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sup>4</sup>

所以,两位作者强调毛泽东对文革史的突出作用,称文革为“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可以得到不同时期、不同立场的权威文献支持。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将“文革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作为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具体落实到各项文革史实的组织和描述过程中,全书各章节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一基本命题的逐次展开。通读全书后,读者对这个基本命题的丰富含义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文革中的许多重大事件乃至整个文革,没有毛泽东的首肯或者决定,是无法进行的,是无法出现的”<sup>5</sup>(借用王年一先生语)。比如“文革”结束后,姚文元因《论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饱受批评,而书中指出此文是江青经毛主席同意去上海组织力量撰写的,而且“毛在姚文发表前亲自对文章第九稿修改了3遍”<sup>6</sup>;大部分读者因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为座谈会果然是林彪委托召开的,本书指出是“江

<sup>1</sup>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00-601页。

<sup>2</sup> 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1967年2月,第16页。林彪的这个讲话是我所能找到的最早陈述这一命题的文献。

<sup>3</sup>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载冶金部机关《大联委》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习文件》第九辑,1967年6月,第9页。

<sup>4</sup>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导言”引用了这句话,并在“结语”回到这个主题,用一节的篇幅专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里的有关定性判断。参《最后的革命》,第3页、第460-463页。

<sup>5</sup> 王年一《序言: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载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第XX页。

<sup>6</sup> 《最后的革命》,第18页。

青向林和叶提出了召开解放军文艺座谈会的建议”，“《红旗》总编辑、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以及张春桥、姚文元都对上述会议纪要进行了修改，毛本人也进行了不下3次的修改”<sup>1</sup>；对于林彪出逃事件后一些老干部复出工作，老辈人和国内作者习惯于将其归功于周恩来总理，此书则指出，“显然是毛主动提出、周负责执行的”，“在少数人们能知道细节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负责的案件中，都是毛做出了最终裁定”<sup>2</sup>。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来。

在更可靠的事实基础上，读者可能会修正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比如，大家知道了事情经过，就会明白以往对《论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或林彪、江青的激烈批评甚至丑化处理中，其实不自觉地包含了对毛泽东的激烈批评和丑化处理；以往对周总理的很多热情赞颂中，其实不自觉地包含着对毛泽东做出正确决定时的颂扬。

虽然本书展现了“文革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这一命题的丰富性，但有时候没有将这个判断贯彻到底。比如书中说，林彪去世后，“周恩来利用毛的摸棱两可，花了数月的时间暗中反左”<sup>3</sup>。这个流行说法的来源，可能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72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

其实，毛泽东才是反对极“左”首要的决策者和支持者。早在1967年2月，毛泽东在一份报告的批语中称“支持极左派的主张，值得研究”<sup>4</sup>；5月，毛提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sup>5</sup>；9月，毛泽东在审改署名姚文元的长文《评陶铸的两本书》时加入了以下内容：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

<sup>1</sup> 《最后的革命》，第31-32页。

<sup>2</sup> 《最后的革命》，第349页。

<sup>3</sup> 《最后的革命》，第359页。

<sup>4</sup> 毛泽东《对王明昆关于成立“西安地区革命造反委员会”等情况汇报的批语》（1967年2月14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29页。

<sup>5</sup> 参《在唐闻生、王海容来信上的批语》（1967年5月29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59页。

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sup>1</sup>

这篇文章流传广泛，被一再翻印和学习。此后数年，围绕“三红”（无产阶级司令部、人民解放军和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批判极“左”是中央报刊宣扬的主旋律之一。看看这些标题吧：“戳穿陶铸‘怀疑一切’的恶毒用心”<sup>2</sup>（“怀疑一切”是文革中对极“左”思潮的基本描述）、“无政府主义是对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sup>3</sup>（这是针对“矛头指向新生的革命政权”的）、“反对极端民主主义”、“正确的领导必须服从”<sup>4</sup>（这两个题目都是针对革命造反的）、“反对小团体主义”、“共产党员要彻底克服资产阶级派性”<sup>5</sup>（这两个标题都是对“派性”做阶级分析的）。1970年3月，全国上下正式展开“批清”运动，所谓“批”，就是“狠批极‘左’思潮”的缩略语；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这个运动仍在热火朝天地进行。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将林彪与王关戚相提并论说他们支持“打倒一切”，林彪是“五·一六”的“总后台”，1972年6月又说：“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sup>6</sup>因此，中央下发的26号、31号、38号、42号文件都提到批判无政府主义内容，31号文件（四川的批林整风问题）上更明确指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总头子就是林彪，煽动极‘左’思潮的总根子还是林彪。”<sup>7</sup>

所以，从1967年9月到1972年，通过批判极“左”以得到社会秩序，一直都是毛主席支持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一，也是1970年以来上上下下各单位积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动力。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也就根本没什么必要

<sup>1</sup> 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人民日报》1967年9月6日；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72页。

<sup>2</sup> 通信兵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戳穿陶铸“怀疑一切”的恶毒用心》，《解放军报》1967年9月10日。

<sup>3</sup> 上海东方红造船厂工人高志仁、天津大沽化工厂工人评论组《无政府主义是对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红旗》1969年第9期。

<sup>4</sup> 《人民日报》工人、解放军通讯员张引生、王诚、葛玉成《反对极端民主化》，载《人民日报》1969年7月29日；北京铁路分局北京站区工人报道组《正确的领导必须服从》，载《人民日报》1969年9月15日。

<sup>5</sup> 驻天津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共产党员要彻底克服资产阶级派性》，《人民日报》1969年10月21日；驻北京轻工业学院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文友平《反对小团体主义》，《人民日报》1969年9月12日。

<sup>6</sup>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41页。

<sup>7</sup> 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香港：明报出版社，2002年，第617页、第628页。

“暗中”反左，反左时也说不上“顶着极大的压力”。

当然，张春桥、姚文元不希望将批林整风焦点继续放在批判极“左”方面，认为“批林批够了，极左也就批了，一批二清”<sup>1</sup>，毛泽东不久也提出，“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sup>2</sup>。周恩来在1972年12月后，确实面临“极大的压力”，但不能认为他在“毛泽东思想”变化前的压力有多大。

## （二）关于篇章结构中隐含的“费正清假说”

翻开《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的目录，我们几乎马上就会注意到这部书结构安排上很不平衡。除了导论和结语，全书正文共计25章，而1966-1969年的部分占据了将近18章的篇幅<sup>3</sup>，接下来的1969-1976年只有7章多一点，还达不到1966-1969年篇幅的一半。

为什么作者对前三年这样偏心呢？他们在书里交代得很婉转，反而是卜伟华在《砸烂旧世界》“后记”的脚注里清楚明白地指了出来：

2003年11月，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我问从美国来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专家麦克法夸尔：“据您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一共搞了多长时间？”麦先生不无幽默地回答：“我们原来认为是三年，不过为了与你们国内的口径一致，而且也为了我们的书能在中国更好地销售，我们把它改成了十年。”<sup>4</sup>

这里的“我们”，正是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我们的书”，正是我们这里谈论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从麦氏的回答，我们知道这部书只是“为了与国内的口径一致”才写了10年而不是3年的；他们的实质性意见是文革在1969年其实已经结束。在2010年6月的一次研讨会上，沈迈克也说，自己本来想写3年的，但麦克法夸尔不同意，才写了10年文革史<sup>5</sup>。

文革史重心在前三年的看法并非《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首倡。麦氏和费正

<sup>1</sup> 张春桥、姚文元1972年8月8日晚接见人民日报社鲁瑛、吴冷西、王揖、陈浚、潘非、崔金耀、薛书田7人时的谈话内容。引自一位《人民日报》社工作人员的笔记，本文作者收集。

<sup>2</sup> 这一意见由周恩来在1972年9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参毛泽东《对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如何开展批林整风的意见》，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19页。

<sup>3</sup> 第13章、18章都包括一些1969年后的内容，所以这里只说“将近”。

<sup>4</sup>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当代中国文化出版中心，2008年，第793页，脚注2。

<sup>5</sup> 2010年6月26日沈迈克在北京《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研讨会上的发言。

清编的《剑桥中国史》第15卷涵盖了1966-1982年的历史，第一篇和第二篇的标题分别是：“‘文化大革命’：混乱中的中国：1966-1969”、“‘文化大革命’：为继承权而斗争，1969-1982年”<sup>1</sup>，这表明麦氏与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里已经将1969年作为分水岭来看待，认为此前三年是关于“混乱”的历史，此后的主题是“继承权”，1969年被作者看作“混乱”的结束。如果把文革理解为“动乱”，在他们看来1969年其实就结束了，后7年的历史主题是“继承权”而不是“动乱”。

《剑桥中国史》第15卷也还不是最早倡导文革三年说的文献。正如王年一指出来的，“世界上最孚众望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在其著作《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一书中说：“‘文化大革命’持续了三年，即从1965年末到1969年4月。’”<sup>2</sup>

这就很清楚了，最早明确表述实质性的文革史只有三年的是费正清，麦氏与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对此做了发挥，《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沿用了这个叙述框架。全书篇章结构的不平衡，正是两位作者的有意而为之，在他们看来，九大后的7年也就只是为结束前3年的“拖沓”、“缓慢”进程<sup>3</sup>。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可以用首创者的名字命名，将“实质意义上的文革史到九大已经结束”称为“费正清假说”。既然国人认为文革合计10年，那么从费正清假说出发，可以得到一个文革史分期假说，即文革史应以中共九大为分水岭，其重心在于前3年。我们可以把这个“费正清假说”的变体称为“三七说”。

王年一高度评价费正清假说：“不要认为这是无关紧要的小问题。只有依历史的本来面目将文革界定为三年，才不致于淡化文革的特点。正是在三年中，文革的特点暴露无遗。”这“是一个怎样依照历史的本来面目书写历史的问题”<sup>4</sup>。

我不赞成费正清和沈迈克先生的意见，也不赞成王年一先生的判断。在我

<sup>1</sup> R.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1991），《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俞金尧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2007年第4次印刷本。

<sup>2</sup>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刘尊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378页。

<sup>3</sup> 中文本，第289页。

<sup>4</sup> 王年一，《序言：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载《“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第XX页。

看来，费正清假说是一个并不合乎“历史的本来面目”的误导性假说，它弄错了分水岭，低估了一打三反和批清运动造成的“浩劫”，“淡化”了文革的特点，使全国性“浩劫”大致结束时间提前了两年半；同时夸张了九大在10年文革史上的意义，使一打三反和批清运动与清队之间的强连续性被人为分割开，后7年历史的丰富性则被大大低估了。

就文革“浩劫”来说，“生命代价”最为沉重的时期首推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其次就是1970年全国普遍展开的“一打三反”和“狠批极‘左’思潮，深挖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简称“批清”）。这三项运动时间接近，手法和精神一致，都是在“砸烂公检法”条件，以政权专政与群众专政结合的方式展开；延安肃反九条为其总纲，“六厂二校”为其样板，“叛徒”、“特务”和“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为最漫无边际、普遍随意的“反革命”形式，数千万计的人在运动中经历了痛苦和不幸<sup>1</sup>。仅1970年和1971年间的批清运动高潮中，就上千万人受到隔离审查，中央直属106所五·七干校无不以深挖“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为主要政治功课，“造反有理”时代的每一件事几乎都被重新评估和系统清算，昔日的英雄经历了持久的“逼供信”和“攻心战”。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威胁下，谎言、告密、诬陷、非正常死亡在全国蔓延，人际关系冷至整个文革期间的最低点。如果认真考虑这些生命经历，1969年-1971年间的肃杀孤寂就只是“动乱”已经基本结束的假象，恰恰相反，“动乱”变得更为普遍、荒谬和深刻了。

那么，文革中什么时候才大体结束了全国性的“动乱”呢？我认为是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一部权威的毛泽东传记未加说明地采用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认为作为一个“重要转折”，“九·一三”事件“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sup>2</sup>。其实，“九·一三”事件作为“重要转折”的真正意义是主观方面的——它对每个人都是一场试图从盲从盲信中解脱出来的启蒙，所有的人都被这个消息震惊，所有人都开始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上上下下开始了心理和行动上的调整，大批大批的中国

<sup>1</sup> 如书中引用了魏昂德和苏扬的估计数字，农村地区大约3600万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受到迫害。参《最后的革命》，第265页。

<sup>2</sup>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605页；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34页；《最后的革命》，第341页。不过，这几部作品均未指明这一说法的来源。



人（而不是极少数思想先驱）开始学习用自己而不是别人的眼睛和头脑去分辨是非<sup>1</sup>，不再象以往那样将自己全心全意托付给另外的人或组织，一声令下、亿万呼应的局面再也不看到了。这是实质意义上的断裂。

由于政治动员失去了强大的号召力，“九·一三”事件后党政机构组织的运动往往徒具形式，干部、群众与中央号令之间的紧密关系变得日益松弛，在以前运动中受过打击的人重新燃起了希望，正常的人际交往逐渐恢复。政府内部的反思声音也越来越强，甚至例行的文件也不容易写出来了<sup>2</sup>。这一切构成“九·一三”至文革正式结束的主题。为了说明这一点，这里只举公安部这样一个重要部门的例子：

（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公安部从核心小组到广大职工中产生了“算旧帐”和反“算旧帐”两种意见，实际上是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分歧和争论。

……

关于“算旧帐”问题的争论，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了核心小组中矛盾的焦点，无论中央领导怎样批评，也无法使问题得到真正解决。遵照周总理指示，应该统一思想，统一思想后写报告报国务院。李震起草的报告中有“‘算旧帐’有损于文化大革命，有损于毛主席”的话，于桑不同意，经核心小组多次讨论意见还是不统一。“报告”拖了很长时间定不了稿，直到李震死的前夕，在核心小组会上讨论时还争吵不休。报告最终流产。

1973年10月20日是星期六，晚上开的核心小组会上因讨论报告意见不一，于桑同曾威拍桌子争吵起来，会开不下去了。21日是星期日，我因发低烧和牙疼躺在家中，白天李震来看我。他心情很沉重，说：“你看昨晚又吵起来了。”我劝道：“意见不一吵几句没有关系，只要你不吵就行了。”坐了一会儿他就走了。领导班子思想不统一，无法向上交代，我非常同情他。<sup>3</sup>

从上述回忆，我们知道“九·一三”事件后，公安部核心小组围绕有“最高指示”根据的几件事发生激烈争论，这一争论迅速扩展到整个部机关，形成旗鼓相当的两派；领导对两派争执一再提出批评，双方还是无法达成一致。而这在

<sup>1</sup> 诗人顾城对此有很好地概括：“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首诗题为《一代人》，最先发表于1980年第3期《星星》诗刊。

<sup>2</sup> 两位作者将1972-1976年间中央文件数量的明显减少主要归因于毛泽东的健康，我认为政府内部创制文件的能力下降才是根本原因。

<sup>3</sup> 施义之《我在公安部的十年》，自印本，2002年，第43-45页。

“九·一三”事件之前是无法想象的：仅凭“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或“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一派就可以把另外一派中的重要人物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并实施群众专政或政权专政。这场争论甚至导致1973年10月22日公安部李震部长自杀<sup>1</sup>。从这个有限的案例<sup>2</sup>不难看出，经“九一三”事件打击，文革事实上死了；它也意味着“九·一三”之后的历史并不象看上去那么“拖沓”、“乏味”。

所以，如果要选文革史上一个时间点作为分水岭，我不会选中共九大，而会说“九·一三”事件。以此划界，前5年的历史相对独立完整——造反者响应革命号召起来造反，造反者被响应号召的革命政权和革命群众专政。接下来的5年，则是一个一边倒的全国性人民内部战争不断弱化的过程，也是希望不断成长的过程。这个分期方法在时间上更为平衡，10年文革史，前后各5年，或许可以称为“五五说”。

卜伟华曾经解释过，为什么将1966-1969年看作一个相对独立的段落（或者说是狭义的文革）：一是党政体系经历了完整的从砸烂到重建的过程，二是前三年以群众运动为基本形态，此后回到了文革前一切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状态<sup>3</sup>。

在我看来，党政体系和群众运动的相互依存关系才是前期文革史的关键，分开考虑这两样会高估了群众运动的自主性，进而影响对文革史分期的整体判断。

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赫鲁晓夫背离了列宁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国际背景下，为了国内反修防修的需要发动和展开的。也就是说，毛泽东要继续沿着列宁、斯大林的道路前进。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的呢？列宁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由政党来领导的，而政党通常是由担任最重要职务而被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集团来

<sup>1</sup> 施义之，2002年，《我在公安部的十年》，自印本，第45-47页。

<sup>2</sup> 这绝非孤例。如《难忘岁月：余贻骥回忆录》（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年）指出，“林彪事件推动‘文革’拨乱反正的渐变”，指出实际上“九·一三事件”“成为‘文革’形势逐步有所转变的契机”。作者说，1971年9月，“我发现，这个文件（指传达林彪出逃事件的文件）传达之后，干校和社会气氛似乎都出现了微妙的变化，那些满口阶级斗争整人的人，似乎靠山崩塌，相对垂头噤声了，对我们这些在‘文革’开始不久即以莫须有罪名，作为专政对象，被非法监管斗争的所谓‘一小撮’，似乎也减少了公然的歧视。因为当时的主政者不能不考虑重新区分敌、我、友。”（第126-127页）

<sup>3</sup>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第794页。

主持的。”<sup>1</sup>斯大林说，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由“指导力量”和各种“引带”、“杠杆”组成，是它们的总和。“指导力量”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即共产党；“引带”和“杠杆”首先是各级政府，还包括经济组织和群众组织<sup>2</sup>。

文革时期的政治体制正是列宁-斯大林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不同变体。在文革初期，毛泽东将首要的“引带”和“杠杆”从原来的党政科层机构转移到中央文革小组（后来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宣传机关和国务院，并允许和鼓励群众对原有党政科层机构进行造反、夺权和人员专政。在此过程中，群众的政权认同出现分歧，一部分群众继续认同以往的各级党政机关领导而不信任中央文革小组（如联动），而越来越多的群众则追随中央文革小组和舆论宣传积极造反、夺权。在这个体系中，群众运动无论看起来怎样不同寻常，其实都没有超出列宁-斯大林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基本构造一个环节或“引带”、“杠杆”的范围，几乎所有群众组织也无意脱离这个体系去干“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事。

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军委办事组、国务院、革委会、军工宣队（尤其是军宣队）或军管会承担首要的“引带”和“杠杆”功能，群众依然是“引带”和“杠杆”，但他们要听从的首先是革命委员会或军代表号令，而不能对中央精神自行其是地理解和阐释了。至于前一阶段的群众组织认同分歧，被重新定义为小资产阶级派性，属于资产阶级思想，是敌我矛盾。通过对派性的阶级分析<sup>3</sup>，早先的造反者、特别是大批造反派领导人，被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或军代表、军宣队员动员重新定义的“革命群众”陆续整肃；至于说革委会或工军宣队领导下的“革命群众”，虽然不再是有形的群众组织，但同样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引带”和“杠杆”。

所以，1966-1968年社会运行的基本形态固然表现为群众运动，但中央的领导其实从未缺席，群众也是自觉响应中央号召、乐于充当党的“工具”、“引带”、“杠杆”的；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虽然干什么首先通过军政体系，但清队、

<sup>1</sup>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载《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97-198页。

<sup>2</sup> 斯大林《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1926），载《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11-434页。

<sup>3</sup> 毛泽东对北京大学的一份对派性做阶级分析的报告中批语：“派性是阶级的一翼”，1968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乘胜前进——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社论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这一批语。参毛泽东《派别是阶级的一翼》，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91页。

开门整党、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无一不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过程，大部分群众同样积极响应号召投身“继续革命”。从九大到“九·一三”事件之间的肃杀社会氛围容易给人错觉，认为群众运动不复存在了。其实运动只是变化了地点（主要在单位内部）和形式（不允许“反革命串联”）罢了。在纠正极“左”、消除派性、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合理诉求掩盖下，大批革命群众积极投身于另一场残酷荒谬的人民战争，而造反者和其他“现行反革命分子”被群众专政和政权专政<sup>1</sup>。直到“九·一三事件”后，这种群众与中央领导之间的紧密关系日趋松散，人民内部战争的动力不断衰减，在此意义上，“九·一三”而不是九大才是一个关键分裂点。

即使不考虑群众运动与党政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分别考虑党政系统和革命群众，1969年的九大也难以构成分水岭。首先，从党政系统看，全国省级革命委员会普遍建立、山河一片红是1968年，而不是1969年的九大；整党建党1967年第四季度已经开始，九大对整党建党的意义仅限于一个新党章和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作为全国性的整党建党运动，其实1970年才全面展开，到1971年8月全国省级党委才建立起来。其次，从群众运动看，群众组织固然在1968年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群众组织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原先群众组织夺权行为在批清运动和一打三反中成为“极左”、“现行反革命罪行”，原来群众组织的很多领导人物被原来的同志揭发，革命者转而成为革命对象，在这个转折中九大缺乏深刻意义。

根据五五假说对三七假说提出批评后，《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在篇章结构上头重脚轻的问题就比较明显了。这里提出两个改进建议，或许有助于更好地呈现文革史轮廓。

一是建议将第13章“五·一六阴谋”一分为二。现在的13章改称为“王关（戚）事件”或“反革命小爬虫”，围绕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的隔离审查，讲述“火烧英代办”、“揪军内一小撮”等事件；在书中第19章的位置，增辟专章介绍清查“五一六”运动。

现有的写法将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与1967年火烧英代办等事混在一章其实很不妥当。王力等人固然在1967年就被指为“五·一六”的“黑后台”，

<sup>1</sup> 目前中国社会对造反派和红卫兵的主流观念其实是1968-1971年间确立的，很大程度反映了工军宣队、革命委员会的态度和判断。

但他们当时被隔离审查的主要意义不在“五一六”，而在于这件事极大影响了各地红卫兵和造反派派系格局，成为文革方向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志性事件。

至于清查“五·一六”运动，虽然截止到1970年初抓起来的已经不少，比如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总人数2000出头）一个单位就已经“抓了400多人”<sup>1</sup>，但就全国范围说这还只算个引子。真正成为各部门、各地方开展的运动，其实是1970年-1971年10月。这段时间下发过两个纲领性的中央文件，一是1970年3月27日中央下发的《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一是1971年2月8日下发的《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简称“二八决定”，含附件）<sup>2</sup>。所以，关于清查“五一六”分子的章节位置应更为靠后。而且，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很多关键内容，包括周恩来总理关于“重组织”与“重罪行”的著名区别，所谓“围攻中南海事件”等重点事件，需要补充进来。

二是建议增加对林彪事件影响的描述。仅仅在第20章蜻蜓点水地说一说此事对文革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sup>3</sup>。充分重视“九·一三”事件对全国上下的意义，才能真正避免将1971-1976年的故事变成“一小撮政治精英的沉浮”，或是只为结束前三年的“拖沓”、“缓慢得如此让人绝望”的进程<sup>4</sup>。

### （三）关于书中的一些细节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细节丰富，考订精细，但仍有一些地方不可靠。这里举一些例子来说明。

1、关于“五·一六通知”的解密问题。两位作者说“五·一六通知”在“一年后解密”（42页）。该文件一年后并未解密，只是经修改后公开了正文主要内容，而且公开的文本与文件文字上有不少差别。如正式文件仍称“彭真同志”，公开的文本已经变成“彭真”；正式文件里没有“这场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公开文本里有。另外，正式文件有牵涉广泛的附

<sup>1</sup> 这一数字根据本文作者收藏的一册文革时期“工作日记”本。

<sup>2</sup> 二八决定的附件是1943年整风审干决定，参《顾准日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第375、387页。对于这个附录，吴德在《十年风雨纪事》（吴德口述、朱元石整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中有所说明，“毛主席指定我们成立联合办公小组，周总理找我谈话时，我就提出过应该有个政策，周总理当时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延安肃反时的九条方针说，就按这个原则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办。”（第78页）

<sup>3</sup> 《最后的革命》，第342-243页。

<sup>4</sup> 《最后的革命》，第289页。

件，公开文本根本没有附件<sup>1</sup>。

2、关于关锋和戚本禹。书中称关锋“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引起了毛的注意，他用尖刻的语言匿名批评了人类学家费孝通”（第30页）。费孝通是最著名的“右派”之一，当时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找根据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写文章批费孝通的人车载斗量，毛泽东何必因此重视关锋呢？

其实，叶永烈曾经采访关锋并问及他是怎样引起毛泽东注意的，关锋称，“那是连他自己都未曾想到的”，“那时，关锋常喜欢写点杂文、杂谈之类，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有一回，关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一文，文末提及‘中国哲学史应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不料，每日翻阅各报的毛泽东，竟很仔细看了此文，毛泽东为关锋的文章写下一段批示。由此，关锋声誉鹊起。”<sup>2</sup>叶并不是历史学家，但这里介绍的情况与1961年关锋出任《红旗》杂志社中国哲学史组组长是吻合的。

书中称1966年初，“关和戚进入了中央委员会的正式理论刊物《红旗》”<sup>3</sup>。关锋虽然以前并未参与《红旗》的具体编辑工作，但他早在1958年末就调到了《红旗》杂志社担任编委，后胡绳、邓力群还为他专门组建了一个由他任组长的中国哲学史组。戚本禹是1964年进入《红旗》的。<sup>4</sup>

3、文革什么时候渗进中南海？作者说，“1967年1月1日，文革渗透进了中南海。”<sup>5</sup>其实书中引用过的邬吉才《红色警卫》一书已经提到更早的事情：

1966年9月23日回到中央警卫局，“得知警卫局机关陆续贴出的大字报揭出的各种问题。在外地，我对本系统的一些领导已经受到了冲击毫无所闻，所以当我听说有一张大字报提到北京警卫系统有个‘吃喝集团’，点了许多我们系统领导者的名，当时的感觉是这真是个‘爆炸性的消息’。

但很快我就知道了，局里的有几位领导，像副局长田畴、王生荣，还有张文健等处级干部，已经被弄进中央办公厅的‘学习班’去了，去那里的人一般都

<sup>1</sup> 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第995页。

<sup>2</sup> 叶永烈《采访关锋始末》，载叶永烈《追寻历史真相——我的写作生涯》，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本处引文引自网络  
<http://www.crt.com.cn/news2007/News/shmw/2008/15/081518100K1E0GE59A797GE41CB322.html>。

<sup>3</sup> 《最后的革命》，第30页。

<sup>4</sup> 王广宇、阎长贵，《我们所了解的王、关、戚的一些史实》，载《党史博览》2005年第12期。

<sup>5</sup> 《最后的革命》，第149页。

是‘有问题’的，但确切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没有人正式介绍，我只是听了些有关的传闻。”<sup>1</sup>

1966年9月中央警卫局的几位领导已经被“弄进中央办公厅的‘学习班’”，表明当时中南海已经受到严重冲击。这显然还不是开始。《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大事记1950-1995》一书提供了更早的信息：

1966年5月10日，“国管局开始揭发内部问题，有人贴出‘高登榜和习仲勋是什么关系’的大字报。14日，在局机关党委会和全体干部会议上，传达国务院机关党委书记在院党组会议上的讲话，说‘有人贴习仲勋的大字报，可以贴’，还提出‘要肃清习仲勋、余心清的影响’。接着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有人在国管局贴出‘高登榜与彭真、杨尚昆是什么关系’的大字报。高登榜被院党组认为和彭真、习仲勋两个所谓‘反党集团’有关系，因而被当成了运动的重点。”<sup>2</sup>

可见，国管局第一张大字报早在5月10日贴出，国务院机关党委书记在5月中旬已表态支持贴大字报揭发习仲勋、余心清。所以，中南海的文革开始时间其实领先于北京的很多单位。

这一点不难理解。中办、国办是公文流转的中枢机构，对政策变化得风气之先，工作人员最先响应也就在情理之中；何况习仲勋1962年就被指为“利用小说反党”，原中办主任、中直机关党委书记杨尚昆的罪名随文革开始而升级，按照当时揪“黑帮”、“黑线”的逻辑，同单位的人找出与习、杨有工作关系的同事上纲上线，可说是理有固然、势所必至。

**4、关于杜向光和财政部夺权。**书中引用了周恩来1967年2月17日批评副部长杜向光的讲话，说明周主张夺权是“政治行动”而不是“业务行动”。其实，事情并不是那样的。

财政部夺权是分管副总理李先念响应号召，主动邀请造反派夺权的。1月19日他电话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八·八战斗队，说“敖本立，你们为什么还不到财政部夺权哪？！”于是，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八·八战斗队和财政部造反派次日共同在财政部夺权，并成立财政部革命造反司令部。夺权后，财政部党组副书记

<sup>1</sup> 郭吉成、王凡《红色警卫——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郭吉成回忆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第110页。

<sup>2</sup>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大事记编撰委员会《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大事记1950-1995》，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印刷厂，1995年，第343页。

吴波 21 日转达了李先念的“祝贺”和“业务权可以夺，试一试”的指示<sup>1</sup>。22 日周总理通过财办给革命造反司令部电话要求下达 1967 年预算，司令部也马上落实。同日由毛泽东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要求，“一切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窃取的党、政、财等各种大权，统统要夺回来！”所以，财政部 1 月 20 日的夺权（包括业务权）从过程上说是比较顺畅和有秩序的，既符合分管领导的要求，也符合中央的精神，还得到周总理交代的任务。其中，副部长杜向光是夺权后监督留用的干部之一，参加了 1967 年预算编制工作。

但是，周总理 2 月 6 日通过联络员董枫又传达三点指示：（1）财政业务权不能夺；（2）指定杜向光抓业务；（3）67 年的预算指标三、五天内下达<sup>2</sup>。对造反司令部来说，这是不是意味着原来的夺权行动夺错了呢？他们感到困惑，“感到突然”。杜作为革造司令部留用干部，让他去抓业务就意味着要从得到过上级肯定的造反司令部那里夺权，这显然很困难。所以，杜希望面见总理后再决定是否抓业务。但等到 2 月 17 日，杜才在大会上见到周，却被周说成“破坏我们无产阶级大革命啊！”、“给他的命令不服从！”、“他是来夺党中央的财政大权哪！”命令解放军当场逮捕。此后“夺党中央的财政大权”一直成为杜背负的罪名，特别是清查“五·一六”运动时，财政部夺权被列为大案要案，杜长期饱受折磨。

5、关于“揪军内一小撮”口号。《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对这个重要问题的论述，主要依赖《王力反思录》一书；而近年来至少有三位重要作者——林杰、阎长贵、何蜀——对王力的说法提出了补充和更正<sup>3</sup>，所以《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相关论述显得落后甚至不可靠。比如，林杰指出毛泽东不会象王力说得那样，说“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sup>4</sup>，毛不会这样说话，而且“毛主席早已明确指出‘揪军内一小撮’就是乱军，就是‘毁我长城’。中央文件也早已指出‘是党纪国法所不允许的’。因此，根本不是不策略问题。说这个口号是策略错

<sup>1</sup> 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财贸口文化大革命调查小组《关于财政部文化大革命情况调查报告》，1967 年 4 月，铅印本，第 9 页。

<sup>2</sup> 同上，第 15-6 页。

<sup>3</sup> 林杰《“揪军内一小撮”的提出和斗争》，2008，见乌有之乡网站，<http://www.wyxsx.com/Article/Class14/200808/47311.html>；阎长贵《“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实质和来龙去脉》，载《党史博览》2006 年第 6 期；何蜀《“文革”中的“揪军内一小撮”问题辨析》，载《当代中国研究》2004 年第 1 期。

<sup>4</sup> 《王力反思录》，下册，第 1014 页；《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中文本，第 234-235 页。



误，实际上是替‘揪军内一小撮’辩护。”<sup>1</sup>

另外，《吴法宪回忆录》中提到过，九大期间康生、张春桥曾对他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周恩来批准的，《人民日报》的社论也是周恩来审阅过的<sup>2</sup>。

6、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重组织”与“重罪行”区分。《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对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经历的几个阶段没有弄清楚，所以第13章有几个判断是不正确的。

正如周恩来1970年11月指出的，“‘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这个集团定性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sup>3</sup>。所以，1970年3月27日中央下发的《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强调这是个组织严密的“阴谋集团”。落实到清查过程中，就格外强调组织关系、填表与否等等。但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本来就不成立，哪里会有表格呢？于是运动中出现大量“逼供信和诱供、指供”<sup>4</sup>。而由此得来的材料根本经不起内查外调，运动如何进行下去呢？于是，周恩来1970年11月后对“反革命阴谋集团”概念做了发挥，称“搞阴谋活动就是‘五一六’”，“是不是参加组织，填表没有，不是主要的。要重本质，罪行就是本质，形式是第二位的。”<sup>5</sup>这样一来，落实“最高指示”的思路就开阔多了。在“重罪行”、“大破神秘化”的新指导思想下，1971年2月8日下发的《中央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中明确规定，“必须集中力量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一系列罪行，将它一个一个落实”。

书中说，姚登山“成了1967年8月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替罪羊”，然后说“这时”，周恩来对姚的评价是“没有填表，他说没有必要参加。他就是‘五·一六’（分子）。”其实总理1967年对“五·一六”还没有这样高的认识，不会议论姚登山填没填表。在讨论1967年的地方引用1970年的话，并用“这时”连接，容易让人误会三年前周总理已经发明了“五·一六组织”和“五·一六罪行”的区分。

<sup>1</sup>林杰，2008，《“揪军内一小撮”的提出和斗争》，见乌有之乡网站，<http://www.wyxsx.com/Article/Class14/200808/47311.html>。

<sup>2</sup>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752页。

<sup>3</sup>周恩来《周恩来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时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1970），载《记忆》第30期（2009年8月13日）。

<sup>4</sup>1971年中央13号文件。

<sup>5</sup>周恩来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时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传达记录。引自本文作者收集的北京某机械厂工作人员日记。

作为“五·一六”案的一个样本，书中专节讨论“王乃英案”，并引用了王乃英三天里写出的三份交代稿。从摘引的内容判断，当时专案组已经学习了周恩来“要重本质，罪行就是本质”的新指示，可怜王乃英听不到传达、不知道新精神，所以前两份都是按照组织来交代的。她先说“我不知道5.16这个反革命组织，也不知道它的反革命纲领、计划及其成员。我没有参加它。我没办法承认我是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骨干分子。”否认参加组织，而不谈反革命罪行，这当然不合政策精神。第二天说“因为确实有大量的揭发材料证明我是5.16反革命骨干分子，而且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仍证明这些材料是可靠的。5.16反革命核心成员王乃英”。承认是组织的“核心成员”，但未谈及罪行，专案组还是无法交差。所以才有了第三份认罪书，“承认自己犯了罪，承认自己是干了5.16反革命活动的罪犯现行反革命分子。”<sup>1</sup>只强调5.16罪行、不谈5.16组织，这样才算符合了重罪行、不重组织的新精神，专案组据此才能“定案处理”或“落实政策”。《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说第一、二份认罪书之间的24小时内，“发生了什么，我们对此一无所知”<sup>2</sup>，怀疑王乃英受到了威胁（其实她经受的该是持续了很久的“攻心战”，发生什么的关键不在这24小时）；认为第二、三份认罪书的区别“可能是手续问题”<sup>3</sup>（两份认罪书的差别涉及当时能否为王乃英定案的大问题，绝不是手续问题），都是没弄明白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重组织”与“重罪行”的区别而做出的不恰当评论。

7、关于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鸣金收兵时间。书中根据金春明等人的《“文革”时期怪事怪语》说“李震死后不久，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行动就鸣金收兵了。”<sup>4</sup>

李震具体负责全国的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但他的去世却并未构成这个全国性运动的标志性事件。早在“九·一三”事件传达后，各单位的军宣队员和军代表陷入尴尬境地；不久毛泽东又批示，“‘五一六’是极少数，早抓起来了，是不是没有注意政策，请市委酌处”<sup>5</sup>。所以，这场运动随“九·一三”事件发生就大为松懈下来。曾经负责这个案子的一位领导人回忆了1972年得到最

<sup>1</sup> 《最后的革命》，第237-238页。

<sup>2</sup> 《最后的革命》，第237-238页。

<sup>3</sup> 《最后的革命》，第238页。

<sup>4</sup> 同上书，第242页。

<sup>5</sup> 吴德口述、朱元石记录整理《十年风雨记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第77页。

高指示后的反应：

“我们商量说：抓‘五·一六’扩大化了，我们只好认这个账。现在就按毛主席的批示精神，落实政策，统统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给他们去掉。北京市有关‘五·一六’的情况，张铁夫很清楚，毛主席的批示落实，以及摘帽子等工作都是他来负责的。为此，李震提出要向上写个报告，他写了一个。我提出‘五一六’抓也抓不到，怎么写呀？而且毛主席已批评了，就不要再写什么报告了。李震还想向下发个指示，说明政策界限等。我也不同意。我说毛主席指定我们成立联合办公小组，周总理找我谈话时，我就提出过应该有个政策，周总理当时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延安肃反时的九条方针说，就按这个原则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办。现在还想搞个政策界限，这没有必要，而且很难，没有查出‘五一六’有什么证据，你怎么能够提得出区别政策来呢？后来报告没有报，指示也没有发。”<sup>1</sup>

可见，中共中央后来没有再正式发布关于“五·一六”的文件或指示<sup>2</sup>，严格意义上说这个案子现在也还没有结束，当然事实上1975年后党政机关就不追查“五·一六”分子了<sup>3</sup>。

至于李震去世后的一段时间，运动其实仍然不冷不热地继续，并与批林批孔结合起来，基层还有新的“五·一六分子”被揪出来<sup>4</sup>。

**8、关于潘吴林的被捕。**书中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3位最著名的‘左派’——潘梓年、林聿时、吴传启，在华中的农村躲避一段时间后，遭到逮捕并被打成‘五一六’分子。”<sup>5</sup>

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周恩来总理指示戚本禹通过傅崇兰派人协助二炮保卫部追捕潘梓年和吴传启，很快潘、吴分别在江苏、河南被捕<sup>6</sup>，林聿时此

<sup>1</sup> 吴德口述，朱元石记录整理，《十年风雨记事》，当代中国出版社。

<sup>2</sup> 但有少数部门在文革结束后下发过为所谓“五·一六”分子平反的文件，如全国妇联。

<sup>3</sup>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中文本第360页注35引用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里的几句话，说明1975年邓小平已经要求解决“五一六”问题，“必须使他们很快把包袱放下来”。（《当前钢铁工业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sup>4</sup> 我收藏的笔记本中有一个燃化工业部下属研究院1974年的案例，专案组组长称某某是“中央定的”“五·一六分子”；我手边还有一份“王锡鹏专案组”1973年12月编印的《关于王锡鹏“五·一六”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附件）》（铅印），。

<sup>5</sup> 《最后的革命》，第236页。该书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准确的称谓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

<sup>6</sup> 孟祥才《我所知道的戚本禹》，载《历史学家茶座》第10辑。该文发表前曾征求戚本禹的意见。

前在山西被捕。

9、关于《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被两位作者征引 25 次以上，是全书最信赖的文献之一。

其实，李书的价值已经受到很多重量级作者的严重质疑。如《王力反思录》明确指出，该书“是貌似真实的谎言”、“这些谎言从政治到生活”<sup>1</sup>。《戚本禹谈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认为，“李志绥在文革初期，他的工作任务只是给毛泽东、江青和一组的人看看病，他既不是文革小组的成员，也没有在文革小组办公室担任过任何职务，他离文革风暴中心比较远，不可能了解很多文革的机密，由他来向我们提供文革的第一手史料，这是很滑稽的，依我看，他写的文革回忆录除了他亲身参与过的支左活动外，其他大部分是根据现有报刊资料和别人写的东西拼凑起来的。”<sup>2</sup>林克、吴旭君、徐涛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他们在合著《历史的真实》一书时曾大量访问当事人，查阅了部分档案和全部病历，总体意见与王力、戚本禹相似，并在书中例举了数百处并不高明的错误<sup>3</sup>。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再援引李志绥的著作，而没有注意负面的批评，造成不少问题。如从 1974 年底至 1976 年 6 月李基本不参与毛泽东的医疗工作，因为毛泽东“说他只观望不行动，不动手，不解决实际问题，病好不了，不要他，让他回去！”<sup>4</sup>他也没有参加毛临终前的直接抢救<sup>5</sup>。既然如此，《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据李书称毛泽东头去世时，医生“在午夜前不久小声地对华国锋说：‘我们已经用尽了各种办法’。”（第 444 页）也就是杜撰。书中称“在距离最初的诊断一年后，毛的右眼进行了手术”（第 416-417 页），到 1976 年 2 月毛“虽然左眼失明了，但是右眼还看得见”（第 433 页），而当年为毛做手术的专家唐由之指出“手术用了七分钟，做的是左眼。毛主席说：‘明年我再请你来，为我做右眼手术。’”<sup>6</sup>如果在医疗问题上李的话都不可靠，怎能轻易相信所谓“周（恩来）死后，毛或者身边的女服务员、警卫、医生们都是波澜不惊”（第 418 页）、“汪

<sup>1</sup> 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年，第 1074 页。

<sup>2</sup> 陆源访问、钟志林整理，《戚本禹谈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见 <http://www.wyzsx.com/Article/Class14/200707/21696.html>；

<sup>3</sup> 林克、吴旭君、徐涛《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

<sup>4</sup> 汪东兴语。参见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139 页。

<sup>5</sup> 上书，第 157 页。

<sup>6</sup> 上书，第 142 页。

（东兴）还谨慎地向毛提供他晚年不断渴望的那类伙伴”<sup>1</sup>这样的话呢！

以上只是少数例子。其实此类细节还可以找到不少。我希望作者能够收集整理国内学者提出的订正意见，并寻找合适的审稿人逐章审读，减少甚至消除此类不必要的细节问题，尽快推出更可靠的修订版本。

#### （四）关于文革史料的使用

傅斯年曾经说过一句名言，“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sup>2</sup>。不管他说的是否准确，发掘和扩充史料本身就是史学研究的内在组成部分。《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书后“关于征引材料的说明”（第480-482页）、2165个注释和长长的参考文献充分体现了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全书最精彩、最富教益的部分之一。

在“关于征引材料的说明”中，作者特别强调了不同时期“大事记”和“年谱”的史学价值：

我们大量使用中国出版的“大事记”和“年谱”，因我们发现此类材料的信息量往往比较大。文革期间编写的“大事记”内容就很丰富，文革后编写的也是如此，它为深入探究他处另有记载的“故事”提供了初步的立足点。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大事记”一般记载坚实可靠的基本信息（如某日、某人发表了重要讲话或做出了重要决定，某地发生了重要事件等等）。中共中央下属的中央文献研究室这样的机构近几年出版的编年史和某政府部门或群众组织文革中自己所编“大事记”，两者比较起来，相得益彰，前者策略性的遗漏点往往被后者大书特书，反之，亦然。<sup>3</sup>

作者早在近20年前就开始对重要文革当事人访问，其中包括“原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一些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政治局常委们的笔杆子和助手、左右派的红卫兵领袖”<sup>4</sup>。不过，本书虽然采用了少数口述史料，但并未作为主要信息来源。

这些意见相当深刻，只有对各类文革史料有深入研究和运用经验的人才能说出来。不过，书中“把对这些小报的依赖降低到了最低程度，取而代之的是引

<sup>1</sup> 《最后的革命》，第15、21-22页。

<sup>2</sup>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1928年），载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页。

<sup>3</sup> 《最后的革命》，第481页。

<sup>4</sup> 同上，第480页。

人瞩目的由大型群众组织内部油印、发放的所谓‘动态报’。同是非官方的材料，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sup>1</sup>对此，我不太赞成。内部发放的“动态报”、“快报”、“简报”确实简明扼要，信息量大，是“历史学家了解文革真实情况的基本材料”，但因此而“把对小报的依赖降低到最低程度”却不够合理。比如，公开的文革小报有大量的“简讯”、“大事记”，信息量同样很大；上面长篇大论的大批判反映了编者的取舍标准，对弄清造反派和红卫兵的派别立场有着重要价值；公开的小报容量大，对一些事件绘声绘色的描述，往往与回忆录文献相互印证。利用文革小报时持谨慎态度是必要的，但善用而不是“把对这些小报的依赖降低到了最低程度”，才是更为合理的研究路线。

书中引用的史料非常丰富，有的还是作者自己动手收集到的。比如王乃英交出手稿，《“老头造反队”操纵的“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罪行》、《28 专案的发起过程》、《郝可伟交代材料》以及王年一手稿等等，都是非常珍贵的第一手文献；而《高教部文化大革命大字报选编》、《北京军区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揭发批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罪行的材料》、《北京市接待来京串连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工作总结》、《康生言论选编》等文献也都流传稀少、文献价值很高。这些索引和注释，对开阔文革史研究者的视野很有帮助。

### （五）出色的学术译本

上文直接将中文本内容看作两位作者的意见，忽略了译文可能导致读者与作者隔阂的情形。这样做之所以可行，是因为中文本是相当出色的学术译本，译者较好地传达了原作的意思。全书流畅连贯，自成风格，读起来引人入胜；翻译中偶尔会有小差错，但比较容易识别和更正；不管作者引用的是当年的文献还是后来的回忆，绝大多数都准确地回译为中文了；所有的注释和参考书目都保留下来，而并没有大刀阔斧地砍掉。

这一切都需要艰苦细致的工作才能实现。据“译校后记”说，“我们的翻译是根据 2006 年发行的原著第一版进行的。在定稿之前，我请迈克审阅了译稿，他根据原著第二版，订正了原有的几个错误，并对我们的译稿作了若干修订。正

---

<sup>1</sup> 同上，第 482 页。

如迈克在本书序言中说的，在本书撰写上他们是孜孜以求的‘完美主义者’，我个人认为，迈克对我们的译稿的一些修订已可看作是‘中文改写’或‘中文再创作’。”<sup>1</sup>那么，对于这样一部出色的译著，我们需要感谢译者关心、校者唐少杰和作者之一的沈迈克。因为沈迈克娴于中文，他其实不止是作者，也是校者之一。

不过，中译本遗漏了国外学术作品末尾通常都有的主题索引。如果想知道作者在书里对某个人或某个主题怎样论述的，可又不想通读全书，直接求助于这种索引非常方便。现在大部分中译本忽略主题索引已成习惯，但这毕竟是一种不大为读者考虑的安排。

2010年6月26日定稿，9月2日修订

---

<sup>1</sup> 唐少杰《〈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译后记》，2010，参《最后的革命》第468页。

## 【读书】

## “劣败”的“驯服工具”

## ——《青史难隐：最后一次交代》读后

潘祛病

1966年6月，“生怕掉队”的王广宇接到一个通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要调他去钓鱼台工作，光荣的机会终于来临了。这时的王广宇根本就不会想到，仅仅18个月后，他这颗闪闪发光的“螺丝钉”就被丢弃到监狱里，饱尝了七年多铁窗之苦。

《青史难隐——最后一次交代》<sup>1</sup>，用了相当的篇幅讲述了上述内容：回忆自己文革时期如何在炙手可热的权力中心——替代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组工作，并一度成为办事组组长（即办公室主任）；又如何被莫名其妙地抓进监狱，以及在狱中的艰难痛苦岁月。

文革中的冤屈，听得很多了。从刘少奇到遇罗克，从林昭到王佩英。因此，王先生无辜系狱，并不令人特别惊异。狱中的非人待遇，也读了很多，王先生冬天入狱，夏天穿棉，洗头洗出了半盆泥，固然令人惊骇，但想想刘仁等人戴着死铐，大小便都在裤子里，也就不那么心悸了。这本书真正催人深思的，不是那些与千百（作者王广宇像）万人相似的苦难，而是老人对自己人生的总结：劣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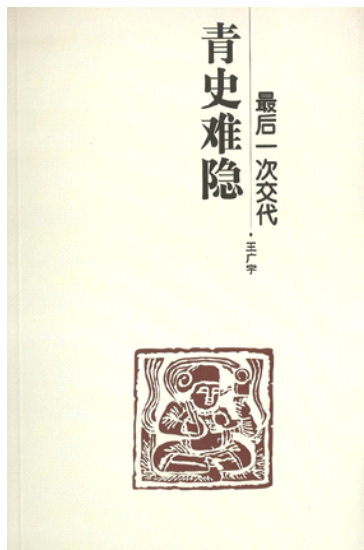
“劣败”，是老人加在自己人生轨迹上的定语。其实，上世纪五十年代，能像王老这样从东北一个偏僻小镇上的山村小学教师，一路被组织保送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生班，毕业就被直接分配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后又调中央文革小组，被任命为办事组组长，在当时政治挂帅的背景下，这无论如何，不应是“劣败者的足迹”。相反，对于有钻营悟性、投机技巧的人来说，这种步步高当是一种求之不得的人生阅历。但作者为什么要在晚年把这种经历归为“劣败”

<sup>1</sup> 王广宇著，2011年，自印书。



呢？

在《青史难隐》的后记中，老人写了这样一段话：“我先天愚钝，后天教育失调，再加上当了十四年的亡国奴，给我留下难以抹掉的奴性痕迹。抗日战争胜利后，刚刚进入可塑期，就接受了共产党的教育和熏陶，养成了党性就是个性的思维方式，使我自然而然地成了党的驯服工具。”



王老把他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原因归结为受了“亡国奴”和“党性”双料教育的结果。其实不尽然，伪满洲国时期东北的亡国奴教育，是当时东北人被迫接受的，这种殖民灌输能够在受教育者心里扎下的，多数只能是仇恨的根苗。党性教育就不同了，上世纪四十年代，许多思索中国出路的青年知识分子就是在读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章后，心悦诚服地投身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王广宇也不例外。况且，无论

建国前还是建国后，共产党时刻宣传的都是“为人民服务”。即便到了文革血雨腥风时期，国人看到，中南海新华门内红色的影壁墙上也还是镌刻着毛氏狂草的“为人民服务”。因此并不是只有受过亡国奴教育的伪满洲国时期的人才会成为党的驯服工具，历史已经让人们认识到，其他没接受过亡国奴教育的知识分子，且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在那些特殊年代，无论长幼、不分性别，又有多少没成为党的驯服工具？

本是奔着引起了自己共鸣的革命理想投奔共产党来，怎么几十年过后，回头看去，却反而成了丧失个性的驯服工具呢？

用王老的话讲，是因为“养成了党性就是个性的思维方式”。那么什么样的党性能替代个性，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了？

这些问题，说复杂，其实也挺简单。当党的要求和追求社会进步的知识分子的理想合拍时，他们会自觉地用“党性”自律。但1949年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使人们看到，本着党性谏言的知识分子，每每却被整人者擎起“党性”的大旗打倒，正义、公平、理性、道德、良知，每战必败，屡战屡败；为民请命，不仅自身难保，还会殃及父母妻儿，株连亲朋好友；知识分子的生活命脉——户口、

粮食、工资、职业甚至迁徙的自由都被党牢牢地控制着，没有丝毫回旋余地。据说党性是从人民性



升华出来的，

(第二排左一：王广宇)

可没有监督的权力使它渐次异化，脱离了人民性，“以革命的名义，把革命的理论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在层层叠叠思想的、生活的，甚至是生命的重压下，这时所谓的“坚持党性”，实际上已经成为知识分子遮羞的面纱。这时，他们不去做驯服工具，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命运？！

可悲的是，中国在那个年代产生了大批这样坚持所谓党性的驯服工具，每次运动来临，套着层层思想和生活枷锁的“工具”们在积聚起来的巨大精神恐惧中，自身难保，自顾不暇，根本就不再有能力反思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自己忠诚不渝的党到底怎么了，只能浑浑噩噩，把精神的枷锁当成可炫耀的饰物，悬挂起来以自慰。他们别无选择，一面是维持生活的粮票、工资，甚或是晋级表彰、步步登高的召唤，另一面是“人民斗争的汪洋大海”。知识分子在胡萝卜和大棒的夹缝中，何去何从？选择成为坚持党性的驯服工具，必然成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主动选择。

在那个年代，人们在谨小慎微甚或构陷他人中求自保，求做一个合格的驯服工具，是顺理成章，没有道德压迫感的事情。即便是这样，积极努力去当好党的驯服工具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如王力、关锋、戚本禹，这样标准的曾经令党非常

满意的“驯服工具”，他们的命运又如何呢？

1967年“7·20”事件后，7月22日在武汉被打伤的王力在北京西郊机场被周恩来、江青搀扶着绕场一周受到隆重欢迎。7月25日，首都十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这是对能够“最快最准确地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传达出去”（王力语）的传声筒的至高无上的奖励；但仅仅一个多月后，他本人就沦为党的阶下囚！“反军乱军小爬虫”、“国民党叛徒”、“刘、邓、陶的黑秀才”，顶顶黑帽子无情地扣到这个曾经优秀的传声筒脑袋上，没有审判、没有罪名，单独关押、无人审讯，身陷囹圄长达14年。王力这样风头正健的“驯服工具”都没能逃脱构陷他人，又被他人构陷的命运，而给他扣上这些大帽子的，一个半月前亲切地搀扶他绕场一周以示隆重欢迎的大人物，他们为什么翻云覆雨？又怎么这么快就无情地抛弃了这个好使的工具？他们惧怕什么？他们又是谁的驯服工具？！

还有戚本禹这样被毛泽东御封的青年历史学家，从文革前发表大块的表达毛氏思想的历史哲学文章；到文革中冲在最前头替毛式革命摇旗呐喊；到头来，不也是莫名地锒铛入狱，受尽非人的摧残。

透过这些优秀的“驯服工具”的遭遇，后人不难想见，在几十年前的中国不做“驯



服工具”难，做“驯服工具”也难。知识分子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中，被立体挤压，无处逃避，无所适从。即便灵魂出卖给魔鬼，道德抵押给非常态的政治，也只能是苟且一时。在整肃和被整肃的过程中，没有赢家！这样的驯服工具，只能被冠之以“劣败”了。

（第一排左一：王广宇）

王广宇老人，在晚年终于从这一生的梦魇中醒来。他把自己文革时期曾在中国政治权力中心工作的经历记录下来，为恢复历史、特别是文革历史的真相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不仅如此，他更是毫不吝啬地剖析自己跟党走了几十年的心路历程，诚恳地为后人留下了一段宝贵的人生实录，不因个人得失而流连迟疑，揭开自己思想深处的疮疤。

作者发出悲愤的感叹，将自己的人生定位于“劣败”。但，这仅只是个人阅历的“劣败”吗？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定义为“劣败”是悲哀的，造就这种“劣败”的政治年代更是悲哀的年代。王广宇老人把他对于劣败人生的叙述作为“最后一次交代”，他是把一颗对历史、对未来负责的真心，把自己因为顺从而惨痛的人生教训交代给人们，希望后辈不再因顺从而助纣为虐。独立思考不仅对个人，对整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都将具有深远的意义。

王广宇先生清醒了，中国还有多少经历过那个年代还没有清醒，甚或还正在梦魇中的人们，他们，什么时候能够醒来呢？

历史反复证明，所有人的清醒，政治上的理智，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真正的希望。



【怀人】

“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子——哀李炳泉

戴 煌



李炳泉

(1919年3月28日—1970年5月2日)

—

1969年秋，在“预防苏修突然袭击”的号令下，中央在京各机关被认为不可靠的大批干部，陆续被发配到外省市闭塞农村的“五七干校”；我本人这样，家在京津沪“命脉城池”的“二劳改”政治犯，更被押上架着机关枪的一列列火车，解到了山西的曲沃、晋城、太原等地。

我被发配到太原北端为太原钢铁公司修铁路抬钢轨后，耳闻新华社许多“有问题”的人，也先后被赶到山西南部运城地区农村的“五七干校”，其中有曾被划为“右派分子”但已“摘帽”的李慎之、李耐因等同志，却没有曾从事过地下工作而在“文革”伊始便被贴上“叛徒”标签的李炳泉兄。当时我还暗自为炳泉兄庆幸，以为笼罩在他头上的阴云已被驱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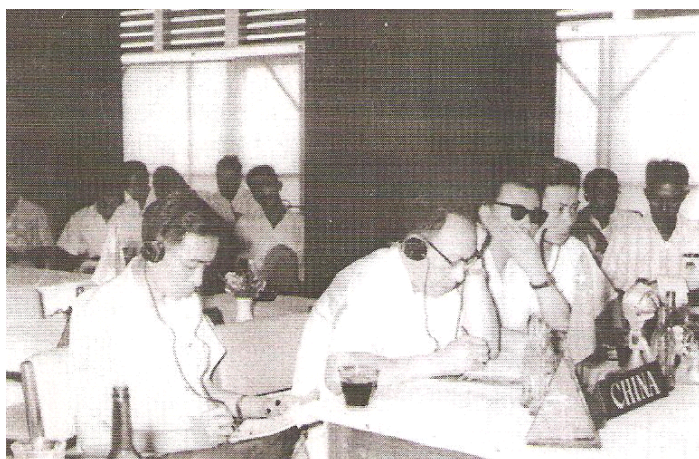
1963年4月24日，亚非记协在雅加达成立，中国记协是主要发起者。选查禾多为书记，中、坦、日等十国代表为副书记。右一；李炳泉，右三：查禾多。

“文革”风暴骤起时，新华社屡屡传出一些令人痛心的惨讯，摄影部副主任陈正青（老延安）夫妇自杀，解放前为上海复旦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解放后不久为驻外记者

的许复己夫妇自杀；特别是，1968年，炳泉兄作为外事部主任，也曾一同在台前被陪斗过的外事部主要助手丁德润也跳楼自杀了。现在，炳泉兄虽然在“专案组”的批斗审问中受了很多难言之害，但毕竟还坚定地呼吸着，而且又没把他下放到“五七干校”来受煎熬，想必他的问题已经搞清了。

1963年4月，李炳泉（左二）在印尼。

很快，一个惊痛的传闻袭来，我才顿悟为炳泉兄的庆幸竟是大错特错了——1970年“五一”过后不久，听说炳泉兄已惨死于新华社大院宿舍4号楼



的地下锅炉房，额头上还留有硬器重击的伤痕，血迹斑驳，左目半睁，右目虚闭，死未瞑目。这是他苦痛难熬而自寻短见？还是狂徒们对他的残酷戕害？我如此生疑许久。后来新华社的一些好友推断：在那暗无天日的境地中，不仅在新华社连连发生那样悲惨的事件，就连原本战功卓著的东海舰队司令陶勇将军，都被狂徒们深纳暗井之中，在新华社出现炳泉兄这样惨殁于地下锅炉房，毫不足奇呵。

## 二

1938年炳泉兄考入西南联大不久，即成为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成员，1940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被国民党列入准备大逮捕的黑名单。他奉地下党之命，疏散到云南罗平中学执教，后就读于重庆复旦大学外文系，担任过罗平地下党的县委书记、城区书记，还被选为复旦外文系系会主席。在这个过程中，他先后组织校友与同学，驱逐了罗平中学有特嫌的训育主任和以复旦职员身份为掩护的国民党特务，并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复旦保护了思想左倾的洪深教授，进一步壮大了校内的民主进步力量。

1946年春，炳泉兄从复旦外文系毕业，经组织同意，随家人到北平以记者职业作掩护，并利用其兄在北平铁路局宿舍独门独户的小四合院，经常与地下组织的同志聚会。1946年11月，“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办的机关报《平明日报》创刊，炳泉兄立即运用其堂兄李腾九在“华北剿总”联络处担任少将处长的关系，从《益世报》转到《平明日报》担任采访部主任，接着他陆续安插了9位地下党的同志到该报工作，其中包括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彭真秘书，彭真去世后升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王汉斌。他和这些同志先后为共产党解放军获得了大量的国民党军政重要情报。







1948年12月10日,时任北平地下党职业青年支部书记的李炳泉,受党派遣,以中共地下党代表的身份,会见华北“剿总”傅作义将军,转达中共中央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意图,并引导傅作义的和谈代表崔载之,于17日到达平津前线司令部。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接待,从而和谈开始。

1948年冬,解放军东北、华北两大野战部队围集于北平城下,炳泉兄奉地下党之命,作为中共地下党第一位代表,向逃、战皆难的傅作义,畅述共产党军队和平保存北平古都的主张。其后,他几度历经艰险,带领傅作义的代表隐秘出城,与共方代表谈判;认真听取和记录了林彪口述意见,再将林彪审核的笔记密藏在衣缝内,秘密回城转达给傅作义,为保护这座千年文化古都,做出了永垂史册的贡献。

解放后,第一部苏中合拍的大型彩色文献片《中国人民的胜利》中,留有这样一个难得的历史镜头:1948年12月17日,身材魁伟、穿着一身蓝袍子的炳泉兄,把傅作义的代表、原《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介绍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领导的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代表——第四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从此拉开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历史序幕。1951年,这部影片获得当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的第一大奖——斯大林文学艺术奖。李慎之兄在《怀念报人



李炳泉》一文中说，李炳泉在这样一部影片中“露脸”，其无上光荣是今天的追星族们难以想象的。

### 三

炳泉兄为人极其谦诚蔼善，对自己的历史丰功守口如瓶。1951年8月，我与新华社第三野战军总分社的几位同仁被调到新华总社军事组，准备去朝鲜战地。其时炳泉兄为总社国际部的苏联东欧组组长，两者的办公室，在当时只有两层的工字楼二楼东楼梯口处，仅有左右两墙之隔，上下楼时常见面，我们从未听说他竟是一位和平解放古城北平的功臣。

1953年冬天，我从停战未几的朝鲜战地回国参加新华社第三次全国社务会议，行将转赴奠边府决战在即的越南采访，临时参加国际部东方组党支部活动，炳泉兄时为国际部第一副主任，我俩不但常常见面，而且正是他领着我到工字楼二楼会议室，听取了新华社负责人吴冷西就我去越南抗法前线的正式谈话。接触如此繁多，不但我对他的历史一无所闻，就是与他交往更密的国际部老人，也对此知之甚少。直到1956年“反胡风”运动后期，他在向党所写的自传中，才淡笔那段往事，而且这也只有涉及党的组织工作的个别同志，才因此得知他当年为北平和平解放出过力。炳泉兄的为人品格，正如古书中“光禄四行”——“质朴、敦厚、逊让、节俭”那样的高尚。



1966年  
4月24  
日，中国  
记协与  
亚非记  
协庆祝  
第四次  
亚非记  
协书记

处扩大会议，及纪念亚非记协日大会。在北京饭店大厅。左一：李炳泉

就是这样一位谦恭逊洁、敦厚诚恳的共产党人，在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却被横加“叛徒”“特务”等重重罪名，并置之于绝命。

1978年国庆节后，我重新踏入新华社大门旧业重操，才得知炳泉兄不但被残害致死，而且体骨无存。直接参与并执行对炳泉兄迫害的那个“李炳泉专案组”的女组长，不但“练达”地耍弄诈术蒙骗对党忠心不二的炳泉兄，而且还在野蛮的拷问中，猛扇他的耳光，活脱一副奥斯威辛集中营女法西斯的凶恶相。

这种凶恶相，早在“审查”丁德润的时候就露骨地展示过了。当时所谓“丁德润专案组”的凶手们，逼迫丁“老实交待”其已故的父亲在国民党时代从事法官事务的一切详情。丁德润年少时，一心上学苦读，对此知之甚少。1949年5月上海一解放，他就由党的地下组织推荐，进入新华社华东总分社。朝鲜战争中，他又奉调到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担任助理编辑，夜以继日地埋首苦干，寡言少语，编出过许多出色的稿件。朝鲜战争结束，志愿军政治部为其立了三等功，他上台受过奖，新华社内部的《前进报》表彰过。



1966年4月24日，在庆祝第四次亚非记协书记处扩大会上，中国记协书记李炳泉（右二）讲话。

这样一位老实同志，实在很难对“专案组”不通实情的诘问来个“竹筒倒豆子”。“专案组”的一个女组员立即冲上前去猛扇他的耳光，直把他的近视眼镜扇落在地。高度近视的丁德润眼前一片迷茫，蹲腿弯腰，战战兢兢地满地摸找眼镜。此刻，“专案组”的两个男组员也就势冲了上去，与那个女组员一起对准仍在深深地弯着腰摸找眼镜的丁德润乱脚猛踢，直踢得这个老实巴交的人满地乱滚。最

后丁德润只能弯曲着身子侧躺在地，断断续续地细声呻吟，批斗会暂停。翌日凌晨，丁德润坠楼自杀，极其悲惨地永诀其温存敦厚的爱妻和妻腹中即将足月的胎儿，离开这个残酷、阴暗、卑恶的人间！

为什么在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指导下，一些人的人性竟如此凶恶？一些一直谦诚慎独、默默奉献的共产党人，为什么就这样惨死于被尊为无产阶级革命“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及其“崇拜”者之手？在当时仅有32人的新华社外事部，就有两位这样的同志惨然死去；在全国，这类无辜的惨死者又会几何？

为真正的人民民主自由而献身人们没能看到他们为之奋斗的政权，就离去了；而看到政权建立的炳泉兄们却在“文革”中被“革命”吃掉，他们的理想还会实现吗？

炳泉兄千古！

文革中死难的，我曾经的那些同事千古！

2012年清明节定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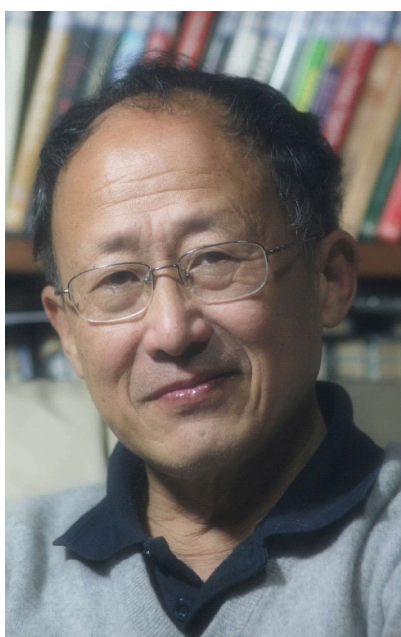


## 【访谈】

按：此文在《万象》杂志2011年11月-2012年2月连载，但因众所周知之原因，原文被删节三分之一。为恢复原貌，本刊全文连载。

## 荒诞人生——方昕口述（一）

文 静



方昕（1944-）：祖籍浙江武义，前东方歌舞团低音提琴手。1962年入中央音乐学院，文革中，是学校造反派组织“红岩”的核心成员之一。

（左图：方昕像）

——

我母亲是红四方面军的，她是四川达县人，在一个山沟里，那是最穷的地方。小时候家里养不起了，于是送给人做童养媳，就是说，连最起码的、够活着的那口饭都没有，其实就是扔了，不要了。所以我母亲从六岁起就要干活，从早干到晚，稍微不满意就给扔猪圈里，今天就没你的饭——因为她是白来的，就算死了，人家也没什么损失。

直到我母亲十一岁，忽然听说她的大姐投了红军，于是就从村里跑了，怎么也得有几十里地。到了县城，远远看见一堆人从城门洞里出来，总得有个一二百号，穿着红军的灰军装，但都用铁链子锁着，我的大姨就骑在高头大马上，押着这些人。我妈妈过去了，叫她姐姐的小名儿。因为好几年没见，我大姨都不太认识她了，还问她爹叫啥、娘叫啥，等都答对了，这才相认。后来我妈妈就问，那些是什么人，我大姨说：“这都是反革命，拉出去枪毙的。”

那是1934年，我妈妈去没几天就赶上长征，于是跟着上路了，可以说九死一生吧。有一次她得了疟疾，送到医疗队，因为国民党就要追过来了，有个老大夫跟她说：“这片奎宁你吃下去，好了就好了，不好也就没命了。”于是吃下这片

药，我妈睡着了。等第二天早上醒来，队伍已经不见了，剩下都是缺胳膊断腿的，要不就像她那样走不动的病号。好在我妈吃下那片药，那当然就好多了，一听说国民党部队来了，起身就跑，地上躺着的那些人就在那儿骂，但那种时候，谁顾得了谁呢。后来我妈找到了队伍，要知道，长征不是这么一路走下去，而是这么走、那么走，再退回来。几天以后，队伍又退到原先那个地方，就看见那些伤兵的头都被挂在树上——国民党不会收这些人的，当然就给杀了。

到了延安，我母亲进了宣传队，做过勤务员，后来又送她进女大，这才学了点儿文化。我的父亲叫方粹农，是学农的，1937年从浙江去的延安，办农校、干部培训，包括讲到南泥湾，都是他们先去调查，供上面参考，这才有了三五九旅的大生产运动。所以，我父亲算是共产党搞农业的鼻祖了，现在九十八岁，身体还挺好。

1944年，我生在延安，1948年底跟着到了北京。

## 二

我是1959年进的附中，那时候叫“三年制”，包括像金毓镇、吴灵芬，我们都是初中毕业以后才进的校。本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是初中、高中一共六年，但1958年大跃进，全国一下成立了许多新的团，老团体又要扩编，比如单管乐队变双管，可以演动静儿更大的作品，所以到处都需要人。在这种背景下，学校办起了三年制，初中毕业就能考，白丁也可以进，而且是全国招生。比如我们班一个拉贝司的，比我大三四岁，从广东汕头过来。他们家是真正的农民，俩眼一抹黑来北京，哪儿都不认识，为了参加考试，抱个铺盖，每天就那么露宿街头。而且后来我才知道，当时这个班，有好几个人都是高中毕业了又翻回来考，恨不能快二十岁了，那都是梦寐以求、但没有机会的，多亏有了这么一个三年制。我也是在这种契机下，才能学了音乐。

我们家住农科院，就在魏公村国家图书馆的斜对面。农科院本来是30年代日本人建的，那时候要在中国大规模地推广棉花，于是就在北平成立了这么一个机构，当时叫“华北农事试验场”，所以它的房子都是日式的。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接管；国民党走了，共产党接管。1948年10月，我爸爸就是代表共产党来接管的。农科院有个很大的图书馆，解放以前的书都还在，而且我又喜欢文学，

于是从五、六年级起，拿着我爸爸的借书证到里边翻，初一就看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还有其他大量良莠不齐的书，当然也不是都能看懂了。

那时候学校少，小学升中学刷下去一大批，初中升高中就更是了。可以说，50年代的高中生，在素养、学识等方面，比现在的博士生只多不少。尤其那会儿还是传统教育，比如我上小学的那些老师，言谈举止还都是老派的那种，你想，一年级的课程能有多少内容？但他能掰开了、揉碎了，古今中外、天南地北给你讲那点儿事，今天的老师哪有这个知识面，哪有这个眼界和心胸？所以，虽然我们都是淘气的小孩，不爱学习，但对老师由衷的佩服和尊敬，那都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

初中毕业到高中是一个槛儿，很多人要上不了学，所以比较紧张，而艺术类院校是不参加统考的，等于给自己多一个机会。考什么呢？当时我特别想写小说，学戏剧，但是戏剧学院不招。后来我就翻报纸，翻翻翻，哎，看见音乐学院附中的招生简章，可以招初中毕业的人，而且理论、声乐、器乐，什么专业都招，于是我就去了。

那是学校报名的最后一天，我从农科院坐车，花一毛钱到动物园，又花一毛五坐7路车到鲍家街。中间我还搞错了，在报子胡同就下来，转了一圈发现不对，这才再过去，所以三点多才到，大概离报名截止就只有一两个小时，一楼走廊里都有点儿黑了。上来先填个表，什么证件、介绍信都不要，填上叫什么、几岁、哪个学校的。当时我乱报了一个理论专业，再交一毛钱报名费，完了，就这么简单。

那天领我进去考试的是郑凯林，我们岁数一样大，但他是六年制的，已经学了三年。后来他告诉我，当时见我就是一傻小子，拿着表儿，特高兴就来了。进去以后是朱启芸老师考，她是试唱练耳教研室主任，我记特别清楚，她个儿挺高，坐在钢琴那儿，说：“你怎么会报‘理论’？”我说我什么都不会，然后她就哈哈大笑，说：“什么都不会，就更不能报‘理论’了！”又问我身体怎么样，想吹管乐么。我说愿意愿意，我爱游泳，身体好着呢。那好，先听听音吧。她弹个什么音，我说：

“啊，Mi——，不不不，Fa——，……”那时候不懂，就乱说一气。

她说对不对，你不用管它是什么音，能找到音高就行。

“啊——，嗯——”我就在那儿瞎蒙，加上紧张，反正肯定没听出来，和弦什么的都没往下考。

朱老师说：“那你唱首歌儿吧。”

**“哦，那我唱一个《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唱了以后，她又哈哈大笑，说：“行啦，考完了。”我特高兴就出来了。后来听郑凯林讲，当时看我从考场出来那傻样，他还跟旁边的同学说：“呵，看那傻小子，还以为自己考上了呐。”

复试要等到下下个礼拜天，那时候也不寄通知，得自己到音乐学院去看榜。而且我发现，邻居一个女孩，叫邱璐，她也参加了初试。她爸爸是留日的，喜欢音乐，在农科院的乐队里拉大提琴。后来这半个月，她爸爸给我们俩人辅导了一下，最简单的那种，毕竟她爸爸程度也浅。发榜那天，我们俩一块儿去了，复试名单很长，总得有几百人，用毛笔抄了贴墙上。名字一个个看下来，有她，没我——初试就给刷了。当然我也没什么负担，从投资角度讲，一共不到一块钱，就是来玩儿的，所以也没什么失落感，考上、考不上都无所谓。我说：“你去考吧，我在外边等，完后咱俩一块儿回家。”然后她就进去复试，我在外边瞎溜达。整个儿榜看下来，有几条须知，其中最后一条就说：“考生如果认为自己的才能未被发现，可要求复试。”

等于说，没要你复试，你也可以考？！

反正呆着也没事，我又特高兴就去了，什么手续都没有，说一声就行，也不用交钱。考试还是那套，听单音、听双音，一直到唱歌，邱璐爸爸给我辅导了一个俄罗斯的民歌，“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有个马车夫，将死在草原……”，发挥不错。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的学校都能像这样，多好。学校是受教育的地方，你渴望学、我就教，至于你学成什么样、将来如何，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哪像现在，不拉到帕格尼尼，不花上多少万块钱，你都不一定考得上。而考上了，又怎么样呢？

后来初升高统考，我报的是外语学院附中，离我们家就一墙之隔，而且已经考上了，分配我学德语。音乐学院附中其实我也考上了，但录取通知书寄到家，我妈给捂起来了，不让我知道。眼看就要开学了，不知怎么被我发现了，于是我到外语学院转一圈，又回来了。因为那天在音乐学院复试完，我和邱璐出来，走

到石驸马大街（今新文化街）的时候，正好是附中的红领巾乐队、合唱队去演出，坐着大巴、唱着歌从我们俩面前一过，哎呀，我心想：“就是这儿了，离不开了，无论如何也得来。”

其实我们家挺反对的，特别是我爸爸，一直耿耿于怀。因为在他的观念中，“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等等，觉得还是应该正经学一门专业，好好上大学。所以他找了很多人来动员我，但这回我很坚决，非要去音乐学院不可。

### 三

报到以后分专业，因为基本上是按照一个乐队的编制去招的，特别是管乐，每个专业都得有两三个人学。弦乐有的还有过一些基础，但像我们这些学管乐的，大部分都是白丁，大概只有一个从武汉来的女生学过小号。

分专业那天，所有准备学管乐的人都给集中在旧礼堂，长笛、oboe 等等所有老师都来了，他们去挑。比如你想学长笛，OK，长笛要求嘴唇薄，过来让专业老师看看你的情况。再比如圆号，那得牙整齐，不然就很费劲，高音吹死了也上不去。我们坐那儿的时候，旁边一个哥们就问我，说：“你想学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说：“你应该学大管，大管好听。刚从苏联回来一个专家，跟他学最好。”因为他爸爸在乐器厂就是做大管的，所以他特别想学。

等轮到我的时候，老师问：“你想学什么？”结果我给忘了，说：“什么……什么什么管儿，长管儿！”长管儿？没这乐器，是不是长号？我说不是“号”，老师说：“不是号，那是什么？大管？”“哦，对对对，大管、大管！”于是把我领到专业老师那儿，看看条件不错，就这么定了。后来坐我旁边的那个人去，因为他个儿高、嘴唇又厚，老师说学长号合适，非逼着他学了长号。这个人小时候大概因为偷东西之类，给送到工读学校，所以他是从那儿考上来的。可见当时音乐学院附中大门之宽，不要说像我这样的白丁，连他那样从工读学校出来的，只要符合学音乐的条件，照样给招进来。

当时学校里的大管老师叫刘光亚，法文很好，本来我要跟他学，但是没过多久中法要建交，他被外交部抽去当了文化参赞。那时候，中央音乐学院请了一些捷克专家，捷克的木管在世界是一流的，于是就办了一个进修班，全国各地的大管都来上课，一个沈阳的老师带我学了一年。当时六年制那班也有学大管的，比



我早学了三年，那真是没法比，程度当然要好很多。那时候我已经十五岁了，很多事情不大开窍，虽然很喜欢大管，每天咕噜咕噜吹两三个钟头也不嫌烦，但还属于自娱自乐那种，没想过以后要如何如何。

下图：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乐队



9月份入学，到了冬天就去农村劳动，来年开春又去。我从小住在农科院，因为它过去是日本人建的，还保留了很多传统。比如它的厕所，那叫一个干净，一点儿脏的痕迹都没有，所以我上了附中，最先不适应的就是厕所。等到下农村，那就更甭提了，好家伙，从第一天开始，只要大便一憋着想上厕所，进去顿时就没有了。一天、两天，整整一个礼拜没有大便，最后给我吃泻药，但那也不行，甭管多难受，只要一进去，立刻就没有了。没办法，大夫让我回城里看病，刚进家门，我妈妈还说：“你怎么回来了？”我说我……，一到家就不行了，赶快上厕所，一蹲那儿就拉出来了，什么事都没有了。妈妈、爸爸还专门找我谈话，我说：“我根本就不是怕苦。”因为下去忒好玩儿，而且在农村，你可以吃到新鲜的粮食，我觉得挺好。后来在家呆了几天，跟着就赶上救火。

1960年4月1日救火，这在音乐学院历史上是一件大事。那个时候，北京老的内城城墙还在，复兴门这段是给挖了个洞，让一个化工厂当仓库使，放的全是化工原料，甲苯、甲醛等等之类。城墙外面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边就是中央

音乐学院。北京的四月非常干燥，刮大风，城墙失火了。当时是十点多钟，我们正在五楼上俄文课，突然听见外面大声喧哗，透过窗户就见西边浓烟滚滚。这回课也甭上了，大家呼啦一下都往外跑，然后翻墙，我也跟着一块儿去了。越接近火场人越多，大都是看热闹的，而且仓库里污染很厉害，知道的人都不进去。我是什么都不知道，直接就往前冲，仓库门口有解放军在指挥，说：“往里走、往里走……”我就跟着进去了。里面有一种刺激的香味，人闻了特别兴奋，见有很多大罐子，类似现在纯净水水桶那么大，我抱起一个就往外搬。大概也就走了十米、八米，刚出门洞一招风，大概他们一接过去，立刻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直接救护车给送医院，好几天才醒过来。那一次是挺轰动的，见了报、上广播，惊动了国务院，像邮电医院等等都住满了，好多旁边站着的也都拉去。音乐学院后来课都停了，全都拉到医院做检查。我是落了一个过敏性哮喘，闻到点儿灰尘、怪味儿，马上就喘不过气。

本来家里就不同意我上音乐学院，这回又添上一个哮喘，于是就让我退学，非让我走。可我不愿意走，家里边和学校商量，老师说那就改吧。贝司缺人，相对来讲也容易学点儿，而且那时候像贝司、大管，这都是最没人学的东西。学管乐的，最先想到的就是长笛，长笛不行学黑管，oboe 特别累，大管“卜卜卜”就更没人学了，那属于伴奏乐器。但对我来讲，只要能让我留下，学什么都行，于是就改了贝司。

音乐学院有个笑话，小提琴学不了的学大提琴，大提琴学不了的学贝司，贝司学不了的学打击乐，再不成就改指挥。其实正好相反，贝司真是不能太笨的人学，到现在为止，中国乐队里最差的就是贝司。而且在乐队里，可以说，拉贝司的根本就听不见自己拉的什么，当这六个贝司不是一个音的时候，这个难听啊，哈哈。现在学贝司的人不计其数，因为各地都在搞乐团，最缺的就是贝司。你要拉小提琴，十年很可能什么都不是，但你要拉十年贝司，那考音乐学院没问题。

我是高二才学的贝司，我们班已经有了两个，六年制那班还有一个，个儿特高、手特大，他就是小提琴不行改大提琴，大提琴不行又改的贝司。那时候我个儿矮，抱着贝司顾上头、顾不了下头，一会儿把腿儿摔坏了，一会儿把琴头磕了。不过我属于比较用功的，一是喜欢，二是因为学的晚，所以一天能拉十二个小时，十二个小时不离开这琴。而且那时候我们也没什么目标，如果说有的话，最想的

就是以后有没有可能去苏联留学。

那个年代的老师水平有限，很多都是十几岁了才开始学，家境好的到外国留学，最多就是听过点儿、见过点儿，带点儿唱片、谱子回来就是教授了。所以那时候的教学，比如小提琴的双音，三度、六度、八度，更不用说十度了，在50年代初不太主张拉，也不敢拉。像张云璋，那是音乐学院红领巾乐队的首席，绝对是高材生了，大三时候拉门德尔松的第三乐章，那已经是牛逼哄哄，简直就是帕格尼尼在中央音乐学院现身，哈哈……

#### 四

1959年的供应还好，入校的头两个月还是大锅饭呢，随便吃。到第二年春天就开始紧张了，真正最困难是从1960年的10月份开始。那时候管乐有补助，每天半磅牛奶，另外还有管乐加菜，大概也就一个月一次，每次加一小碗，恨不能还是周恩来特批的。那时候的定量是每人、每月二两肉，你想想，怎么分呢？所以就每月吃一次红烧肉，每桌放一碗。学校的食堂好像是八个人一桌，每桌一盆菜、一盆饭，大家都站好了，甭管什么，哪怕是烂白菜，也都一勺勺分。比如今天轮到吃肉了，该我分菜，按照定量这一桌也就一斤六两肉，其实炖熟了没多少。第一轮下来，一人先一块，第二轮的时候呢，上次大一点儿的，这回就分小一点儿，上次肥一点儿，这次就瘦一点儿，勺上得有准，因为大家都眼睛盯着呢。最后总得剩一口汤，没法分了，于是倒自己碗里，马上旁边就有人急了：“上次分肉就是你，这回又倒自己碗里了！”

买东西要票，粮票、布票、油票、肉票，光有钱还不行，不能说想要多少就买多少，每个人都有定量。记得那时候还有饼干票，最干不吡咧的那种，大概是每月二两。金毓镇、黄云生经常打赌，为点儿什么事抬杠，好，饼干票拿出来，谁赢了谁拿走。金毓镇喜欢无线电，有一次焊东西给电着了，在那儿一边念叨一边哆嗦手。黄云生过来，说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你敢摸？”敢摸！“你敢摸，我饼干票给你！”好么，那黄云生还真就去摸，咦！——

……

50年代初，我父亲作为中国农业代表团去过东欧。他说，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里，匈牙利的农业是解决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别人都是按苏联的模式，走

集体农庄的道路，包括我们国家也是，一解放了给农民分土地，今天刚高兴，明天就说：“我们要走集体化道路。”第一步叫“互助组”，你们家可能两个男劳动力，我们家孤儿寡母，或者你们家有一头骡子，我们家一头牛，咱们搭伙一块儿干，这也无可厚非。就这么着，从“互助组”到“初级社”、“中级社”、“高级社”，最后是“人民公社”，一步一步逼着农民，把大家的所有权给剥夺了。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走这条路，但匈牙利是个例外，它到“互助组”就止步了，发现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于是就没往下走。所以，匈牙利的农业搞得最好，大家有饭、有菜、有水果，而且还有酒喝、有肉吃，除此以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都有问题。苏联一直到70年代都赶不上沙皇时期农业的最高水平，就是说，只有倒退、没有前进，你就知道有多么糟糕。中国也一样，在改革开放否定了“人民公社”以前，粮食始终不够，一个月定量20斤、24斤、28斤，最多大概是34斤、36斤，其中70%是粗粮，只有30%是白面、大米，还是南方一年三熟的那种机米，又干又硬又柴，吃完了胃反酸。像小站稻，一年只吃一次、半次，还是因为过年，每家“特供”几斤，拿着本儿去排队。

1958年“放卫星”，各行各业都这么干，农业也一样。十年后，我们曾经到过天津小站，当年领导“放卫星”的那批干部已经被打倒了，于是就让群众揭发，这我们才知道许多“内幕”。天津小站稻是很名的，当年说是亩产两万斤，上面来验收，包括《人民日报》、广播电台的记者都来了，还请了日本人。日本是水稻大国，有经验、有技术，是世界一流的，但也做不到亩产两万斤，所以他们一定要来瞧瞧。小站人是怎么弄的呢？头天晚上，他们把附近田里成熟的稻子集中在这块要验收的地上，直接塞进去，所以后来那上面可以坐小孩，鸡蛋放上都掉不下去。验收的时候，稻子拔下来，一捆一捆挑到场上，所有打场的人都穿着大长裤，里面灌的全是稻粒，到时候一抖露裤腿，就这么，两万斤出来了。要知道，亩产一千斤已经是凤毛麟角，两万斤，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后来爆出亩产12万斤、15万斤，那就更邪乎了。中国几千年，其实是个落后的农业国，从秦始皇开始一直到毛泽东，直到他死了，中国人还吃不饱饭。

1956年，国际共产主义走到了一个拐点。主要的两个代表，一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另一个就是匈牙利事件。那时候，他们真是把共产党拴到树上吊死，坚决不走社会主义了，最后被镇压下去。当年中国坚决支持赫

鲁晓夫派兵，镇压下去以后，只是简单地跟老百姓说，匈牙利发生了反革命叛乱。因为在此之前，我爸爸在向上汇报材料以及座谈时，都讲到了匈牙利的农业，后来就成了他的一大罪状，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一直到文革，还为这事挨整。

## 五

50年代末有个“红专大辩论”，而且是全国范围的，各个大、专院校以及部队都在大辩论。过去我们没有“专”，小米加步枪也可以打败日本侵略者、打败国民党，以及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靠的就是“精神原子弹”，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以“红”是最主要的，是绝对的。但是“专”呢，不“专”你炮打不准、飞机飞不上去，但只“专”不“红”，你也可能调转炮口打我们，飞机飞到台湾去。

这是一场巨大的辩论，音乐学院附中、大学，包括各个系，都存在这个问题。比如业务比较差的人，自然而然就选择“红专”道路，政治上靠拢组织，入团、入党，当个小干部，叫做“以红代专”。那时候，经常礼拜一的下午要开所谓的“生活会”，比如宣布说：“今天我们帮助帮助张三同学吧。”张三同学事先不一定知道，一听说要“帮助”他，立刻“哇——”就哭了，然后大家站起来揭发，说他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一通数落。其实那都是有组织的，班主任、团书记、积极分子等等都事先准备好了，当然也不会对张三同学做处理。我和吴灵芬在班里属于最小的，对这些事情都不感兴趣，而且觉得很可笑。但那时候就兴这个，也是一种政治气氛了，好像就得这么不断整人，这个班才管得住。

有些同学呢，比如郑凯林、黄远浦等等，就知道练琴，政治上面完全不开窍。金毓镇更是了，他是“白专”的典型，他有一篇著名的作文，是被作为音乐学院反面教材的。那时候，音乐学院一楼是琴房，二楼是图书馆、办公室，三楼是教职工宿舍，四楼、五楼是学生宿舍。走廊里有个大电铃，每天早上打铃起床，巨响不说，学音乐的人耳朵都比较尖，从睡梦中被吵醒是相当痛苦的。所以，金毓镇就写了一篇作文，说：“恶魔般的铃声把我从美梦中惊醒，……”其实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邓小平的女儿邓林跟我们同过班，她大概上了半年多就走了。因为像她这种级别的人，爱上哪个学校，一句话就上哪个学校，不存在入学考、成绩

之类的问题。当时她喜欢画画，因为我们同座位，还送过我一张，大概是画的牡丹，我没当回事，过两天就给扔了。后来她发现，自己学音乐什么都不是，毕竟一点儿基础也没有，于是就跳槽，去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

班里有个女生叫陈莲，她的妈妈是共产党第一代的播音员，延安时期就在新华广播电台播社论，非常著名。因为背景相同，陈莲和邓林走得很近。60年代毛主席抓所谓阶级斗争，说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等等蠢蠢欲动，对社会主义心存不满。在这个背景下，陈莲就把音乐学院的很多现象写成一封信，说地富反坏右、国民党的孩子在学校里受到重用，“红”的同学被腐蚀了，或者堕落了等等。最后由邓林递给她爸爸，她爸爸递给毛泽东，毛主席还给了批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影响很大。信里也提到金毓镇的这篇作文，因为金毓镇的爸爸是国民党，所以金毓镇就是国民党的子弟，他写我们红色的音乐学院是“恶魔般的铃声……”，透着对阶级斗争的仇恨。不知道信里点没点金毓镇的名字，反正谁都知道是他写的。所以高中毕业的时候，如果以政治思想来看，他是不合格的，但是他比较用功，就让他大学先试读一年，以观后效，哈哈。

关心政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标准，比如我也关心政治，但那是“政治理论”意义上的政治，包括什么路线斗争、国共合作，那是从党史的角度看政治。还有一种政治是现实的政治，比如咱们班这四十个人，谁是左、谁是中、谁是右，谁是班主任的红人，谁是团支部的培养对象。如果你最喜欢方昕，那你最没有政治头脑，因为方昕在这个班里属于右派，属于被孤立，甚至被拿出来作为典型的人。

现在到六十多岁我明白了，什么是“组织观念”？有的人甚至连他妈共产党哪年成立的都不知道，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狗屁不通，但他是共产党。因为他的组织观念是：我要拍书记的马屁，我得靠拢他，他恨谁，我就得骂谁，他喜欢谁，我就得拍谁。如果有一天书记说：“红旗变成蓝旗啦。”他绝对第一个跟着。因为他没有共产党、国民党的观念，只知道张三、李四的区别，这才叫“组织观念”。而我，恰恰缺少这种组织观念，所以组织上也不找我。一说班里这四十个人，比如金毓镇，他爸爸是国民党，本人还对社会主义极端不满，他是右派。郑凯林、黄远浦，这属于中间派，没有政治头脑，只知道练琴。方昕也属于这种。

我是1965年最后一批入的团，那实在是阴差阳错。1964年，上级决定在各

大专院校派驻政治部，以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这是以前没有过的。音乐学院政治部主任是从济南军区调来的一个师级干部，大树毛泽东思想，其中就提出来要发展根红苗正的革命接班人。忽然发现，哎？管弦系有个方昕，妈妈是红军，爸爸是老革命，这个人怎么能不发展？就这么着，1965年忽然通知我入团了。你说我想不想？那我绝对想，但从来没人找我，没人给我启蒙。入了没多久，文化革命了，所以我都没过过什么组织生活，入团对我一点儿意义都没有。后来等我都工作了，忽然有一天跟我说，还没有履行退团的手续，让我签字。哈哈，真他妈的可笑。

## 六

中学毕业以后，我们班大部分人都工作了，而且那时候如果让我工作，我也就去了，没有任何失落感。但可能跟我这个专业有关系，而且我比较用功，属于会练琴的那种，于是就让我上了大学。

我是1962年上的大学，郭民英[郭民英（1943-1967）：郭沫若之子，文革中自杀，时年24岁。]和我同学，而且和我的关系还很好。他是高中毕业以后才上了音乐学院，学小提琴。像他那样家庭背景的人，无非就是他爸爸一句话，想上哪个学校都可以，于是先读了一年预科，然后跟着我们班上。当然他的程度很浅了，所以他也很痛苦。你想，他最喜欢的是肖斯塔科维奇的小提琴协奏曲，对他来讲，那不就是望尘莫及的事情么。另外还有一点，因为我们俩很熟了，他也跟我聊得比较深，老跟我说：“我特别羡慕你。”因为我爸爸是个小干部，我们家老是其乐融融，但他们家不是这样，大概一年也轮不上跟他爸爸吃一顿饭。他们家是两个伙，他爸爸因为经常要应酬，所以自己一个灶，家里他妈妈和孩子们是另一个灶。平常他见着他爸爸，就跟你见着县长那种感觉一样，无非就是“要好好学习”之类，那种推心置腹的沟通完全谈不上。

他们家就在什刹海边上，条件非常好，里面几套四合院，光是看门的就一个班。那时候郭民英十八、九岁，跟我们一样大，但他自己有一套房子，一共三间，进去是客厅，里面摆着大沙发，当时大概只有中南海才能见到的那种，然后这边是卧室，另外一间是琴房，或者是书房。比如他换洗下来的衣服，往沙发旁边的篓子里一扔，马上就有人给拿走，比宾馆要高级多了。他去上学，开始是用他爸

爸的车，配司机的，后来他爸爸说“不要搞特殊化”，于是就骑“三枪”、“凤头”来上学，那都是英国的名牌儿，他们家不知道有多少辆。当时音乐学院有一台国产的601录音机，原价四五百块钱，大石头块子一样，最少得有四十斤，而且很烂很烂。但他们家是从日本进口的、小的开盘飞利浦录音机，那我们连想都不用想。还有什么收音机、大唱机，家里摆着钢琴，啊呀，简直羡慕死了，有些还是赫鲁晓夫送给毛主席，毛主席又送给他爸爸的呢。

再有就是打乒乓球。我从七、八岁开始打，那时候是胶粒的拍子，后来有了海绵的，三块多钱一个，很贵，我是梦寐以求，天天站小店那儿看。后来来到海淀黄庄的破烂市场，臭球鞋一毛钱一双，那底儿不是海绵的么，买两双回来，先拿水一遍遍洗——多少年的脚汗都吸在里头，你能想像那有多臭，然后绞下来，拿胶贴上。那拍子巨沉，而且弹性差，但终于是一块海绵拍子了。到了暑假，我还报名数麦粒。农科院是科研单位，花盆里种麦子，等到收成的时候，经常招一些临时工数麦粒。那是件很细致、又很烦琐的工作，我是经常数错，人家一看就不对，不愿意让我干。后来那头头认出我了，说：“你怎么来了？”因为也没多少钱，一般都是家境不太好的人来干。我说：“我想要个乒乓球拍子，我爸不给买。”“多少钱？”我说三块，“算了、算了，给他开三块钱，让他走吧。”这我才有了第一个海绵拍子。

我就这么打、打、打，那个迷呀，迷死了，后来是乒乓球的三级运动员。郭民英也喜欢，他的条件当然要好得多。到了礼拜天，就有国家队的人到他们家陪他打，所以那种最新技术他都知道。现在有一种常用的发球叫“高抛球”，使劲往上一扔，抛得挺老高，然后落下来再打。当时有一种打法叫“合力球”，也是往上扔，但它是起来就打，速度非常快，而且落到案子上它往回弹。如果这球贴着网子往最近的地方落，能直接又蹦回来，这简直太绝了，发十个，你十个都接不着，后来被国际乒联给取缔了。但那时候才刚出来，郭民英会发这种球，我们就都跟着他学。

郭民英是文革初期时候死的。他在音乐学院学琴，你想，他是高中毕业才开始学，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前途。而且当时他已经意识到，不能再安于现有的种种特权，他说：“我爸爸如果不在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在五、六十年代，不管你爸爸是部级、还是总理一级，等老爷子没有以后，一切待遇都要归于零。而且中



国自古以来就是官本位思想，一直到现在，“官大压死人”，比如差一级差在哪儿，正的、副的有什么不一样，老百姓说不清楚，但凡是那些大的官，对这个都非常敏感。包括郭民英，因为他从小受的就是这方面的影响，谁的官大，大到什么程度，是什么待遇。那时候他已经意识到，他父亲要出事，可能要靠边站，那就一切都没有了。

我爸爸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是个小官，1955年给定的是行政十一级。而且，我爸爸从延安时期就开始挨整，说他是国民党特务，1942年整风差点儿没给弄死。后来毛主席说“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就这么着一下子刹车了，到此为止，死了就死了。我爸爸从那时开始，三反、五反，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就没断过顿儿，老挨整。所以后来他也明白了，不争、不强、不斗：我不斗别人，别人斗我，我也不反感。所以为什么他能活到今天，就是这样，不招恨，自己也心态平和。

那时候我和郭民英谈得比较深，所以可以理解，他还是属于热血青年那一类。而且那时候的年轻人普遍都有一种英雄情结，觉得要靠自己去奋斗，不能安于平凡的生活。这种情况下，他就在大学二年级时申请退学，到南海一线的海军去当了兵，后来的情况我不太了解。1967年初，在一次值夜班的时候，他自杀了，拿一支步枪放嘴里，用脚扳那个扳机，死的很惨。

## 七

大学本来是五年，但实际上，我们只有一年级是正常的学习。从1963年起，开始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改革，要跟实践相结合、跟工农兵相结合。1963年底开始“四清”，市轻工局的党员干部到音乐学院做工作队的领导，我们大学生作为社会实践，接受阶级斗争的“洗礼”。

开始只是去了解，一次住半个月，而且主要就是劳动。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个月交14块5的伙食费，按顿算出来，在谁家吃就交给谁。北京郊区农民吃饭都在炕上支个小桌，他们是这么个规矩：老人不上桌，妇女不上桌，小孩不上桌，我们吃剩撤下去的，他们有什么吃什么。像爷爷、奶奶在厨房灶边上吃一口就完了，没人介绍说：“这是我爸爸……”根本没人理的。比如这个礼拜在张三家吃，就把那3块5毛钱交给张三，他们吃什么、我们吃什么，理论上不许单做，他们也没有条件单做，穷到什么程度呢？到了冬天，棒子面粥一人一

碗，然后是一筐箩干粮，里面有棒子面的饼子，最多两个，剩下就都是白薯。菜是没有的，只有中间放一碗咸菜，还不是八宝酱菜之类高级的东西，就是北京人叫“苳菹”、直接腌出来的那么个玩意儿，然后切成丝。如果今天有客人，就在里面滴一两滴香油，你想想，成天吃糠咽菜的人，这一两滴香油能让他香一个礼拜。而且，一般来说棒子面的饼子只有壮劳力才能吃，老人、小孩和妇女一律就是白薯和棒子面粥。所以像我们去了，都不好意思拿那个饼子，顿顿就是白薯和粥，加上我又有胃病，后来一吃吃七个多月，那个痛苦劲儿就别提了。

我住过一家，兄弟俩是前、后院，有天早上起来就听见那个嫂子嚷嚷，说他们家鸡蛋没了。因为每天早上一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摸鸡屁股，有蛋，OK，就等着它了。回去做饭烧水，等再出来，蛋没了，于是就站篱笆墙那儿开始骂，“他妈的，死你们家八辈儿祖宗……”。其实她不想想，亲哥俩，祖宗都是一个，你的不就是他的么？骂到后来，她弟妹出来就对骂，你扯我头发、我揪你耳朵。那时候的中国农村就是这样，就为这一个鸡蛋，你不下去不知道。

我们还是一家吃过饭，这家特别逗，三代没有女的：爷爷在、奶奶没了，爸爸在、妈没了，加上儿子，这家是三个大老爷们儿。儿子大概有十八九岁，爸爸是四十岁，爷爷不到六十岁，都在生产队里干活。我去他们家，正好赶上端午节。那时候通县方圆几十里地，一共就吃那么三次肉，春节、端午、八月十五。他们到供销社买了十斤肉，买的时候就说了，把红的都剔了，就要肥的，回来白水一煮放点儿盐，爷儿仨一人一碗。我的老天爷，那可是十斤肥肉啊！把我给惊的，换成我，一口我都吃不下。后来我跟别的老乡说：“他们家可真棒，十斤肥肉，一顿全能白嘴儿给吃了！”结果他们说，这还是有数，你让他们敞开吃，他们能吃更多！

这家三个人都是壮劳力，按生产队的标准，一人一年分二百多斤粮食，基本都不够自己吃的，跟旁边一家成鲜明、鲜明的对比。他们家旁边一个邻居，男的大概没有四十岁，两口子生了五个孩子，也是每人两百多斤粮食。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按人头说话，不管你大、小，也不管你干、不干，都是每人一份。他们家七口人，就他一个劳动力，整天拿着镐，在生产队里吊儿郎当，你爱记多少分就多少分，反正我能生，恨不能八个月就生一个，老大到老小差不了四年，从一岁到五岁，一年加起来也吃不了二百斤。所以对他来讲，社会主义真太——好了！

在农村，壮劳力一般是一天十个工分，女的八分，哪怕干同样的活，也是八分，老人是六分。所谓“好活儿”有那么几种，一是赶大车。两匹马加一个骡子，一天记十分，而且因为他给队里创收了，再加十分，还有一点补助，可以买酒、买肉。看机井也是好活儿，也就是看水泵，比如春天要浇麦子，秋天要灌水稻，你看着就行了，也是十分。看场，麦子收割以后堆在空场上，晚上得有人看着，这也是不用出力的好活儿。还有记工员，每天队里有多少人干活、干什么活儿，他负责记录，这也挣分。

早上起来六点敲钟，村里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到村头来集合，男的胡侃，女的就纳鞋底子、织毛线。等人到齐了，队长披个棉袄、叼个烟袋就来了，派活儿：你去挖粪，你去积肥，你们几个给白薯翻秧。不管有活儿没活儿，得把这二百个人给安排了。之后由组长带着，该干嘛干嘛，队长就回家吃饭去了。比如说，今天这二十个人翻秧，组长带着去了，总得有半个多钟头才能走到。到那儿第一件事是“抽一袋”，又半个钟头，组长站起来，把棉袄往边上一放，“上垄吧”。二十个人一人一垄，掀、掀、掀、掀，到头了，再抽一袋，换一垄……“怎么着，歇了吧？”那就回家吃饭啦。三天也是一倒（指翻秧），两天也是一倒，一天也是一倒，反正得给你找点儿事做。那时候挣十分是一毛钱，要从效益讲，这连一毛钱效益都没有，你都干什么了？哈哈……

1964年去通县，一呆就是七个月，那次除了劳动，我们整个“四清”过程都参与了。先是跟着开大会，看群众怎么揭发村长、书记的问题——其实也不是他们自发的，上面派人前面带着、后面推着，逼着他们去斗那些村干部。“我们作为工作队，是毛主席号召我们来的，大家有冤的报怨，有仇的报仇。”的确也是有冤、有仇的，有人愿意说，但有的纯属是个人恩怨，甚至于无中生有、胡说八道，所以你还得去做一些非常细致的调查工作。还有“访贫问苦”，那都是有选择的，问问那些农民村干部的历史，村里什么人好、什么人不好。完了以后开小会，看怎么落实，最后是重组阶级队伍。

其实现在来看呢，所谓“四清”就是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前奏，叫做“舆论准备阶段”。通县和河北交界，一河之隔就是白庙，解放前属于国共拉锯的那么个地方。的确我们在“四清”时候看到了，那些村干部完全违背了共产党为人民谋利益、服务人民的原则，自然也就是国民党的“代表”。过去老说国民党欺压老

百姓，那都是电影里见的，但你眼前这些，看老乡那儿控诉啊，把他们骂得头都不敢抬。也因为有了这个，我们对文化革命毛主席提出来的“这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这种理论，能够接受。

通过这个运动，整掉一批“四不清”干部，财务不清、政治不清、思想不清、作风不清，然后发现一批根正苗红的接班人。最后我们走的时候，队长、书记都重新换人，并且重组了阶级队伍，培养一批积极分子，后来有些都成了国家干部。前些年，通县的一个局长请我们吃饭，他就是当年我们“培养”的接班人，我们对他的过去太了解了，连他们两口子怎么好上的都一清二楚。这女的姊妹五个，她行二，家里也属于就她爸爸一个人干活儿，妈妈带着这五个孩子“吃”社会主义，所以日子过得特别好。我们到别人家吃派饭都是白薯、粥，到她们家能吃挂面汤。她爸爸老实巴交那么一个人，这个老太太可厉害，抽个烟袋锅，完全就是地主婆那种感觉。她的那个姐姐长得不难看，可惜小儿麻痹，是个瘸子，嫁了个建筑工人是一只眼，所以俩人谁也别挑谁。那时候没有农民包工队，进去就是国家单位，一个月四十块钱，相当不错了，每次回村骑个“飞鸽”车，那跟现在“宝马”、“奔驰”的感觉差不多。这个老太太在炕上抽着烟就说：“我这瘸子都嫁这么好，……”就是说，后边这四个姑娘，只能一个比一个好。结果呢，老二喜欢上同村的这个“接班人”了，可把老太太给气疯了，天天骂。虽然他是初中生，有文化，是工作队的红人，而且当时已经培养他当副队长了，开会要讲话的。但那时候看不起农民，老太太根本看不上，一直到我们走，俩人都不敢公开。可是到了后来，当、当、当，当到局级，好家伙，顿顿都是五粮液，有好茶、好饭吃，带着老婆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五湖四海的转悠，全世界玩儿了一大遍。

这，就是我们培养的接班人。

## 八

等回到学校，那种“风雨欲来”的气氛就已经明朗了。比如说，60年代以前，音乐学院基本上遵循着苏联教学的那一套，但是现在它“修”了，教什么、学什么，都是个问题。而且陈莲的那封信把这都上纲上到说：“社会主义的音乐学院都是‘大洋古’，充斥着资产阶级没落的东西。”毛主席说了，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比较明确的理解就是说：要以“中”为主、以“今”为主。但中国的

东西有多少？小提琴不能从早到晚就拉《新春乐》，而且像《平湖秋月》、《二泉映月》，那也不适合革命的需要。

那时候还瞎编了好多中国教材，什么《红军歌》等等，练多了以后，提琴不会拉了，可以直接改二胡。因为提琴是绝对音准，像二胡、板胡都是相对音准，可以“抹”，每个音都带点儿滑音，拉提琴的要练多了那个，手上就没准儿了。而且那时候提倡学民乐，管弦系人人兼一样。黄远浦是兼唢呐，整天躺在床上吹“嘀哩嗒拉嗒——，嗒拉嗒嘀嗒——”，我们说：“什么玩意儿，那他妈能叫乐器？”

那两年，老师不知道该教什么，学校领导也都在观望。所以从1963年开始，我就没怎么正儿八经的上课，除了打乒乓球就是政治学习。别人也一样，愿意练琴的就练，不愿意练就不练了。本来我最终的目标是为了留学，所以拼命练，但是1963年以后，大概连那一拨人都没走成，我也就再没一天十二个小时那样泡琴房。练琴是这样：越不练琴，就越能不练琴；越练琴，就越不能不练琴。而且，那时候的人任何、任何的目标都没有了，并没有意识到下面迎接我们的是什么，听领导安排、国家安排，走哪儿算哪儿吧。因为大家都这样，你就感觉不出什么不正常，也没有什么失落。

轰轰烈烈的革命造就了新中国，我们作为新中国的年轻人，也应该轰轰烈烈地做一番大事情。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好像没什么大事可做了，所以毛主席说要发动文化大革命，造就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我们才能那么热情地投入进去。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革命”，这是没问题的。它把1949年以来建立的政权全部推翻，把从刘少奇一直到县、市、村的领导班子全部拉下马，全部打碎了，废掉所有当权派，然后完完全全重新建立一套新的领导体系。当然，那不是自下而上的，而是自上而下，“皇上”要造“宰相”的反，按照毛主席的说法，是要重新把权夺回来。但我们现在知道，其实也不是这么回事。作为一个领袖、一个政治人物，他已经清楚地看到马列主义在地球上的前途，而共产党的覆灭、共产党的衰败就意味着否定毛泽东——虽然他本身并不信马列，但他已经是这个位置了。所以，他希望通过这么一场革命，自己就先否定自己，等到将来下一个历史阶段，他还不至于被否定。至于周恩来、刘少奇这些人，第一他们不一定真正地理解，第二他们是站在绝大多数共产党员这一边，要保护他们的利益。所以到最后，文化大革命夭折了，又把原来的那套官僚制度恢复起来，毛主席所有的心机

全白费。

我们作为大学生，作为比较积极思考的这么一批造反派们——就像共产党一样，共产党里是鱼龙混杂，有些是在国民党里不得志的，有些是做生意失败的，有些是土匪、军阀出身的，还有是因为反对封建家庭的，阴差阳错进到革命队伍里来。同样，即便是“造反派”，也是各种原因、各种目的，什么情况都有。我周围的这群人，文革以前对政治不感兴趣，没有说要谋个一官半职，而且要是有的话，今天也就隔儿屁着凉，死掉了。还是热血青年吧，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所以，我们才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当中去，以为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变革。但是后来才发现，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几千年传统观念下官僚力量，他们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

我从小生活在机关大院里面，到了后来上附中，也是出了校门直接回家，接触社会比较少，吃烤鸭都是三十岁以后的事，像吃豆汁、爆肚、炸灌肠就更晚了。那时候，从小就教育我们：你是一个“社会的人”，是红旗的一角，你的天职就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除“四害”、大炼钢铁，那都热闹极了。而且国家灌输的都是英雄主义，像《地道战》、《地雷战》，所以我们从小就喜欢打仗。再加上毛主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论，别人我不了解，就我本人来讲，就觉得：文化大革命势在必行，早晚要爆发，我们年轻人一定要经风雨、见世面，经受血与火的洗礼，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就变成战士了，不再是初出茅庐的小毛孩。所以，不管你是学贝司，还是学小提琴的，将来都要投入到革命的事业中去。等到人类走向共产主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大家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那就什么事情都好办了。但在这之前，无论你干什么，都离不开“革命”两个字，那是全人类的事情，是大事当中的“大事”。

文化大革命，后来把它描绘成一场浩劫、一场灾难，抄家、死人、破坏文物，但是亲历的那些学生，在那一霎那，是不能用语言来描绘的。1966年的八月份，我去过人大附中，那在北京的中学里属于比较激进的，干部子弟、部队子弟也多，女孩儿们都是扎着皮带、穿着军装。学校里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那个热热闹闹的场景，真有点儿像《列宁在十月》里刚打完冬宫的那种场面。学校机构已经打垮了，校长、书记都进了“牛棚”，老师们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好，于是群众组织掌权了。后来知道，所有这一切都在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操纵之下。（未完待续）

## 【检讨书】

## 我的交代和检查

李慎之

1966年9月23日



李慎之（1923--2003）

我是一个在民族民主革命的浪潮中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参加革命以后，虽然得到党的长期教育，但是由于我坚持资产阶级的反动世界观，对历次思想改造运动由内心怀疑，抵触而对抗，终于在1957年走到在政治上同党完全对立的地步，在大鸣大放期间发表了大量恶毒攻击党的领导，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的言论，被划为右派分子。在反右斗争以后，我的反动的政治思想受到了猛烈的批判，表面上也似乎有了一些认识，口头表示低头认罪，但是骨子里仍然坚持原来的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立场，不肯认真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我的不服罪和抗拒改造的思想，在改造过程中一再有所流露，也一再受到打击，因而有所收敛，在1961年年底摘掉了右派帽子。当时我们的国家遭到了暂时的困难，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大批出笼，在那样的政治气候下，我的反动思想再次萌发，还妄想重新钻进党内。我现在在这里向党向人民交代我的罪行，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请求党和人民给我以应得的处分。

## 一、不服罪

我第二次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根源在于我在1957年并没有真正服罪。我在反右斗争以后，只承认自己那一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是错了，也教条主义式地学习了一些马列主义理论，进行了一些自我批判，但是内心不肯承认自己确实确实是站在同党和人民完全对立的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立场上同党和人民为敌，

以为只要在理论上批判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就还是一个“好人”。

我不是继续不断地深挖自己的反动思想根子，而是不断地自欺欺人，把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看成是“认识问题”，是“受了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把自己发了那么一大堆反动言论，犯了那么严重的反党罪行说成只是“自作聪明”。自己认为自己一贯受党的爱护信任，被认为党的“宠儿”，自己“一直跟党走”，“对党有感情”，不可能是“蓄意反党”。我死死抱住跟党走一段路，参加过民主革命的历史，给自己脸上贴金，把自己说成是虽然犯了错误，“人还是一个好人”，在处理我的时候，我勉强承认了自己是党和人民的敌人，在支部会议上也举手赞成把自己开除出党，但是心里却还自以为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这样做是“为了服从党的利益”。以后又借龚定庵的诗句，大唱自我安慰的高调：“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仿佛自己只是一个失去了党籍的共产党员。

我把自己看成是所谓“党内右派”，认为自己同章、罗那样“或点火于基层，或策划于密室”，叫嚣“轮流坐庄”。妄想篡夺政权的政治野心家不同，同李康年那样在公私合营以后还想要继续剥削，搞“反攻倒算”的反动资本家也不同。我妄自把右派分子看成情况不一，是“鱼龙混杂”，而看不到“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顽固地拒绝承认像我这样的“党内右派”是更危险的一颗埋在党内的定时炸弹。

由于不服罪，我一直存在着委屈的情绪，认为开除党籍是党“下手太重”，认为自己还是可以留在党内改造，甚至认为自己应划为“修正主义分子”（当时修正主义分子还是党内的提法）而不应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还幻想三年五载，就可以重新入党。到柏各庄以后，右派分子之间的相互批判，有些提法比反右斗争期间对我的批判还要更高些。如说右派都是对党有“阶级仇恨”的，右派分子同一般有右倾错误思想的同志的界限在于右派想“上大街”“搞匈牙利事件”，有政治阴谋等。我不从本质上去看我的反动政治思想实际上必然会引向这种严重的结果，反而抵触抗拒，认为新华社组织上和同志们都了解自己不是那种人，认为我自己不是符合这种标准的“典型的右派”。当时，柏各庄领导上对右派分子的改造抓得比较紧，差不多天天晚上都要开会，向一切错误的言行思想进行斗争，我自己感到压力很大。老在脑子里构想自己过去还有些“好的表现”，觉得成了



右派以后“动辄得咎”，“右派难做人”，觉得自己“自惭形秽”，“抬不起头来”，甚至说：“错了就是错了，处分也已经处分了，天天无穷无尽地开斗争会，本来想通的问题也反而想不通了。”对同一些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在一起改造，也感到委屈。我不是利用这样严格的改造环境来认真解决自己的立场问题和世界观问题，反而抗拒改造，听任自己的委屈情绪发展。我顽固地坚持自己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正好证明了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右派分子。

## 二、诬蔑反右派斗争

由于我不服罪，不肯真正承认自己是一个与党与人民为敌的右派分子，我就当然地诬蔑反右斗争扩大化了。

我长期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立场上，把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歪曲理解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策，把毛主席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解为开放资产阶级式的民主，一直到1962年的时候，我还诬蔑毛主席和党中央对鸣放中间可能发生的问题事先估计不足，鸣放以后，反动分子大量出笼，才出于实际政治的必要进行了反击，结果使得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起来无法分辨，使得对党有仇恨的右派分子同认识上有错误的人分辨不清，我引用肃反甄别时候的一句话，说这种情况是“打狼的鞭子打到羊身上”。把自己这只披着羊皮的狼也说成是“羊”。

我继续重犯在1957年鸣放期间诬蔑肃反运动的罪行，说肃反是胡风问题引起来的，但是肃反的结果，清查出来的真正反革命分子并不多，错斗的人倒不少；说反右斗争是章、罗这样的野心政客引起来的，但是反右的结果从政界反到党内，把许多人民内部矛盾都搞成了敌我矛盾。

我诬蔑反右斗争原来的对象只有像章、罗那样一小批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政客和像李康年那样一小批反动资产阶级分子，但是结果反到了三十万人，在五百万知识分子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加上受批判的中右分子，打击面太宽，震动很大，结果使得知识分子不敢讲话，反右反到党内是损害了党内民主。事实上，正是因为打击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对他们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才保障了人民的民主，但是我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上却公然睁眼说瞎话。

我说：“肃反运动和过去历次的运动到运动结束以后都要进行甄别，有许多

人得到平反，唯独反右运动以后却没有进行甄别，没有一个右派分子曾经过甄别而平反。这是违反了过去历次运动的‘常规’。”

党把属于敌人范畴的右派分子放在人民内部处理，给以立功赎罪，继续为人民效力的机会，这样的处理是十分宽大的，但是我却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上，不肯真心服罪，诬蔑党对党内右派分子“处理太严”，过去历次运动中犯错误的人，在运动结束后接受处分就完了，而右派分子却要长期戴帽子，我也把这诬蔑成是党改变了过去“实事求是”，“治病救人”的常规。我甚至诬蔑说，“毛主席历来对犯错误的人都是宽宏大量的，唯独对右派分子却是太严厉了。”事实是：有了敌人的自由，就没有人民的自由，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右派分子的阴谋如果得逞，资本主义就会在中国复辟，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就将在中国重新出现，中国将重新落入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千百万人头将落地。我的罪行如此严重，党对我如此宽大，我还不思改造，这只能证明我的资产阶级右派立场的顽固。

### 三、诬蔑反右倾斗争

党明确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右派分子不一样，后者属于敌我矛盾的范畴，而前者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这一点我是明明知道的。但是，由于自己没有真正服罪，我却站在反党的立场上加以混淆。我在1959年底看到《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陶铸同志写的一篇批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文章，其中把党内右派分子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提，我就以此为“根据”，诬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与党内右派分子“差不多”，罪行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情节也大多是“言论”，还说什么把“党内右派分子”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提是“比较实事求是”。我甚至以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虽然也是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但是并不开除出党，可能是有鉴于反右斗争中把党内右派分子一律开除出党是“处分过重”的缘故。

1962年，我在看到有些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经过甄别得到平反，特别是，在新华社黑编委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之下，我所在的外训班领导上给反右倾运动中受批判的人“百分之百”平反，并且宣布他们的意见“基本正确”以后，我诬蔑反右倾的斗争也扩大化了。还诬蔑1957年以后，党员一有错误言论就成

为“反党”，压力过大。我诬蔑反右倾斗争虽然只限于党内，但是批判激烈不下于反右派斗争（我在农场看到反右倾运动中贴出的大字报要比新华社在反右派斗争中贴出的大字报要多好几倍），把人搞得很臭，给社会上震动很大，是“斗争过火”；而不看这场斗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革命就是要给社会猛烈的震动。我还借党给在反右倾斗争中受批判的一些同志甄别平反的机会，幻想对右派分子，也会来一个甄别。

#### 四、诬蔑三面红旗

因为我的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立场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到1962年的时候，就又根据一些微不足道的现象，猖狂地发出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我诬蔑总路线。我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是正确的，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却并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只抓了一个“快字当头”，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我还根据当时上边传达工农业生产要五年才能恢复到1957年水平的说法，诬蔑“大跃进成了大跃退”，还说少奇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中说，1956年反冒进的结果出了一个马鞍形，而大跃进的结果却出现了一个更大的马鞍形。我诬蔑这是因为过高地估计了人的因素，而过低地估计了物质和技术的因素的缘故。

我在听了《十二条》和《六十条》中关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传达以后，诬蔑人民公社办“早了”，“办快了”，是“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的觉悟水平”。是“由上面贯（灌）下去的”，“结果不得不退到初级社的水平”。我还诬蔑我所见到的居庸关山区食堂“没有必要”。

我还把当时物资供应上比较紧张的情况归咎于商业工作有“偏差”。在听到关于“天灾人祸”的说法以后，我站在反动的右派立场上，把所谓“人祸”看成就是五风，而且诬蔑造成困难的原因“人祸是主要的，比天灾还严重”（我不能确认我有没有说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话，但是类似的思想确实是有的）。对于五风的原因，我当时并没有像在十中全会后那样认识到主要是因为国内，尤其是农村中，阶级敌人还十分猖狂，资本主义势力还严重存在，他们利用党的工作中的一些错误与缺点大肆兴风作浪的结果，而是极端荒谬地把这些缺点和错误

同反右派斗争和反右倾斗争联系起来看，把五风的原因说成是这两场斗争扩大化损害了党内民主和人民内部民主，说群众害怕，不敢讲话的缘故。

我歪曲反右派斗争的情况来比附反右倾斗争，说什么：“鸣放之初，陈铭枢上书毛主席，诋毁毛主席‘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一共十六个字，现在已记不真切）。要毛主席功成身退，毛主席觉察到右派政客的政治野心，才发动了反右派斗争。（据吴冷西传达，毛主席曾因此说过：“我们就是要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在庐山会议上，可能也是彭德怀这样的政治野心家攻击了三面红旗，毛主席才发动了反右倾斗争。我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立场上，诬蔑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右派进攻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事先估计不足，反击以后，斗争扩大化，没有及时甄别，连续反右，没有纠偏，是“热了未冷”，是犯了“左”的错误，我引用斯大林的话，说什么“不反对什么倾向，什么倾向就是错误的”。我丧心病狂地把矛头针对党中央和毛主席，夸大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妄想开脱自己这个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我这时虽然在思想上似乎改变了一些我在1957年时候那种荒唐反动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但是根子实际并未拔除，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实际上并无转变，把超阶级的，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概念来解释社会主义建设过中的一些问题，这就再一次证明了我是一个顽固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 五、诬蔑党中央和毛主席

我在诬蔑党的政策的时候，诬蔑党中央犯了“左”的错误，甚至于诬蔑反右斗争以后没有甄别，是毛主席违反了过去“常规”，对右派分子的处分比过去几次运动中犯错误的人重一些是毛主席改变了过去“治病救人”的作法，而看不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右派分子实质上是反革命派，放在人民内部处理，已经是极其宽大的待遇。

我在1961年底听过吴冷西的一次传达，他说中国在农业上碰到的问题苏联东欧也有过，但是我们还是得自己经历过了才能体会到。我以为这是指苏联三十年代农业集体化过快的教训，我又站在自己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立场上，比附上苏联三十年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说苏联的肃反扩大化，便利了赫鲁晓夫之流的篡夺。我曾说过“毛主席要防止修正主义，须得吸收斯大林的教训，对持反对意

见和犯错误的人要给以出路”。我还以为主席是看到了这一点的，在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特别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阴暗面，在1957年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实行整风就有这个目的，但是章罗出来捣乱，反右一下扩大了，因此这个问题没有很好解决，我这种想法，实际上仍是我过去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遗留。

## 六、幻想翻案

由于我一直没有彻底服罪，反右斗争以后，在前途问题上，一直有种种幻想，曾幻想自己不被开除出党，曾幻想运动完了会有甄别，曾幻想三年五载就可以重新入党，但是我自己也不是不知道自己的问题严重，因此一直只是寄希望于党的政策会对我这样的人宽大一些。

我是在1961年年底摘帽子的，当时党在若干重大政策方面有所调整，我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立场上，认为党也可能会对反右派斗争重新加以考虑。这种想法在得知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的一些同志经过甄别而平反以后，逐渐强烈起来，尤其是当时外训班总支宣布在1959年受批判的同志“百分之百”平反，我就觉得如果对右派分子甄别，面甚至还可能比我以前所敢于设想的要宽一些。这样自己的问题也许还有重新考虑的希望。后来又得知若干部门的领导上曾征求有的右派分子对自己的问题的意见（我知道的有李正凌和庄重），我关于甄别平反的幻想就大大抬头。后来领导上传达了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广州会议上的报告，其中提到反右斗争后期，打击面宽了一些，处理重了一些，我对甄别平反的幻想就达到高潮，曾着手给吴冷西写信，希望领导上考虑我的问题，但是只写开了一个头，考虑到自己提不出像样的理由来，信始终没有写成，但是思想上却一直幻想领导上可能来找我谈。一直到那年秋天，吴冷西向全社作关于十中全会的传达时，明确提出要反击单干风和翻案风，我才意识到自己又临到了再一次犯错误的边缘，收起了对甄别平反的幻想。实际上，我已经以我恶毒的言论，对党对人民又一次犯下了极其严重的、无可饶恕的罪行。

从不服罪到想平反，这就是我在1957年、1962年两次犯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一根黑线。既然自己不肯认错，就要把错误推到党的头上，这样，我就站到了与党对立的立场，重犯反党的罪行。这是我的沉痛的教训。

## 七、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

我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五年以后还再次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反映了我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异常顽固。林彪同志说：“聪明的人仅仅是有错误改得快，没有别的。如果他犯了错误还要装好汉，还要坚持到底，硬要钻牛角尖，明明有错误硬说没有错，这是最愚蠢的人。”我就是这样一个最愚蠢的人。长期以来，我一再钻牛角尖，寻找各种各样不成理由的理由给自己开脱罪责。然而事实证明，我的思想是与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对立的，而且这种思想已经发为言论，构成了政治上的罪行。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党给我的处理不是太严，而是十分宽大，是我一再辜负了党的教育和期望。对于我的第二次犯罪，我衷心接受群众对我的斗争，衷心请求党给我以严厉的处分，以帮助我真正地进行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我在“牛角尖”里钻了些什么？在1965年的小整风中，也曾有所检查，自以为解决了一些问题，当时回顾自己的反党言行，确也感到触目惊心，毛骨悚然，承认了自己是一个罪有应得的右派分子。但是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了我新的震动，使我看到自己挖掘得还远远不够。

我思想上不服罪的论据主要有两条。

第一条是认为自己主观上还不是蓄意反党，认为自己同党的关系一直是好的，对党是“有感情的”，不像那些政治野心家，或者对党有刻骨仇恨的人那样要推翻党。这一点，经过党的教育，我也已经能从世界观和政治立场上来分析，看到自己所迷恋、所追求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民主（也就是资产阶级专政），而对无产阶级专政则抵触抗拒。但是，我还只认为我的政治思想是反动的，好像我所欣赏的那套旧的文化学术还不是反动的，还不是同社会主义完全对立，完全不相容的。正因为这样，我曾长期幻想去做什么“学术研究”，以为这样还不至于犯错误，然而这次文化大革命给了我一下当头棒喝。原来我认为可以埋头于其中的“学术”，仍然是阶级斗争的一个领域，而我自己所欣赏所爱慕的那套仍然是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毒草。我想去钻研它们，继承它们，势必继续同无产阶级的文化相对抗，同社会主义革命相对抗，继续犯反党的罪行。我体会到我的右派政治罪行只是像露出在海面上的冰山的一个尖子，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是隐

藏在海面下的部分，要大得多。我要真正改造决不当仅仅是批判一下我那些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而必须要把我的整套资产阶级世界观连根拔掉。

我把自己所谓“同党的关系好”理解为“同领导关系好”，觉得我的反党只是在抽象理论上，而不是有什么具体对象。然而这次文化大革命揭露出新华社十多年来的领导集团原来是一个修正主义黑帮集团。同这样的集团“关系好”说明了我过去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同这个集团“沆瀣一气”，而决不是对无产阶级的政党无限忠诚。林彪同志说：“党性不是抽象的东西，……坚强的党性，应当表现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全心全意地为党的纲领路线奋斗。这就要时时刻刻关心和注意政治形势、政策、路线等方向性的问题，站稳立场，分清是非，避免在大是大非面前摇摆不定，迷失方向”。我的所作所为恰恰与此相反。我完全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以“同党关系好”来为自己的罪行辩解。

我的第二条论据是与人比。除了同章罗之类的人比，自以为不如他们“坏”而外，主要同我周围那些过去共过事的“老同志”比，觉得我就是在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方面比他们多了一大块，其他在历史、为人、工作态度等等方面好像也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甚至于在内心以为自己如果不划为右派也还可以像他们一样在宣传战线上从事反帝反修的工作。在1965年的批判中，我着重批判了自己在政治思想上与他们的“不同”，然而这次文化大革命揭露出，我过去所认为“不错”的这些人，有许多是黑帮分子，或者是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有严重问题的人。在这里，我一方面认识到，我在1957年的罪行仍然要比他们中间许多人严重的多，一方面认识到，我的两次犯罪，决不是仅仅因为我“多了一些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凡是像我这样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接受了整套资产阶级教育，在民主革命时期参加了党而拒绝在思想立场上进行根本改造的人，必然要同越来越深入发展的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冲突。我过去曾在内心把改造的标准定为像那些在1957年未摔跤子的人那样“谨慎”、“持重”……以为那就可以不致再犯错误，现在才看到这只是伪装自己，凭这样的手法决过不了社会主义关，迟早都要被革命所扫除。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给我的震动之大，真是无可比拟。回过头来看，我自从反右以来（严格地说，是自从参加革命以来）一直走的是一条自欺欺人的道路，一直是以美化自己来抵制抗拒思想改造。如果我曾敢于正视自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的丑恶面目的话，我就不至于堕落成为右派分子，而如果我在57年以后敢于正视自己的反党罪行的话，也就不至于再次犯罪，然而我却一误再误，一错再错，这是我这一次再不能不牢牢记住的教训。

文化大革命使我进一步看到了自己的犯罪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而是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

我在民族民主革命的大浪潮中参加了革命队伍，入了党，吃了几天小米，开会作文。嘴里笔下，都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发言。俨然自己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了，实际情况完全不是如此。我出生在一个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家庭，从小过的是养尊处优的生活，没有尝过生活的艰险，没有体验过多少阶级的压迫。我爱构想自己过去也有一段“斗争历史”，实际上我完全是一个“三门干部”，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机关，从来没有跟工农群众一起生活过。虽然也在山沟里蹲了几年，却完全是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堆里生活。我所经历过的斗争，完全是上层的，只是动动口，动动笔的斗争，并没有经历过工农群众真刀真枪的阶级斗争的大风雨。我完全是毛主席所说的，“党所不需要的”，对人民“一点好处也没有的”，“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没有“同群众结合”的“共产党员”。我生活上同工农很少接触，思想上更没有下工夫进行改造，在思想感情上，并没有经历“由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变化。在进城以后，党给了我日益优厚的待遇，我把这些都看成是“革命果实”，是“按劳取酬”，理有应得，甚至把这看成就是“社会主义”。实际上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法权的遗留，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要消灭它，而不是长期保留它。

一个革命干部如果没有这种自觉的话，就有成为特权阶层，成为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危险，而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质上保持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精神上向往于资产阶级的文化学术，根本就没有认真考虑要把自己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分子。正因为如此，当社会主义革命来临，开始触及到我的资产阶级灵魂的时候，我就跳起来反抗这，反抗那，自己撕破了过去披在身上的“左派”的外衣而堕落成为一个右派分子。

我过去常常吹嘘自己“启蒙早”，“青年时代就有共产主义的憧憬。”事实完全不是如此。我自小从家庭和学校接受了一套完整的资本主义外加封建主义的教育，脑袋里灌满了“成名成家”，“学而优则仕”之类的个人主义思想。等我接触



到党的影响的时候，我早已牢牢地树立了资产阶级世界观了。参加革命以后，我虽然在口头上挂上了一些马列主义的词句，但是一直保持着各种各样的个人打算。这种个人主义虽然在57年（1957年——编者）以前还没有发展成为公开的错误，但是却是我政治上犯错误的根子。

极其可笑的是，虽然我曾学过一些马列主义，但是直到1965年以前，还根本不能理解“世界观”这个辞的意义。我过去只以为世界观是一种思想体系，是理论上的东西，而我自己还模模糊糊地自以为还是信仰辩证唯物主义的。最近才注意到毛主席所提出的：“立场问题或者态度问题，也就是世界观的问题”，才开始认识到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一意为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拿这来同我自己的思想对比，我的世界观是明明白白的“为我”二字。

我曾自我标榜为曾经“为党工作过”。但是我在1957年的时候就曾经说过：“一天万把字的稿子发下来，两手空空。”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就是自己感到发稿工作不能为自己“积累资本”，这个工作不是“我的”，我明明是一心只想为自己服务，一心只想自己的“成名成家”，而根本不是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

1957年以前是如此，1957年以后在改造上也还是以个人利益为中心。有时表现得好一点，也是为了要争取早一点摘帽子，早一点重新入党，等到这种希望看来渺茫时，就悲观消极，直到诱过于党，与党对立。我一心一意想回到党内，这似乎是一种“良好的愿望”。然而我所以想回到党内，难道是为了要更完全地贡献自己的一切为人民服务吗？根本不是如此。实际上我所念念不忘地是要恢复自己的荣誉地位。正因为我的出发点是如此，我那种想回到党内的“良好愿望”，居然会成为我二次重犯反党罪行的思想根子。这真是对我自己最辛辣的讽刺。

毛主席在《这是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中说：“社会主义要求整个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有计划的发展，要求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个人的利益和意志服从于广大人民的统一利益和意志，这是他们（右派分子）认为不能忍受的。”我的个人主义就是强烈到了这种程度。

这次文化大革命揭露出许多曾在民主革命时期为我所敬慕过或者曾同我共事过的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员都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堕落成为

右派分子，这个事实打掉了我的一个历史包袱。原来我过去所引以自豪的所接受的所谓“党的影响”中，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三十年代那批“祖师爷”的东西，他们打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卖的却是资产阶级的黑货。我在当时就是毒草香花不辨，把其中许多当作无产阶级的东西接受下来。因此事实上，我脑袋里的马列主义实在是微乎其微，而绝不是我自己过去所想像的那么多。

当然我也读过一点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然而我从来就是教条式地学习的，目的只是为了积累知识，用于业务，而不是为了改造思想。毛主席说：“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毛主席在这里说的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事实，而反右斗争中所揭发出来的许多党内右派分子和文化大革命中所揭发出来的许多黑帮分子，以及我自己，恰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新例证。

这次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一小撮黑帮分子对新华社十多年的统治，也摧毁了我内心深处长期保留的一块阵地。在1957年对我批判斗争时，几乎完全没有触及我在业务上的问题。因此，我总自以为虽然在政治上犯了错误，但是业务上还不错。而按照过去新华社流行的所谓“业务即政治”，“稿子就是最大的政治”的观点来看，这实际上就是认为自己“政治上”还是“行”，这样就等于根本否定了自己政治上的反动性。这次文化大革命揭露了十多年来统治着新华社业务的一根黑线，使我看到我过去自以为还不错的那一套本钱原来还是资产阶级的黑货。即使自己过去在有的时候，在党坚强领导下能看到一些问题，写几篇文章，表面上好像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实际上并不就等于无产阶级政治在自己思想上挂了帅。“政治是全局，业务只是局部”，决不能把业务中体现出来的那一点子无产阶级政治来掩盖支配自己全部思想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这次文化大革命揭穿了吴冷西这样的所谓“反修秀才”，原来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这个事实对我真是一面照彻肺肝的镜子。事实上，也不用看别人，我扪心自问，即使在我写最革命的辞句的时候，我何尝联系自己的思想，改造自己的思想，我考虑的只是提法是否得体？分寸是否恰当？是否合乎上级意图等等。在我的灵魂里哪里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影子，有的只是丑恶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

反右斗争时，党提出要我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我嘴里也说要彻底否定自己

的过去。但是我并不真正懂得为何要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怎样去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反而觉得自己过去总还是革命的，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不但思想上想不通，而且也不“实事求是”。只有这次文化大革命才使我真正看到浸透我全身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必须彻底否定。在这样的世界观的支配下，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能不是“一无是处”。毛主席早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就指出要建立新文化必须打倒旧文化，“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毛主席一再强调要“彻底破坏”，强调新文化本身要逐渐成为工农群众的文化，而且早就警告过，谁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会被人民抛弃，变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对毛主席的教导，我长期置若罔闻，现在是认真学习，认真实行的最后机会了。

反右斗争结束以后的多年中，我老是钻到牛角尖里去美化自己，而对自己的罪行则采取鸵鸟政策，仿佛只要把自己看成一个好人，自己就是一个“好人”，这真是愚蠢到了极点。我一心想回到党内，然而不是通过自己的彻底改造，而是幻想党会“纠偏”，这样就是把党和自己的地位完全摆错了，是与非的界限完全颠倒了，这真是反动到了极点。可以设想，如果执行了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让我这样的人重新回到党内的话，我的资产阶级反党思想决不会因此而克服，只会日益发展，日益嚣张，最后将成为一颗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定时炸弹。当然，党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决不是几个右派分子所能毁坏得了的，最后毁灭的必然只能是我自己。因此，我认识到，为了革命的利益，也为了挽救我个人，都必须对我的罪行进行狠狠的斗争，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使我迷途知返。去年的小整风运动对我的罪行进行了几个月的批判，应当说也使我受到了一些教育。然而今年的文化大革命才直捣我的灵魂深处。我在去年的批判以后也有悔罪的心情，但是从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高度来看，我对自己的罪行还远不是那样切齿痛恨，对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样迫切地感到需要彻底摧毁。尤其突出的是，我虽然在去年表示要服罪要改造，但是仍然没有狠抓学习毛泽东思想。根据别人的例子和我自己的体验，我都已经懂得，不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我是一个顽固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毛主席说：“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也有变好了的，也是由于七斗八斗，他认错了，就变好了。”毛主席在这

里指出了两个前途。对我来说，只能允许自己有一个前途，就是经过斗争而认错而变好！

建国十七年来，有许多如毛主席所说过去同革命“绝少姻缘”的人得到了改造。反右派斗争过去九年了，也有不少右派分子得到了改造，而我却一再犯罪，其原因就在于自己不肯真诚地认错服罪，因此就接受不了党的教育，立不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次文化大革命剥掉了我长期背着的一切臭包袱，我必须从这中间求得新生的转机。

我的犯罪是有必然性的，然而决不是非犯罪不可，决定的还在于我自己。我曾经跟着党走过一段路，党对我一贯是爱护关怀的，给了我许多的教育，也给了我许多改造的机会，事实上许多同我出身类似的同志都得到了改造，而我却是执迷不悟，一错再错。在去年的批判中，我认识到，作为一个潜伏在党内的右派分子，我的罪行要比一般的右派分子更严重，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危险要更大。这一次，我认识到我要比一般的右派分子更可耻。受过党多年的培养还居然会反党，自命为党的“宠儿”的人居然成为党的逆子，甚至在犯了严重的罪行，受到宽大的处理以后，还以“党内右派”自居而拒不服罪，拒不改造，再次反党，真是丧心病狂到了极点，可恶可恨到了极点。想到这里，我再没有理由要求党对我宽恕，我衷心地要求党给我以严厉的处分，使我这一回能永远记住自己的罪行，永不再犯。我请求党让我参加艰苦的劳动，长期到工农群众中去，真正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我的前半生已经被我自己蹉跎糟蹋了，我一定要以后半生为党为人民真正做一点有益的工作。（完）

（本文由李慎之先生之长子李三达先生提供，谨此致谢。）

【资料室】

江青致许世友、赵紫阳信

洪文、剑英、春桥、小平、锡联、振华同志：

请转世友、紫阳同志：

请代我向广州军区全体指战员、海南岛、西沙群岛全体军民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祝贺西沙群岛全军、民兵、渔民同志们与敌周旋，获得维护祖国主权的伟大胜利！

我身在北京，心逐南海，汹涌澎湃！虽不能与同志们一块持枪战斗，但在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进行着一场大斗争，这场斗争是大是大非，是路线斗争，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一场持久的斗争——批林批孔运动正向纵深发展，势若燎原。我们是心连心的，我们都要打倒帝修反，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各自在党分配的工作岗位上战斗着。

为了表示我对同志们的祝贺，特请作家浩然同志、诗人张永枚同志、记者蒋豪济同志代表我前去看望坚持在前线的英雄们！并送你们：《林彪与孔孟之道》五百份；《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五百份；《批林批孔文章汇编》（一）、（二）各五百份；《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五百份。

学习的第一单元是：一，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二，《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三，《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以上三份文件请世友、紫阳同志为你们准备。中央的通知还会告诉你们其他读物。

致

无产阶级革命战斗的敬礼！

江 青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凌晨五时

（迟泽厚先生提供）

【资料室】

武汉市小学教师 1954 年的工作笔记  
——关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

任冬林整理

任冬林先生按：这本工作笔记来自于武汉市某小学“三丙班”的班主任。记载了1954年2月——7月16日间，教育界贯彻“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做好了少年儿童的工作”的情况。其中还记录了上级传达的实行食油计划供应的办法。

本期小学工作计划的精神

(1954年2月)

一、 计划的精神和判定的依据。

1、计划的根据：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而制定。

2、根据上学期的工作基础：肯定了成绩，明确了方向以及教师队伍中所存在的问题。

3、根据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的中等教育工作会议的精神。

4、根据寒假学校行政教研所提出的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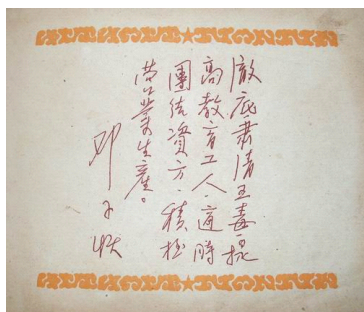
二、 基本精神和重点。

1、从解决基本问题入手，主要解决两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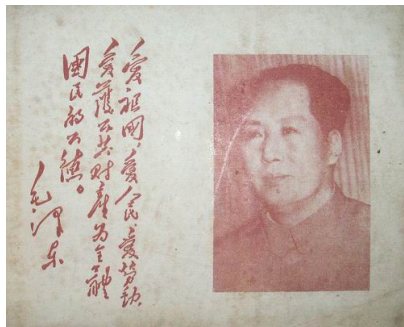
(1)、政治思想空气薄弱和社会主义觉悟不高。

表现的方面：

a、对政治不关心：如上期布置的总路线的学习方面不感兴趣，普选运动得不到学校的重视。



b、社会主义前途思想不明确：存在着蜡烛思想，怕照亮了别人，缩减了自己，不安心工作想转业或升学。



c、集体主义思想很淡薄：领导与领导不团结，互相埋怨瞧不起，在先进组织方面也存在着不团结，教师与教师不团结。

d、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展开。

e、组织性与纪律性很差：教师不服从领导，学校领导对上级领导的指导不能很好的贯彻执行，瞧不起教育局和文教科的干部，不是从组织形式的角度来看，而是对一个人出发。2、全面发展教育的观点不明确：

(1)、重视智育忽视了音、体、美等教育。

(2)、政治思想教育空洞，知识教育和思想教育不能很好的相结合，或是牵强附会。

(3)、劳动教育和纪律教育不能贯彻，劳动教育是“五爱”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环。

3、计划中贯彻了稳步前进的精神：

(1)、提高教学质量首先要提高学校领导的水平，会后将加强领导。

(2)、在改进教学方面：着重钻研教材，达到正确的掌握主题，教材本身就含有先进思想，因此正确掌握教材，则能提高教学质量。

(3)、端正教师纪律教育的观点，巩固常规，重点试行《学生手册》。

本期中心任务：加强师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提高师生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以端正教育观点为主，从而改进教学。

### 李局长的总结报告：计划的贯彻执行

(1954年2月)

一、教育性质，考查教育性质的两个依据：

1、教育的领导。

2、教育为谁服务。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现在的教育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1)、学校是由同学领导，日后为工人阶级领导而走向社会主义。

(2)、教育是为政治、经济服务。革命第一阶段已完成，开始了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就标志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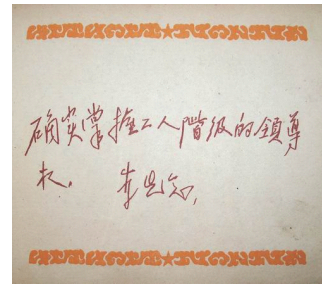
社会主义教育的特点：

(1)、教育工作是由工人阶级领导，是由国家所设立、领导、管理、有统一的教育政策、计划、制度。

(2)、以工人阶级的思想为领导思想。

(3)、不分男女、宗教信仰、种族民族，都有受教育的权力，广大人民成为学校的成员。

(4)、大力发展民族学校，全国目前有 166 所民族中学。



二、总路线学习的问题：

1、学习领导：教师可以停止任何学习而学习总路线，由市文教党委领导，讲课也是由市……

2、目的要求：基本要求是体会精神实质和结合实际（结合总路线的精神来检查和总结学校全面工作，检查时不得以个人为对象，主要检查工作）。

3、检查工作就是检查思想，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

(1)、先摸清思想的底细。

a、工人阶级的思想已被承认为合法的领导思想。

b、资产阶级思想在很大范围内占优势。

c、封建买办残余思想还占相当的比重。

(2)、具体办法：

努力扩大工人阶级思想阵地为主体，提高社会主义思想，着重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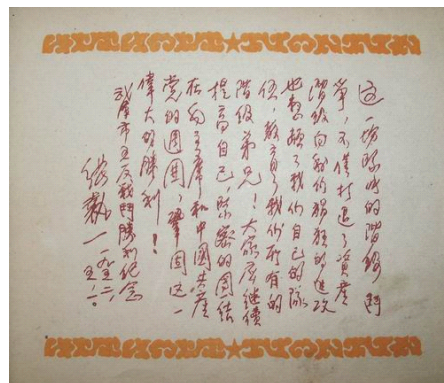
资产阶级思想表现的方法：

a、忽视政治：要全面教育对政治运动的关心，批判单纯的业务观点。

b、轻视体力劳动，并认为劳动人民是大老粗，脱离实际，单纯鼓励学生当专家。

c、教育当中劳动教育的因素很少。

D、受历史的影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e、散漫无组织无纪律。

f、个人主义严重存在。

三、政治思想教育（主要对学生）：

1、要以工人阶级的思想和总路线的精神，以爱国主义、劳动、纪律和集体教育为重点。

(1)、爱国主义教育。目的要学生把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忠于祖国，献身于祖国，与国际主义教育是分不开的。

(2)、劳动教育。目的在树立社会主义劳动态度，从教材方面着手，并结合实际，首先要求教师端正劳动观点和态度。

(3)、纪律和集体教育：社会主义的生产特点是集体生产，集体生产的基础是集体劳动。因此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一定要有集体主义的思想和高度的纪律性。

2、实施的办法：

(1)、要与政治与实际结合，与政治形势和斗争和当前的工作和思想结合。

(2)、要求在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中均要贯彻政治思想意义的教育，反对资产阶级的旧习惯和牵强附会。

(3)、正面教育是革命的方法，基本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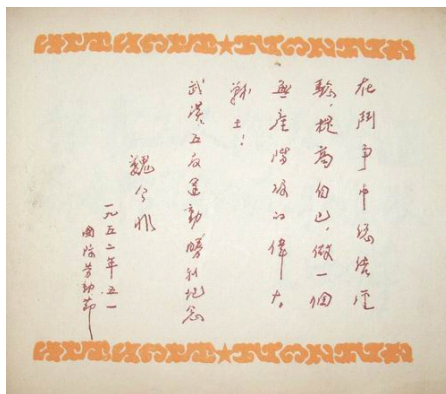
含义：

a、积极的以正确的思想、观点、行为标准告诉学生来影响他们。

b、说服教育，任何粗暴的方法都是不对的，反对不正确的惩罚。

c、启发、自觉、不伤害儿童的自尊心。

总之，今后的教育以教学为主，而包括上项内容。



### 食油计划供应问题 为什么要计划供应？

(1954年3月4日 星期四)

为不至于造成过度消耗，在保证充分供应城市工矿区，防止投机，保证供应，食油生产和消费不平衡，生产赶不上人民的需要，供不应求原因：

一、过去国家在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是保证人民有吃有穿，主要是粮食和棉

花。粮食棉花超过了战前的生产水平，因而对油料的生产没有相应的发展。1953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指出，食油生产水平供应相当于战前70——80%，恢复和发展慢。

二、需要量大：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改善，因而消费量增加了。武汉市1950年消耗量每人12斤油，1953年每个人为17斤，将近增加50%，武汉市154万人口供不应求的现象很明显，武汉之所以不感油的缺乏是因为武汉市是油的集散地。

三、从实际情况来看：

1、必须定量。定的少则少浪费。标准不低于合理水平，一般是活水平。定量对大多数劳动人民影响不大，不实行计划供应就给奸商钻空子。奸商是唯恐天下不乱，囤积居奇，提高市价等，而使劳动人民不能吃到油，影响劳动人民的生活，由此影响国家财政收支，影响国家大计——根本建设。因此更加影响劳动人民的生活，甚至影响社会主义。食油生产之所以缓慢就是由于农业落后的个体经济的环境，因而迫切需要工业化。根本的改变的方法就是根据总路线，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力量，食油生产不能影响粮食和棉花的生产，因为粮食和棉花更影响人民的生活，供应计划是暂时的办法，根本的办法就是实现国家社会主义。

今天少吃了油，为了巩固国防，为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了人民美好的生活前途。

1、具体办法和具体任务：

(1)、具体办法：

a、定量——大人每人每月一斤，小孩每人每月半斤，7岁以下的为小孩，8岁以大人供应。郊区农民根据实际情况。一般开馆的根据1953年11、12月平均计算。供应凭票购置，机关学校凭购油证。

b、代销或经销注意的问题：

不得抬价、扣称、拒卖，违者给予处分。

(2)、具体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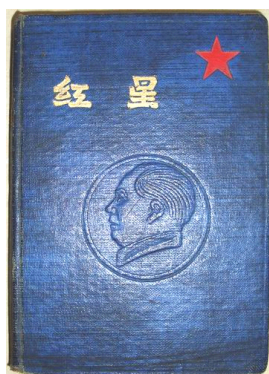
a、不提价，不囤积；



- b、不与奸商作非法交往；
- c、思想认识上要高度统一起来；
- d、□□政府检举的几起非法行为要深入宣传。

## 为什么要学习

一、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不仅研究了工作的问题，而且还研究了怎样向少年儿童进行教育的问题，指出了光荣的任务——“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做好了少年儿童的工作就是贯彻了总路线。



二、党和政府都是关心少年儿童的，因为儿童是人类未来的希望，凡是期望祖国未来美好的，就会关心今天的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旧社会的地主阶级和统治阶级历来都是建立在血腥的统治之上，因此不会爱护少年儿童；小资产阶级也不会关心孩子，因为他们看不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只有党和毛主席才会关心孩子，因为他们把人当做最宝贵的财产，共产主义事业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的，是要世代传下去的，从小教育少年儿童是富于深远意义的。只有知道如何关心少年儿童和热爱少年儿童的人才能关心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

三、少先队组织如何发挥队的特点配合学校的教育？

少先队组织是学校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而必需了解它。凡热爱、关心少年儿童的人就应该关心少年儿童的组织建设，可以帮助学生很好的接受学校教育，完成学习任务。培养少年儿童是国家建设事业的一部分，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因此，学好第二次全国少年工作会议文件是我们工作中的一项迫切的任务。

学习文件：

1、文件明确“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是在总路线照耀下，少年儿童工作当前的主要任务，要进一步从国家意义上认识自己工作的意义，加强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对工作的责任感和信心。

2、“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要培养出高度文化科学知识，具有高度共产主义思想的人，健壮、勇敢的人，因此，爱护少年儿童具有国家意义。

(1)、为什么说少年儿童的工作具有巨大的意义？

(2)、为什么说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具有国家意义？

(3)、怎样使自己更加热爱教育事业和树立对工作的幸福感和信心？

(4)、认识社会主义新人的面貌，了解社会主义制度和特点，从而深刻理解全面发展的的重要性而端正自己的学习观点：

a、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新人？为什么？

b、如何理解全面发展，健壮、勇敢、诚实怎样发展？

c、怎样要求自己？

四、明确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正确的教育观点和方法，结合到个人热爱的行动上，严格要求自己：

1、清除粗暴的行为，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去影响儿童，才能有长远的效果。

2、要做好工作，要坚持不懈的工作，以高度的政治热情，自己的模范行为去影响少年儿童。无正确的观点就不可能培养社会主义的新人。

(1)、什么是正确的教育观点和教育方法，目前在观点和方法上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从哪些方面去解决这些问题？

(2)、在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任务中，文件向教育工作者提出了什么要求？

(3)、怎样才能正确的发挥少先队组织在学校的作用？

五、如何学好文件？

1、党如何关心少年儿童和对我们的要求（朱总司令的报告）；

2、正确的观点和方法（胡克实报告的第二部分）；



3、指出了方向（胡耀邦的总结）。

要反复深入钻研文件，作笔记，通过讨论和座谈，彻底弄清过去不太明确的问题。认识好与坏，事关“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要通过这次学习提高思想，切实改进我们的工作。

1954年3月27日 星期六

一、学习内容，目的要求，大体上安排。

1、学习总路线的意义：在过渡时期，任何工作都要为总路线服务。中南教育部规定在半年中总路线为学校中的政治学习，贯彻中心任务在教师方面就是学

习总路线，学生是否感兴趣，这是培养社会主义合格人才的大事情，责任在校教师。

2、目的要求：通过学习，提高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以达到提高教育质量及合格人才的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的总路线的精神，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储备者，成为全面发展的新人。

基本要求：

1、要求了解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及从理论上了解为什么需要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革命性质与任务，党在这时的政策与方针，进而了解过渡时期的教育性质、基本任务以及确定教育工作的方向。

2、了解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以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及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两翼①的重任，了解党的领导作用。

学习日程：

文件，学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提纲(1100元一本的，教员每人一本)。

进度：

从第7周起学到14周止②，分5个阶段。

第一讲学习3周，讲一次课，自学讨论四次。

第二讲学习3周，讲一次课，自学讨论四次。

第三讲学习2周，讲一次课，自学讨论二次。

第四五讲学习2周，讲一次课，自学讨论二次。

从下周星期4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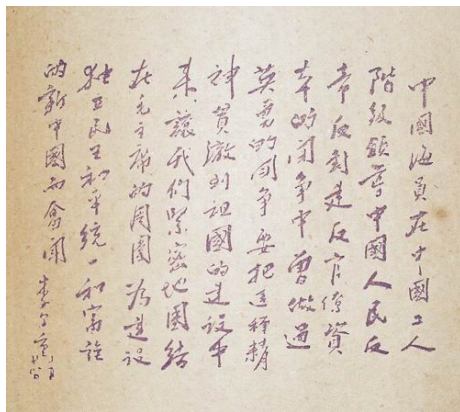
讲师：华中师范的陶钧、李尔重、张平化、宋侃夫、凌莎③。

学校具体学习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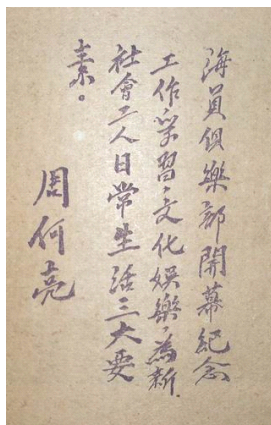
星期4讲，听广播。每周单星期2学习总路线。双周辅导员学习。

第一讲：教育学第一章——领导必读

思考问题：







1、了解我国革命两个阶段的任务和划分的关系怎样？为什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我国革命第一阶段的结束和第二阶段的开始？

2、了解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具体内容和精神实质是什么？

3、在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阶段中教育性质和任务有什么区别？教育工作者应如何为总路线服务？

## 二、区对学校领导学习上的几点意见。

1、过去学习情况和今日学习态度：过去学习得不系统、不深入，对精神实质认识差，这次学习应抱着从头学起的态度。我们首先要端正态度。

2、行政要重视、要先行一步：行政的重视首先就是以模范作用去影响教师。如果不先行一步，则不能帮助老师学习，解决学习中的问题，也就不能指导学习和引导学习。每个校、班、组每周学习一次，校长主任从下周起，小组长也要先行一步。

3、注意培养学习骨干，工作、学习只有通过骨干才能搞好。

条件：

- (1)、坚持学习；
- (2)、老老实实的提问题，认认真真的讨论，不懂得则提；
- (3)、要虚心，学习骨干不仅自己要学好，而且要帮助别人学习；
- (4)、在学习中要有表扬和批评。

## 三、要注意的问题和几件要做的事。

1、注意在学习当中现买现卖的思想，认为与工作结合不上，这样就会降低学习情绪，阻碍工作的前进，如发现了则应帮助启发。

2、注意一味钻书的名词的现象。

3、防止过早的联系实际。

具体作法：

- 1、检查收音机的好坏。
- 2、整顿学习组织。



- 3、确定专人负责领导学习。
- 4、制定学习制度和学习纪律：
  - (1)、作笔记，列发言提纲（检查办法自行决定）。
  - (2)、建立汇报制度。
  - (3)、建立签到制度。
  - (4)、进行思想动员，摸清思想疑义。



**【来信选登】****1、何建平谈沈迈克的提问：**

沈迈克是饮誉国际的汉学家，是文革史研究权威。我曾听过他的讲座，他那精辟见解和幽默风趣的表述使我和我的同学们深为叹服。他与麦克法考尔合写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超过了我们读到过的所有的国内学者写同类的书。可是，让我大吃一惊的是，贵刊82期上竟然出现了沈迈克教授的提问——他竟然向同行公开自己的不足，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我敬佩他的虚心，敬佩他的勇气。看看我们国内的那些教授们吧，强不知以为知，只知道往自己脸上贴金。沈迈克给中国学界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不但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治学，还启迪我们应该怎样做。请贵刊代我向迈克教授致敬！

2012年4月2日

复旦大学

**2、关天昊谈设立问答栏及中国人的面子：**

这期记忆上，我发现了一个新栏目——问与答，而提问的人竟是大名鼎鼎的沈迈克。看到他的问题之后，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怎么？难道沈迈克这样著名学者也会有不明白的地方吗？他在这里公开地暴露自己的无知，难道不怕丢人？

是的，这种想法很幼稚，它不应该从一个年逾四十岁的、受过博士教育的副教授的脑袋里冒出来。可它却纠缠着我，催我反思：为什么我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答案是，这与我们惯常的心理和思维有关——中国人通常认为，只有学生才能提问。也就是说，一旦当了老师，就无所不晓了。只有没有名的人才会提问，也就是说，一旦出了名，就万事皆通了。事实上，困惑不会因为你是老师，是名人而敬而远之的。恰恰相反，越是经多识广，才越会思考更多更深的问题。可是，在中国，至少在我的学校里，我却看不到有哪位老师坦言自己有哪些事情不懂。也没见到哪位名人向公众坦露自己的疑问和无知。

为什么如此呢？

答案两个字：面子——中国人太好面子了。岁数越大，地位越高，面子越重

要。从这个意义上讲，是面子毁了毛泽东。是面子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因此，我请求我的同胞们，向沈迈克学习。学习他的虚心，学习他的不为面子所累。这远比学习雷锋有意义。

2012年清明之夜  
南开大学

### 3、黄光光女士来信：

按：下面的信是原师大女附中 66 届初三学生黄光光写来的，黄女士的母亲张穆舒女士 1957 年为《北京日报》记者，是年报社安排她采访报道葛佩琦（右派）等高校教师在整风鸣放会上的发言，后因此被打成右派分子。

文革中我的老妈张穆舒（原名张泸光）被赶到河北沙城第二中学当教师，受到非人的折磨，使她至今创伤难复。一些半大不小的孩子把她抓起来，吊在房梁上打、挂牌游街、剃阴阳头，泼墨、拳打脚踢更是家常便饭，无非就是要逼她承认她是叛徒（老妈解放前在重庆作地下工作，《红岩》中的孙明霞（原名曾紫霞）、刘思扬（原名刘国志）是她的上线），承认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偏偏老妈很坚强，死不承认，所以挨的打更多。我的小弟去给她送饭（当年也就 12 岁），看到她头破血流、脸上又黑又红的惨样，受到惊吓，神经受到刺激，智力受到很大影响。当年打人的这些学生，有些人春风得意，当上了各级领导，但却没有一人对当初的行为表示悔意。其实像老妈他们这一代人还是很理智的，能理解在当时的形势下，难免某些年少气盛之人会有狂热、过激行为，并不想追究张三李四的个人责任，只是觉得事到如今他们仍毫无愧疚之心，仍心安理得地坐享文革给他们带来的种种即得利益，就不得不让人为之气忿，为今后可能还会有人仿效而忧虑。

万幸的是，我老妈活下来了，而我们的老校长卞仲云却永远离开了我们。每每想到这些，真是很难过。用原八中学友钟里满的话说：全国那么多学校出现打人、打死人的悲剧，却只有女附中一个学校的师生站出来，做出了自己公开的反

思和行动，为文革中遇难的老校长塑制了铜像。在这个活动中，各届校友，既有文革前早已毕业离校的，也有70、80年代才入学的，卞校长遇难时，他们并不在校，但却仍然积极参与到了这个活动中来。参与捐款的500多位校友，遍布海内外，许多人都不曾相识，是共同的心愿让大家紧紧团结在一起：彰显人性、良知、责任和正义，声讨罪恶、丑陋和私欲。我觉得这也正是作为女附中人值得骄傲之处。

2012年4月5日

#### 4、金秋再致《记忆》：

十分感谢《记忆》编辑部刊登我致编辑部的上一封信。编辑部能认真遵循既定的原则，让不同的声音同时致达读者，其精神，可敬可佩。

但是看了其他一些同时刊登的文章，还是想表达一点自己的意见。我不想就事论事，还是从理论上探讨一下。首先，我想讨论的还是回忆录允许不允许有错的问题。如果有错，我们应当如何对待？这实际上是争论的关键。还是那句话，“回忆录的价值就在于它的不完美。”如果回忆录与史实完全相符，一点差错没有，那我们倒要问一下是否经过加工。一经加工，价值就会打折扣。因为读回忆录，不同于读史书。读史，是读历史，读知识，而读回忆录，是读当事人的感受，是读个人历史，即从个人的角度看历史，是读一般史书里读不到的东西。个人角度看历史，是否会与史实有差异？当然会有。因为回忆录的重点，不在于考证历史，而在于当事人的亲身经历、感受、体验和认识，这往往是一般史书所无法提供的。因此回忆录的史料价值是一般文献无法代替的，其价值也是无可比拟的，尤其是对当代史的研究而论。但是如果我们用考证的方法，来评价回忆录，甚至否定回忆录，那实在是削足适履，与史学研究的真谛背道而驰。

其次，就争论的焦点，涉及到近来出版的黄吴李邱的回忆录与传记，用考证的方法来对这些书加以抨击，就更有失公允。这些人的回忆录也好，家人写的口述史也好，都是呕心沥血之作。黄吴李邱及家人，倾注毕生精力，在没有档案可查，少有文件可阅，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写作，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这是何等可敬可佩之事，但为什么倒被人横加指责？甚至要“打假？”何是真？何

是假？邱老有三本书也好，有四部书也罢，又有何妨？毛刘周朱又有多少本传记？国内老干部的回忆录出版了多多少少，为何没有人说长论短，煞有介事地要“打假”？张爱萍之子张胜与父亲的对话，为何没有人要“打假”？凭心所问，这到底是为什么？这是否是打着追寻历史真实之旗号而欲达到其他的目的呢？

最近从网上看到汪子炎先生的一篇文章，《也谈回忆录的整理编辑工作》，该文就回忆录的编辑整理向史学家们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原则问题，“针对重要历史人物的回忆录，其他整理者能否有权增加非作者本人所写的内容”？我个人十分认可汪先生的结论，即整理者无权任意修改作者本人所写的回忆录。如果实在有重大出入，按史学研究的原则，整理者也只能加注。而加注过多，也就有碍回忆录的可读性。依本人所见，还是不加为好。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再提出，回忆录与正史有别，要允许回忆录中有错。在个人回忆录里，掺杂非回忆录本人所写的内容，实在是回忆录编辑整理工作的一大忌。这也是国内出版的大部分重要人物回忆录的重大问题。众所周知，国内出版的回忆录不计其数，但大多数并没有引起读者的兴趣，因为这些回忆录大多是 xxx 编辑组所著，而非本人所著。这样一来，回忆录的价值就大打折扣。

历史研究不可能被少数人所垄断，回忆者也无须害怕自己写的与史实有出入，更不要怕被别人打棍子。还是那句话，历史是人民写的。每个人都有权写历史。口述史不会完美，回忆录也不会完美。因为人的记忆本身就不是完美的。一个人将同样的经历讲三遍，就会有三个不同的版本，除非他是照本宣科。我劝众人放平心态，多看书的长处，不要以拥有史料为霸权，来封别人的口。这实际上是 xxx 在垄断当代史的话语权的一贯做法。事实早已证明，这么做不仅徒劳无用，而且还会适得其反，徒留世间笑柄而已。越多的人能留下回忆资料，越好，对后人研究历史就会越有利。

我希望《记忆》杂志能广积众人所言，越办越好，而不要为某些人的观点所垄断。个人之见，如有不当之处，再次请见谅。

金秋  
美国弗吉尼亚

